

## 《人間思想》發刊辭

在這個代工之島上，難道連知識生產也非得只是代工不可嗎？長期以來，我們的人文社會知識是在一種前提自明、太自明的狀況下量產。我們無意識地關閉了對知識生產所需的前提的反思，從而無意識地按照一種「普世的」規範與方法生產知識。於是，那需要經常被提上檯面進行反思辯難的「前提」，就變成了「常規」。在「常規」之下，知識生產者的自我確鑿、目的明確、方法因襲、語言熟爛；一切皆在一種慣常中順流而下。但是，這個所謂的「常」，恰恰是一赤裸裸的**不正常**——天下皆曰常之為常，斯不常矣！它遠遠不是什麼世間常道，而是在一特定時空下，對我們的意識進行銘刻，對我們的精神進行殖民的全球知識霸權。於是，我們的知識生產竟而取得了一種與我們知識分子菁英意識與自由習氣理應水火不容的機械生產時代流水線特質。西方各種流派的名詞概念不停地被翻譯成中文，組裝為各派反抗行動的套件，再貼上台灣主體性的商標，於是就成為各派所標榜的進步知識品牌。憑依著它們，某種「代理人戰爭」一直在這個島嶼上樂此不疲地持續著。

這樣的一種常態知識活動，雖然貌似「安身立命」，但其實可能只是機械性地對勞動與生命的占有；雖然貌似「自由」，但畢竟是一個諷刺的自由——條條大路**只能**通羅馬。於是，知識人雖然決皆攘臂，奮聲「批判」，但所謂批判似乎也只能是現代性價值共識之下的茶杯風波。於是，知識人雖然不敢或忘「現實介入」，但「現實」早已被他們的知識之「常」劃地為牢了。「現實」，於是只是目的地（即，作為歷史終點站的「現代性」），以及朝向目的地前進的朝貢千帆（所謂「發展中」），之外，則是猿猴、熊羆、洪荒、古蹟、傳說、落後、伊斯蘭、亞細亞——那一片現代性北斗光暈之外猶待啟蒙的黑暗之心。

該是對這樣的「學習」，停、看、聽、思的時候了。只思想不學習，固然也將會有危險，但一頭栽進一種學習而不思想，那將注定無謂，而將只是知識分子圈的知識遊戲而已。「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兩千年後，其響若鐘。

「思想」應先於「學術」。這是因為我們在學習或研究之前，應該先思索的是：「我們」是誰？以及，我們知識的「目標」是什麼？前一個問題不是一個意識形態的

或「認同的」問題，而是一個歷史的問題，從而也是「客觀的」問題：我們要如何深入理解形成我們今日主體狀態的各種歷史經緯線索？唯有盡力內在於我們的社會與文化的歷史性肌理，我們或許才可能有較穩固的立場與較審慎的態度，去立論並爭論我們所追求的人倫關係、經濟生養、政治安排，乃至文化審美是什麼，以及**應該是什麼**。我們有我們要走的路；它絕不是來自於一個成為他者」的童駭許願，而是來自於對形成自身的各種歷史線索與條件——無論是正面的與負面的，加以掌握與提煉。世上的每個民族、每個文明，能認識它自身的潛力與條件，能走上它自己的路，而每一條路又無礙於和其他條路之間，有學習、有參照、有對話，這才是真正全球範圍的「文化多元主義」。這才是自由主義多元文化觀的最激進的可能。這才是第三世界的國際主義。

然而，這樣一種態度，有時也可能稍嫌謙遜罷。在今天，對人類乃至其他物種在這個星球上的未來，我們難道不應該更敢於承當、更願意負責嗎？這是因為，在一片「永續」聲中，霸權現代性無疑已展現出多重嚴酷危機。別的且不說，按照目前的欲望溫度與發展速度，

這個地球還能禁受多久？而這樣的一種非到「燒掉它的最後一噸煤（韋伯語）那一刻，才能停下它的狂奔的「發展主義」，難道不又是根據西方宗教改革（如非更早）以來的價值與制度綜合體，而弔詭地被「神聖化」與「普世化」的嗎？這些價值與制度至少包括「競爭」「進步」「創新」「個體性」「自由」「平等」與「民主（即多數決）」……。早在一百多年前，魯迅即一方面在反抗民族自身的愚蠻麻木的同時，警惕人們也不可無加反思地接受西方的「文化偏至」。路還是必須要自己走出來的。今天，這樣的一種真正意義的**獨立思考**，不只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西方，因為後者也是它自己「偏至」的犧牲。

上世紀八〇年代末，那當初從西方內部發展出來的反西方話語——社會主義話語與體制，遭到了幾乎是瞬間解體的命運，從而「新」自由主義」頹波再激，馴至於形成了今日單一普世霸權。在廣大的第三世界，對這個霸權的性質與效用，並非沒有質疑與反抗，但似乎，好比在台灣，人們對霸權的「批判」立場，基本上還是「內在性」的，也就是在承認了這個體制所宣稱的價值的前提下，對體制的現實進行拆謊。可以說，這是所謂「公

共知識分子」或「批判知識分子」或社運人士」的一般姿態。在承認公共知識分子」等身分的友好立場上，我們不得不指出這種內在批判的缺乏思想含量。這個缺乏的後果很可能是：它在姿勢上反抗並實踐，但在知識上忠誠且怠惰。我們不能永遠地把自身當作一張歷史白紙了，僅在上面轉貼幾個進步大名(公共、正義、平等、自由、參與、多元、批判……)，讓它在街上、在人前，迎風獵獵，自以為義。而世界的不改乃至於向下，又恰恰好讓我們繼續為我們的憤怒、傲慢、「批判」與實踐 添柴積薪。該是反省我們的知識與政治的無效，乃竟至於「自利」的時候了。時代早已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我們總是充耳不聞的要求：對我們所存在的鄉土、民眾與區域，我們當以更內在於自身歷史的方式，提出創新性的視野與開拓性的解釋。

而這樣一個新的思想與知識事業，必然同時也是**人間的**。這是因為，當知識界開始質疑長期以來作為它北辰的「西方」、「現代」、「公民」、「資本主義」、「全球」、「歐美中心」與「都會」時，它必須要以全新的勇氣和智慧面對它向來所無視或輕視的「鄉土」、「傳統」、「民眾」、「社

會主義」、「區域」、「第三世界」與「後街」——而這恰恰是陳映真思想與文學中的「人間」，也恰恰是他在八〇年代下半所創辦的《人間雜誌》，以及後來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的落腳與用心之所在。

此刻，我們懷著戒慎警懼的心情，企圖承繼這一個從魯迅到陳映真以來的極重要但卻又被高度壓抑的**在地左翼傳統**。《人間思想》的自我期許是一個中文的國際刊物，在深耕在地的同時，把自身更緊密地鑲嵌在亞洲與第三世界的內在。我們要重新連繫上並挖掘出區域中具有批判性的思想資源、開出更廣闊的人間視野、對這個危機滿布的世界提出更貼近歷史的解釋，並尋找介入現實與開創歷史的新契機。

《人間思想》呼籲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知識分子，以及東亞區域知識分子，共同為一個歷史的、現實的、人間的思想事業共同努力。

**呂正惠：黯然回首，但要勇敢的面對新形勢（代序）**

1976年下半年我服完兩年兵役，從軍中回到台北，愕然發現台灣社會變得快不認識了。左翼鄉土文學潮流盛極一時，黨外運動的聲勢一天勝似一天，長期專制的國民黨應付惟艱。第二年，國民黨對鄉土文學發起總攻擊，余光中發表聳人聽聞的〈狼來了！〉，一時風聲鶴唳，到了1978年，卻平安無事的落幕。1979年美麗島事件爆發，幾乎所有黨外政治運動的領導人都被逮捕。但下一次選舉，所有被捕領導人的家屬，凡參選的全部高票當選。這兩件事證明，國民黨已經喪失了掌控全局的能力。

正是在這個充滿期待的時候，我逐漸感受到兩種令人隱憂的思潮正在逐步茁壯。首先是後現代，它先以後設小說及後結構之名出現，提倡文學的後設性及愉樂性，用以解構鄉土文學的使命感。其後，後現代之名堂堂出現，大言不慚的聲稱，台灣社會已超越現代而進入後現代，除了歌頌台灣的進步，還推出多元的價值觀，用以分散鄉土文學的聲音。另一項更令人不安的因素是，具有台獨傾向的本土化思潮日漸崛起，並以抨擊陳映真的大中國主義情結來壯大自己。到了1980年代末，左翼鄉土文學的勢力已極度萎縮，後現代與本土化思潮各據半邊天下。

多年後我慢慢了解，這兩思潮都有人在背後指導，實際上是更大的政治勢力運作的成果（詳情不必細說了）。再經過一段時間，我又體會到，台灣1970年代左翼勢力的沒落主要還不取決於台灣的政治勢力，而是國際局勢演變的結果。1989年至91年蘇聯及東歐集團的崩解、1989年大陸政治局勢的詭譎多變，導至了世界左翼力量的大消解，注定了1990年代是資本主義大復辟的時代。說實在的，當時台灣的左翼表現得也不好，但即使再好，也不能阻擋這種世界的大潮流。

整個1990年代，台灣的政局全由李登輝主導，應該說，本土化的思潮是在他主政下壯大，然後才可能產生2000年陳水扁的當選台灣總統。如果要回顧1990年代的文學思潮，那就是台灣文學本土論籠罩一切，而後現代思潮及其各種變體努力尋求對抗之道，至於統左派的聲音幾乎無人理會，這種情形到了陳水扁第二任的後半期，即2006—7年左右，才開始有了鬆動的跡象。

這也就是說，從1987年解嚴到2007年的20年間，本土化思潮及台獨的聲浪由日漸成長而如日中天，最後開始出現頹勢。現代化思潮，以及相關的對抗本土化思潮的各種

探索可謂五花八門，力求在台獨勢力之外另尋出路，而統左派的聲音始終不絕如縷。這大概就是這20年間台灣文學思潮的大勢。

劉小新這本《闡釋臺灣的焦慮》就是對這二十年間台灣文學思潮的剖析。他主要採取橫剖面的分析方式，按照他的思考邏輯，從後現代、後殖民、殖民現代性討論到新左翼和寬容論述。他把解嚴前就已出現的左翼鄉土文學和本土化思潮也放在這二十年的語境中加以剖析，因此並沒有著重追溯這兩種思潮產生的歷史與時代背景。這一點請讀者務必記得。

除了第七章所論的“寬容論述”我當時並沒有注意到，其他關於後現代、後殖民、殖民現代性，以及脫胎於後現代的新左翼，當時確實是極為流行的思潮，並為一般知識分子所熟知。但我還是想說，我讀完了相關的各章，還是感到非常驚訝，因為劉小新把每一種思潮的來龍去脈都梳理得非常清楚，許多我原來不夠注意的地方，現在才有了進一步認知的機會。應該說，劉小新對資料的整理與分析，都是將來研究這些思潮的人一定要參考的。

但是，我所以要為這本書寫一篇序，並不是要推介這

本書，因為根本沒有這個必要，任何人只要讀完了本書的第一章，自然就認識到這本書的價值。這篇序的主要目的，是要表達我對這二十年臺灣文學思潮的看法，並從現在的時間點進一步說明其問題性。

劉小新在本書的〈結語〉中說：

當代臺灣知識界引入（當代西方）各種理論資源對「何謂臺灣」和「如何闡釋臺灣」這兩個重要問題提出了充滿歧義的觀點和看法，這形成了一種極其複雜的理論格局，也帶來了理論的緊張和焦慮。（335頁）

在當時的我看來，這些所謂的思潮，不過是藉著臺灣問題在就他們所接納的當代西方思潮作一種理論上的「演練」，雖然他們自己認為與臺灣大有關係，我卻覺得根本就是摸不著臺灣的邊的無的放矢。我前面說，看了劉小新的書，我對當時的現象才有更多的認知，這是我要坦白承認的事實，因為很多文章當時就懶得看，覺得它們一點用處也沒有。1988年5月我曾在復刊的《文星》雜誌上發表一篇長文，題目是〈「現代」啟示錄——現代性的一則故事〉，內容是對於1980年代以後流行於西方的「現代性」理論和後現代思潮表示懷疑，認為這代表了西方思想的危機。而

當時的臺灣知識分子卻大量使用這些值得懷疑的西方思想，企圖解決臺灣的定位問題，這不是癡人說夢嗎？應該說，那時候我確實是「閉關自守」，把充斥於刊物上的一切新理論排拒在外（當然，這並不是說，我一點也不讀西方著作。）

但我對西方後現代思潮的懷疑，也並非一時心血來潮的胡思亂想。當時我先看了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書，發現他們都認為西方工人階級已經不革命了，因此，他們主張社會「異類份子」的反叛，主要是學生的反叛。這個反叛失敗了，然後開始流行後現代思潮。我的直接感想是這樣：西方社會已經非常發達，連工人生活都不錯（甚至好過落後國家的知識份子），而西方的思想家卻連這一點都沒想過，他們一點也沒考慮到除了歐美社會之外的廣大落後國家的貧困狀態。這不免讓我覺得，西方思想家怎麼一點都沒有從全球的立場考慮整體人類的前途，怎麼一點「民胞物與」的精神也沒有？這不證明，他們的思想已經不具有前瞻性，而陷入「富極而無聊」的思想泥淖中了嗎？因此，我就大膽判斷，西方思想界已經進入了一個整體性的、無能思考的危機時代。

我當時的想法當然沒有人會相信，我的那一篇文章沒

有任何回應，但我一直相信自己的想法是對的。此後，我一直透過大陸的翻譯，注意西方學者的思想動態。我主要的注意對象不是思想著作，而是歷史著作，因為歷史學者比思想人物對時代的變化更具敏感度。在歷史著作中，談到西方未來發展困難的並不少見。最讓我感到意外的是，2010年我買到一本厚達650頁的大書，里亞·格林菲爾德的《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上海三聯書店，2010），書開頭她為本書中譯本所寫的前言就讓我欣喜莫名，她說：

我們正面臨著一場歷史巨變。我們敢於如此斷言，因為促成這一巨變的各種因素已經齊備，我們只須等待它們的意義充分顯露出來。除非那個至少能夠消滅人類三分之一的前所未有的浩劫（按，指核子戰爭）降臨人間，否則沒有什麼能夠阻擋這一巨變的發生。這一巨變就是偉大的亞洲文明崛起，成為世界的主導，其中最重要的是中華文明崛起，從而結束了歷史上的“歐洲時代”以及“西方”的政治經濟霸權。

這一變化只是在新千年到來後的最近幾年才開始變得明顯……

這也就是說，世界史上的“歐洲時代”（從十六世紀開始）即將結束，“亞洲時代”、坦白說即是“中國時代”即將來臨。格林菲爾德是一個專業的社會學家和社會人類學家，但同時具有深厚的經濟學、政治學和歷史學的素養。從1987年到2001年，十四年間寫了兩本大書，在前面提到的那本書之後，還出版了另一本《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中譯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她是一個具有歷史眼光的社會、經濟學家，不像我只是一個愛讀書的外行人，這證明我在二十多年前的靈感，並不純是愛國心的表現。

我猜測，里亞·格林菲爾德一定也像我一樣，被2008年美國的金融大海嘯所震撼。任何人都可能猜想得到，就在蘇聯崩潰、美國獨霸全世界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會隱藏著這麼重大的危機。這個危機接著引爆了歐洲的經濟危機，到現在為止，沒有任何經濟學家敢於斷言，西方經濟可以恢復到以前的狀態。回顧起來，我們難道不是可以說，西方的後現代思潮正是對於這一危機的非常敏銳的、先機性的思想上的回應嗎？

再說到臺灣。1980年代的臺灣，經濟上似乎生氣勃勃，

「臺灣錢淹腳目」，大家得意洋洋，所以認為自己已經從現代進入後現代了。相比之下，大陸還非常落後，幾乎還停留在前現代，因此也無怪乎新潮思想滿天飛。大家沒有想到的是，臺灣經濟是標準的依附型經濟，沒有美、日就沒有臺灣，誰能保證後臺老闆永遠發達呢？當然臺灣的知識分子當時都相信，世界永遠是美國的世界。

如果我們稍微敏感一點，就能體會到，臺灣經濟在李登輝的最後一任（1996—2000年）已經出現了頹勢。陳水扁的第一任（2000—2004年）大家並不滿意，要不是兩顆子彈事件，他不可能連任。關鍵就在經濟，因為陳水扁在任四年，只有一次幅度極小的加薪，加上李登輝的最後幾年也沒加薪，大家都感到收入在減少。現在則非常明顯，失業率一直在提升，收入一直在減少，臺灣的中產階級很少人敢再作夢，臺灣的年輕人前途茫茫，這是大家普遍感受到的，根本不需要論證。如果把現在的心情，對比二十年前後現代思潮流行時的歡騰氣氛，能不令人黯然？因此我相信劉小新這本書，我們現在讀起來，一定很不是滋味。這就彷彿我們已經破落了，卻在反顧我們的輝煌時代。不過這種反顧還是必要的，這能夠讓我們體會到，在歷史的長流中不可以太短視，不然受到傷害的還是自己。這是我

讀劉小新的書所想到的第一點。

我想說的第二點，是本書中第六章關於後現代與新左翼思潮的討論。劉小新對於從後現代產生的新左翼思潮特別有興趣，這一章長達122頁，是全書中最長的一章。其中涉及南方朔、杭之和《南方》雜誌的「民間社會論」、《島嶼邊緣》的「人民民主論」，以及《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的「民主左翼論」。「民間社會論」的一些主要參與者，大都有本土論傾向，恐怕跟後現代思潮無關。《島嶼邊緣》和《臺社》具有後現代傾向的人我大都認識，我要談的主要是後面這一群人，尤其是跟我有深交的陳光興和趙剛。

不管是人民民主論，還是民主左翼論，都被迫面對一個無法克服的現實問題：臺灣最大多數的人口是閩南族群，占臺灣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可以說是「人民」中的絕大多數。然而這些「人民」卻被本土論及民進黨所裹脅，成為「民粹威權主義」下的群眾，成為1990年代臺灣新霸權論述的基礎。我自己身為南部閩南族群的一份子，深切了解這本來是南北差距和城鄉差距的結合體，本質上是區域差距和階級問題，但由於國民黨長期的不良統治，卻形成省籍問題，最後上升為統獨問題。但我對此無能為力。也

因此，我一方面希望讓人民民主論的人了解，如果不能理解臺灣南部的民眾，他們的人民民主也就落空了；但同時，我也非常同情人民民主論者，因為他們也是「人民」，然而卻在佔據四分之三人口的主要人民的無形壓迫之下，艱難的尋找生存空間。從這方面講，雖然我不贊成《島嶼邊緣》和《臺社》主要的思想傾向，但卻不得不佩服他們探索的勇氣。在臺獨派的「民粹威權主義」和右翼的後現代思潮（一味的頌揚臺灣的經濟和政治成就）之間，實際上只剩下極狹窄的空間，然而，他們堅持不懈的想要殺開一條血路。

我完全沒有想到的是，這裡面最勇敢的兩個人，陳光興和趙剛，竟然逐漸接近陳映真了，而且終於把陳映真的第三世界論作為他們重新出發的起點，這真是大大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這說明，具有左翼精神的、想要探求真正的多元價值觀（相對於和稀泥的多元觀）的人，只要真心實意，確實可以走出一條獨立思考的道路。

陳光興、趙剛，還有鄭鴻生（他跟我一樣，也是出身南部的閩南人），為了表達他們對陳映真的敬意，決定接受人間出版社的邀請，共同合作出版《人間．思想》雜誌，作為他們長期探索的另一個階段的出發點。這對臺灣思想

界來說，是一個莫大的好消息。他們在〈發刊辭〉中說：

西方各種流派的名詞概念不停地被翻譯成中文，組裝為各派反抗行動的套件，再貼上台灣主體性的商標，於是就成為各派所標榜的進步知識品牌。憑依著它們，某種「代理人戰爭」一直在這個島嶼上樂此不疲地持續著。

這真是慨乎言之。如果我們仔細閱讀劉小新這本書所討論的許許多多的所謂新思潮，差不多就是在印證這段話。

正如我在前文已經提到的，里亞·格林菲爾德所說的，新千年可能預示了西方統治世界五百年霸權（如果從十九世紀中葉西方真正征服全世界算起，其實不足兩百年）的終結，那麼，新千年也是舊的知識結構開始失去功能、新的知識結構開始形成的時期。我們應該從這樣的起點來讀劉小新這本書，來認識到我們不久前還在套用西方沒落時期的理論來為臺灣的未來尋找答案，而且說得煞有介事；以此來對比我們現在的處境、我們現在的徬徨，這樣，我們就更應該提起勇氣，重新出發去探索新的認知方式，以及新的未來。

2012/9/4

## 呂正惠：“現代”啟示錄——現代性的一則故事

從七十年代後半期開始，西方思想界逐漸產生變化。在前一個階段居於主流地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似乎已過了高潮，而為另一股趨勢所取代。這一新趨勢本身也非常複雜，無法以一個單純而統一的名詞來加以指稱。不過，在眾多的討論之中，我們逐漸會發現一些要點；而在這些要點之中，“現代性”（Modernity）和“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無疑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至少我們可以說，誰要認識西方八十年代的思想潮流，誰就要注意到“現代性”、“後現代主義”及其相關問題。

從歷史的、巨視的觀點來看，有關“現代性”和“後現代主義”的討論，其實是近數百年來西方人對於自己歷史命運思索的一個新的轉折。我們當然可以把卷帙浩繁的有關著作，加以釐清，加以歸納，因而把“現代性”的種種看法，分成種種類型。但是，在我們做了這許多辛苦的工作，獲得了許多寶貴的知識以後，也許我們還不能明白，西方人“為什麼”要在八十年代討論這些問題，而在這些

討論之中所呈現出來的種種看法又具有什麼“意義”。我覺得，在這一方面，歷史的、巨視的觀點對我們會有極大的助益。因此，在本文裡，我想把有關“現代性”的“故事”追溯到較早的文藝復興時代；想透過極粗略的歷史回顧，來突顯出“現代性”問題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特殊意義。

## 人文主義理想的演變

何謂“現代性”？用馬歇爾·柏爾曼(Marshall Berman)的話來說，“現代性”是一種特殊的經驗模式——有關時空意識、有關自我與他人，以及生活的可能性和危機感的經驗模式。也就是說，“現代性”是指現代人在現代世界所感受到的特殊的經驗模式。現代人生活在“現代”之中，認識到“現代”是不同於以前任何時代的一個特殊時代；生活在這一特殊時代的人，有他們特殊的歷史條件與歷史命運；“現代性”就是對於這一切經驗的總反省，是要對“現代經驗”作一個整體性的“界定”。

從理論上來講，自從人類具有“時間意識”以後，任何時代的人都可能會有一種感受，即：他是生活在一個與

以前完全不同的時代。不過，據德國文學理論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的研究，以modern一詞來指稱自己的時代，以別於過去，始自於五世紀後期；因為那時基督教已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這跟以前的異教時代是截然不同的。此後，凡是想把自己的時代獨特化，以便和以往的歷史區別的，即稱自己的時代為modern。

但是，就西方的歷史而言，modern一詞逐漸取得特定的意義，而變成是和ancient、medieval鼎足而三的階段，如一般人所知，這裡的modern指的是，文藝復興以後的時代。這種意識的modern，一直延續到現在。從這一歷史的分期我們就可以知道，由modern所產生的modernity的問題，實際上從文藝復興的時代就已開始。

就歷史的（特別是文化史的）回顧的眼光來看，文藝復興以降這一長期的、不間斷的“現代史”，還可以細分為三個階段。從文藝復興到十七世紀末的“今古之爭”（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是一個階段；從“今古之爭”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象徵主義為先鋒的現代主義（Modernism）的興起，是另一個階段；現代主義產生以後，又是一個階段。以最簡化的方式來說，第一個

階段是modernity的萌芽，第二個階段modernity發展到顛峯，到第三個階段，modernity受到嚴重的挑戰，引起種種的反省。

文藝復興的基本主題是：“人”的發現。在中世紀，以基督教思想為主導的文化體系，把神和天堂作為重心，而將塵世中的人附屬於其下。這種天上“指引”地上的經驗模式，在歷史進入文藝復興以後，開始受到挑戰。文藝復興是要把“人”從“神”的護持之下解放出來，並賦予“人”本身的能力與價值。也就是說，在基督教的思想裡，“人”的價值不能獨立於“神”之外，文藝復興則正是要肯定“人”本身的獨立價值。這就是一般所謂的“人文主義”（或稱“人本主義”）。

但是，在基督教長期統治之後，當人們開始要去追求“人文主義”的生活經驗（亦即“現代性”）時，他們除了自己去摸索與冒險之外，他們還要過去的歷史經驗來作為指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發現了未被基督教宰制以前的希臘羅馬文化，亦即“古代”文化。在古代文化中，他們看到真正的“人”，自由的“人”，未被“神”的陰影籠罩的人。於是，當他們要透過思想來為新發現的“人”

尋求“界定”時，他們乞靈於“古典”——古代文化的經典。這也就是說，第一階段的“現代性”，是經由“古典文化”來加以闡釋。這就是一般所通稱的“古典主義”，或者，更精確的講，“新古典主義”——以別於希臘羅馬的“古典主義”。

“新古典主義”文化萌芽於文藝復興的發源地義大利，但卻在十七世紀的法國發展到巔峯。在這時期，法國產生了一群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如笛卡爾、巴斯卡、莫里哀和拉辛。這就促使人們開始反省，“現代”是否還要依附於“古代”。這種反省，以“現代作家是否必然劣於古代作家”的形式出現，在十七世紀末產生了“今古之爭”。經過激烈的爭辯以後，人們事實上已經承認，現代作家有他獨立的價值，可以跟古代作家並駕齊驅。“現代派”的勝利，等於最後宣告了“人文主義”的成功。“人文主義”在經過古典文化的長期撫育之後，已經完全可以獨立自主，西方人追求“現代性”的第一階段也就此落幕。

就這樣，西方人經過“新古典主義”時期的追尋與努力，終於完全肯定自己的能力。從此以後，他們開始以勇猛精進的精神去拓展他們的“現代生活”，因而進入“現代

性”的第二階段。

這個階段的開頭，是十八世紀的啟蒙時代，啟蒙思想家揭櫫“理性”的大旗，認為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人類終將破除蒙昧，而在“進步”的坦途中，將歷史帶向最高的光明。這可能是西洋“現代史”上具有最純粹的希望的时代，因為，人們對掃除過去时代遺留下來的“罪惡”充滿信心，但對於尚未完全實現的“現代性”卻還沒有預見它的罪惡。這是大革命之前艱若奮鬥但卻志高氣昂的樂觀時期，就在這時期中，人們為“現代性”擬測了最美好的前途，為人類預定了最美好的理想。

大革命終於來臨了。革命的來臨把人們懸想中的“現代性”逐漸的、一一的呈現在人們之前。這是波瀾壯闊的，但卻也是美惡雜陳的。它的惡，出乎人們想像的巨大，嚇壞了很多人，使他們開始反對“現代性”，如浪漫主義者；但也刺激了另外一些人，使他們重新考慮“現代性”，如社會主義者。但大體而言，在大革命之後獲利的資產階級基本上是歡迎這一個新時代的。在政治上，他們逐漸取得了政權，在經濟上，透過新興的工業生產方式，他們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物質文明。因此，不論政治現實和意識型態多

麼的繁複多變，十九世紀的西方人基本上還是樂觀的——只有部分的浪漫主義者，以及更少數的現代主義的先驅（如福樓拜和波特萊爾）是例外；甚至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也是樂觀的，因為他們把希望寄託在更遠的未來。

然而，二十世紀開頭的一場國際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卻真正把大部分的西方人都嚇壞了。他們萬萬想不到，美好的“現代性”藍圖，竟會以這種赤裸裸的方式“實現”出來。文藝復興以降的，以“人”為主體的“人文主義”理想，怎麼會以這麼殘酷的方式在人們面前徹底毀壞呢？——為什麼？就在這一問號下，“現代性”開始受到根本的質疑，而進入到命運坎坷的第三階段。

### 一次大戰後的“現代性”危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把文藝復興以降的“現代性”的持續發展打斷了，並且“全面”地暴露了“現代性”的潛在危機。因此，我們不難了解，“現代性”的第三階段，即二十世紀所呈現的“現代性”是對“現代性”的總檢討。這個檢討，當然不可能具有“一致性”，必然是繁複多變而充滿矛盾的。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在法國大革命發生，“現代性”

逐步體現的十九世紀，敏銳的人（如浪漫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已強烈感受到“現代性”的一些潛在問題。但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以理性、進步、科學實證和工業生產為基本面貌的“現代性”，在十九世紀還是居於主導地位。必須等到十九世紀末，尤其是到第一次大戰發生以後，原已存在的、對於“現代性”質疑的思想，才完全表面化，而成為二十世紀的主要思潮。所以我們可以說，在一次大戰以前，“現代性”的面貌“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在二十世紀，“現代性”由於成為“問題”，引發種種討論與爭辯，就呈現了“多樣性”。我們不應忘記，“現代性”、“現代主義”等名詞，不論在字源上可以追溯到多遠以前，主要還是在二十世紀的思潮下才成為關鍵字眼的。

大體而言，二十世紀有關“現代性”的爭辯，可以分成三種派別：第一種是“反現代性”(anti-modernity)的；第二種是要“辨證地揚棄”“現代性”，即揚棄其“罪惡”，以使其真正的理想能夠實踐；第三種則是為“現代性”辯護，認為“現代性”沒有根本的困難。

“反現代性”思潮的源頭，是十九世紀初期的浪漫主義。浪漫主義有兩個著名的口號：回返自然，回歸中世紀；前

者反對的是“工業化”，後者反對的是“現代化”。很明顯，這是跟“現代性”針鋒相對的。浪漫主義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是絕對不容忽視的，因為以後一切“反現代”的思想家和文學家，追根究底來說，都具有“浪漫主義”的本質。

浪漫主義在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變形，在福樓拜和波特萊爾的藝術實踐中得到轉化。如果說，浪漫主義者還覺得“現代性”可以加以阻擋，那麼，福樓拜和波特萊爾根本就放棄了這種希望。為了對抗“現代性”，他們兩人唯一可以找到的武器就是“藝術”。他們是一切現代主義的源頭。

這種以自己建造的“藝術王國”來反對“現代性”的努力，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逐漸得到全面性的實現。先是頹廢派、象徵主義與美學主義，接著是一連串的新的藝術流派。藝術家似乎在彼此的相異之中一致的向著一個共同的敵人“現代性”進攻。在這總名為“現代主義”的潮流中，我們看到“現代性”的深刻危機。這絕不是一小撮藝術家在那裡搞小陰謀，而是，凡想要反“現代性”的人就極可能成為藝術家，而投到“現代主義”的陣營中。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反現代性”的潮流，在法國主

要是以藝術的“現代主義”這種形式來加以表現（當然也包括一些哲學家，如柏格森。）但是，在德國，情勢就有所不同了。德國“反現代性”的浪潮似乎特別的強大，幾乎包括了當時重要的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文學家。他們在理論上最主要的成果之一是：把關於人的科學和自然科學區分開來。在意識型態上來講，他們這種區分無疑是要特別突顯出“人”本身獨特的“理性”以有別於“自然”的“理性”。在這裡，他們無疑是要暗示，“現代性”的最大錯誤是，以“自然”的“理性”來衡量“人”，因而抹煞了“人”本身的價值。這種思考方式，深切的影響了二十世紀的思想，是德國“反現代性”思潮對二十世紀人類的巨大貢獻。

也許有人會覺得，這種理論並不是對於“現代性”的“反抗”，而是“修正”。這似乎可以言之成理，但其實還是不能成立的。試以這時期的中心人物韋伯來說。韋伯社會學的基本課題是：以歷史的、巨視的方法來證明：官僚化的、理性化的資本主義體系為何“只”在西方產生？換句話說，就是：“現代性”為何會出現於西方？而任何人都知道，韋伯很清晰的意識到，理性化與官僚化是不可克服的，也就是說，不管你喜不喜歡，你對“現代性”將無可奈何。韋伯的“理智”很值得讚嘆，但韋伯無疑是悲觀的。

以韋伯為代表的德國的“反現代性”思潮，盧卡奇稱之為“浪漫主義的反資本主義”（Romantic Anti-Capitalism）。從“反資本主義”可以知道，這是“反現代性”的，而“浪漫主義”則表明，這種反抗是“無效的”、“非理性的”。這可以看出，盧卡奇對這一思潮的態度。為了批判這一思潮，盧卡奇寫了一本八百多頁的大書，書名是：《理性的毀壞》（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盧卡奇也以同樣強烈的態度來批判藝術上的“現代主義”。從這雙重批判可以看出，盧卡奇認為，二十世紀西方“反現代性”（用盧卡奇的話是“反資本主義”）走的根本是一條死胡同。

很明顯的，在對“現代性”的思考中，盧卡奇是屬於另一流派，即“揚棄”“現代性”那一派。這一派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初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烏托邦社會跟浪漫主義一樣，都看到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所呈現出來的“現代性”流弊。但是，當浪漫主義者因此而反對“現代性”時，社會主義者卻認為，“現代性”可以經過“修正”而實踐得更為完美。

就這方面來講，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的集大成。就

馬克思的立場來說，十九世紀“現代性”（即“資本主義”）的弊病，並不在於工業生產與政治革命，而在於，它並未把文藝復興和啟蒙時代的“理想”“真正的”、“全部的”實踐出來。十九世紀的“現代性”，實際上只解放了資產階級，但更大數量的無產階級並未獲得解放。只有所有的人都真正的得到解放，政治革命才算完成，而工業生產也才算被所有的人都享受到。所以，問題不在於文藝復興以降的“現代性”出了毛病，問題在於：“現代性”（文藝復興的理想）根本還沒有得到最後的實現。

這就可以看得出來，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十九世紀“現代性”的揚棄，和現代主義者及韋伯對於“現代性”的浪漫主義的反抗，是截然不同的。前者認為，個人可以透過無產階級的革命，達到真正的解放；而後者則竭力的突出個人，以和逐步理性、官僚化、庸俗化的“現代性”對抗。以馬克思主義的眼光來看，後者無異螳臂當車，根本沒有出路可言。以現代主義和韋伯的眼光來看，前者實在是提出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來騙人。就韋伯來說，如果那種理想可以實現，那結果也必然是理性化、官僚化了的。

## “反現代性”思潮的崛起

就二十世紀的歷史來說，“反現代性”的思潮只在文化上反對資本主義的體制，在實際政治上並未有所行動。真正想在現實之中推翻資本主義體的是，想要“揚棄”現代性的馬克思主義。

一次大戰以後，資本主義的確處於驚濤駭浪之中。在大戰的最末期，馬克思主義出乎意料之外的在資本主義尚處於萌芽階段的俄國取得了政權。不過，在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英、法、德三個，工人運動也非常蓬勃。尤其是戰敗的德國，無產階級的革命實際上已經走上歷史舞台。這一“揚棄”現代性的行動，雖然最後被壓平了，但德國所付出的代價也非常慘重。為了獲得大家夢寐以求的安定，德國人甘心把自己奉獻給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至於英、法兩國的資本主義，則在馬克思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中求生存。最後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由於新興的美國的加入，終於與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聯手打敗了法西斯。

資本主義就在這種形勢之中，於二次大戰後重新站穩了腳步。也就是說，經過三、四十年的危機，“現代性”似乎重新獲得了肯定。這是“現代性”的第二個高峯，可以

媲美於十九世紀。在戰後二十年的安定與發展之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人幾乎都認為，“現代性”的危機已經完全克服，並證明了它是人類歷史的頂點，是其他“落後”國家“現代化”的楷模。

在這種情形下，馬克思主義被認為是心懷惡意的意識型態，而人們已在歡呼，馬克思主義錯了，“意識型態”已經結束了。就這樣，“揚棄”現代性的潮流似乎已經終止了。至於“反現代性”的思潮，則被吸收到資本主義的新秩序中，成為其中的一分子，喪失了原先的反叛性。這也就是說，“現代性”復歸於統一，“現代性”的問題全部解決了。

可以想見，在這一時期所產生的有關“現代性”的思考，當然是要護衛“現代性”了。這就是上一節所說的，本世紀對於“現代性”的第三種看法——第三種潮流。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思（Talcott Parsons）以功能主義的觀點來分析社會結構，先預設了社會的合理性而不再對其存在基礎加以質疑，基本上就是完全肯定了“現代性”。

更直接的表明對於“現代性”的護衛的，是另一個美國社會學家丹尼·貝爾（Daniel Bell）。前面提到的“意識型態的結束”，就是他一本著作的名字。在另一本書《資

本主義的文化矛盾》裡，他攻擊本世紀初期的“現代主義”。他認為，資本主義的問題在於文化與社會脫節。“現代主義”的文化未能深入的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日常生活結合在一起，因而使社會產生了裂痕。也就是說，對於“現代主義”的“反現代性”，他把責任歸之於“現代主義”，而非“現代性”。

就是在這個時期（六十年代），“後現代”與“後現代主義”的名詞開始在美國出現。“後現代”意謂著“現代性”已進入到一個新階段，也就是重新穩定下來的更高的階段。而“後現代主義”則意謂著，對於“反現代性”的現代主義的超越。很明顯，這種意義的“後現代”與“後現代主義”基本上是在護衛“現代性”，這跟八十年代起重新開始討論的“後現代”與“後現代主義”是有極大差異的。

這種差異的根本原因是：在六十年代與八十年代之間，隔著一個“新左派”的大反叛時期。事情是這樣的：由於越南戰爭與石油危機的影響，那個號稱已不成問題的“現代性”又開始出現了“問題”。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在經過二十年的超級安定與發展之後，又再度出現了危機。相應於這一危機，那個號稱已經錯誤、死亡的馬克思主義也再度復活。隨著六十年代後期學生運動的擴大，馬克思主義

又在西方流行起來。西方人終於被迫承認，要有效地解釋“現代性”，馬克思主義無論如何是少不了的。

但是，六、七十年代重新在西方復活的馬克思主義和世紀之初的馬克思主義是有所不同的。世紀之初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揚棄”現代性的基本武器是無產階級革命。但六、七十年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大都承認，西方的無產階級已經喪失了革命性。指引他們的思想的，已經不再是過去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而是，以法蘭克福學派為核心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在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的影響之下，他們相信，新的革命必須依靠社會中的“異類分子”如青年學生，婦女和少數民族。

這種以青年運動為前鋒的“新左派”革命，具有鮮明的主觀色彩，沒有辦法獲得成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馬克思主義雖然因為這一次“革命”的影響，開始進入到莊嚴的學術界；但作為社會運動和思想潮流，到了七十年代後期，“新左派”就逐漸的喪失了活力。“二次革命”的熱潮既退，那在六十年代一度被提出的“後現代”與“後現代主義”又重新引起爭論，並被提昇為八十年代西方思潮的重心。

## 八十年代對“現代性”的整體質疑

要了解八十年代有關“現代性”和“後現代主義”的思潮，我覺有兩點認識是非常重要的。首先這一思潮是六十年代新左派學生運動失敗之後的產物，這一點在法國尤其明顯。法國後結構主義在有關“後現代主義”的討論中，一直具有深遠的影響，有些人甚至還把“後現代主義”等同於後結構主義。而後結構主義，可以說就是在六八年法國學生革命失敗之後才流行起來的。

一般來講，革命失敗後的藝術與思想常常有兩種傾向，即保守主義與虛無主義。保守主義是基於對前一階段的革命的反動，虛無主義是基於對前一階段的革命的失望。八十年代有關“現代性”的思潮，也可以用“非此即彼”的方式加以區分。以革命者的眼光來看，虛無主義的思想雖然貌似激進，但其實對“維持現狀”還是有間接的助力。就是在這種觀點下，哈伯瑪斯和培里·安德生（Perry Anderson）都毫不猶疑的把法國具有虛無主義傾向的後結構主義思想家，如傅柯、德希達、李約塔（Jean-Francois Lyotard），稱為保守主義者。

其次，以“現代性”和“後現代性主義”這一類的觀念，來反省“新左派”革命失敗後西方社會的前途問題，基本上就是一種“反歷史”的思考模式。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說，我們可以把十八世紀末以來的西方社會發展分成三個階段，即：市場（或古典）資本主義、壟斷（或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跨國化資本主義。我們可以在這種經濟發展的框架下來考慮，近代西方社會在不同階段所面臨的不同問題。從這種歷史發展的觀點來透視，西方社會的未來命運就可以從比較“具體”的角度來加以分析。

當然，歷史也可以不從馬克思的觀點出發，而採取韋伯或其他歷史社會學的理论，來分析西方社會。但無論如何，西方近代社會是一個“連綿不斷”的“發展歷程”。對這一歷程及問題的反省，不應忽視其“時間性”與“歷史性”，而只提出一個“現代性”的範疇來總括幾世紀以來的一切問題。有關“現代性”的思考方式，就是想以一種抽象性、哲學性的觀點，來提出一個“現代社會”的根本問題，並企圖加以超越。這種反省模式，即使不說是“保守的”，至少也是“反歷史”的。

我們在前面三節追溯西方近代歷史時，基本上是以“現

代性”思想家的方式來加以敘述。如果換成一個歷史家的角度，那就完全不一樣了。歷史家可能用上許多政治、經濟、社會名詞，卻一點也不提及“現代性”，但我們仍然了解，這是西方的近代史、現代史。而且我們應該可以同意，歷史家的講法比較能夠具體的讓我們掌握近代西方人的命運。

再換個角度來說，不論我們讀的是黑格爾或海德格的哲學著作、馬克思或韋伯的社會學著作、波特萊爾或卡夫卡的文學著作，我們知道，他們是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區對他們所處的現代社會作出敏銳的反應。對於這樣的著作，我們可以有兩種闡釋方式。第一種，我們找出黑格爾或波特萊爾所處的具體的歷史時空，以此歷史條件來解釋黑格爾為什麼會這樣想，波特萊爾為什麼會那樣想。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思考方式。第二種，我們說，不論是黑格爾、海德格、馬克思、韋伯、波特萊爾，還是卡夫卡，他們都生活在現代社會中，都體驗到“現代性”。我們要研究他們對“現代性”的種種反應，並從此得出一個解決“現代性”問題的方法。這是八十年代“現代性”思想家的思考模式。

從這種比較就可以知道，八十年代的“現代性”思想家，是要把幾百年來西方社會的歷史問題化成一個整體性的、抽象性的哲學問題來加以思考。這種思考方式基本上是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背道而馳的。所以在前面提及的，二十世紀對“現代性”的三種不同反應的流派（反“現代性”、揚棄“現代性”、護衛“現代性”）中，想要揚棄“現代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最不喜歡用“現代性”這種名詞。即使他們用了，他們也都努力把它擺在一個明顯的歷史時空，特別是經濟發展架構中（詹明信就是明顯的例子）。

不過，不論八十年代“現代性”思想家的思考模式多麼的抽象化、多麼的超越時空，這一現象卻反映了一種特殊的歷史意義。近代的西方思想家，從十八世紀法國的啟蒙學者、十九世紀德國的唯心論哲學家，到二十世紀德、法兩國的存在主義思想家，不論他們的思想如何從現代社會中出發，不論他們的思想對現代社會問題作出了多麼敏銳的反應，他們從來沒有把“現代性”提出來作為一個明顯的“範疇”。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現代性”卻成為思想界的重點，被提出來當作哲學問題來加以討論。這就表明，西方現代社會的“問題性”已到了一個總檢討的階

段。也就是說，從文藝復興以來，從不同時代不同角度所反映出來的“現代社會”問題，如今已集中在“現代性”這一範疇上，整個的被提出來。就某種意義來說，這種算總帳的思考方式，其實就代表了：西方現代社會的危機已到了最高階段，思想家因而不得不對這一“現代性”起了整體的懷疑。

這一質疑明顯的表現在，“現代性”思想家對於啟蒙思想的反感。啟蒙思想家所標榜的科學與理性，現在幾乎已成為現代資產階級革命的基礎。這就證明了，八十年代的“現代性”思潮（即對“後現代社會”的追求），事實上是早期浪漫主義與現代主義那種“反現代性”傾向的延長。這種非理性的反現代性，明顯的只代表了一種主觀的願望，完全沒有客觀的實踐基礎。

這一思想上的困境，也可以在哈伯瑪斯的理論體系中看得出來。哈伯瑪斯非常明確的反對以法國後結構主義為代表的那種反啟蒙思想，在護衛並揚棄啟蒙思想家的“理性”這一點上，可算是難得一見的中流砥柱。因此，培里·安德生拿他來跟法國的後結構主義作對比，認為他是進步的，而法國思想家則是“保守的”。不過，哈伯瑪斯為克服啟蒙

思想的弊病所提出來的“溝通理論”，恐怕也未必有多少的實效。這種精細的理論建構，到底具有多少實踐的可能性，是很值得懷疑的。

總括起來講，在八十年的“現代性”思潮中，哈伯瑪斯代表“揚棄現代性”的一派，法國後結構主義代表“反現代性”的一派。跟早期的馬克思主義來比，哈伯瑪斯的“革命性”顯得多麼蒼白無力；跟本世紀初的現代主義相比，後結構主義“反現代性”的虛無主義和主觀主義色彩又顯得更加的強烈。所以，整個的看起來，八十年代的“現代性”思潮實在是西方現代社會進入高度危機時代的思想表現，是現代西方思想家在探討西方現代社會的前途時所作的一種無效的思考。

復刊《文

星》 1988年5月號

補記：重讀二十四年前的這一篇文章，非常驚訝，不知道哪來的信心，寫出這麼大口氣的文章。不過從現在的

時點來回顧，好像也不太離譜。寫了這篇文章的第二年，大陸的改革開放碰到了大挫折，東歐集團也垮了，再過兩年，蘇聯也解體了。西方集團歡呼：資本主義勝利了，歷史終結了。此後，他們的價值觀被稱為“普世價值”。台獨派聲勢喧天，中華文化被踩在腳底下。我有十多年時間，“氣結不能言”，只能“痛飲狂歌空度日”。2005年，我突然感覺中國局勢基本穩定，心情為之舒暢。再過三年，美國金融大海嘯，西方經濟出現大問題，幾乎可以肯定，西方霸權時代就只剩尾聲了，距離蘇聯垮台也不到二十年，歷史真是太奇怪了。現在也許可以寫一篇《西方現代性的完結篇》，但自覺準備不足，以後再說吧。

2012/9/10

劉大任：反芻民族主義

主持人、各位朋友：今天在座包括關心釣魚台問題的國際學者、老保釣和年輕朋友，大家同聚一堂，十分難得。尤其難得的是，這次會議的主調，不再是「懷舊」，而轉為

反思、向前看。我一向不太喜歡「懷舊」，除非其中有新意。但是，幾十年不見的老戰友重聚，加上老戰友之中，郭松棻、李我焱、袁旂等人，都已先後過世，讓我不期然想起宋朝詩人陳與義（簡齋）所寫的〈臨江仙〉，其中，「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的確如實地表達了我們的心情。同時，我又覺得，同一首詩裡，「杏花疏影裡，吹笛到天明」這兩句，不也正好是形容大伙當年，為了保衛釣魚台，奔走呼號，日以繼夜；為了擴大影響，示威、遊行、寫文章、編刊物、辦電台、演話劇……通宵達旦、不計成敗、忘我投入的那段青春歲月！

我要談的題目是：反芻民族主義。這個題目不是主辦單位指定的，是我自己擬的。為什麼選這個題目呢？民族主義是個老生常談，初中公民課本就已經普遍介紹了，早已成為我們常識的一部分，而且，對不少人而言，變成了根深蒂固的一種「思想」，甚至成為判斷事理的一種「標準」。不論我們所說的「民族」究竟何所指，它都有可能形成非常強烈的情感。

今天讓我回顧發生在四十年前的保釣運動，首先想到的就

是民族主義，為什麼呢？有一個問題，在過去的這不算短的歲月裡，常常困擾我：保釣運動初起，左、中、右三派，為什麼走到一起來了？又為什麼最終鬧翻，分道揚鑣？想來想去，我不能不承認：運動前期的三派合作，有一個重要的原動力，當然也有其他因素，但激發情感並產生行動的一個重要力量，我認為就是民族主義。而運動後期的三派分裂，我覺得，有一個重要的破壞力，當然也有各種其他因素，但，作用最大的，我想，還是民族主義。

這個論述，乍聽之下，不是有點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怎麼會有這樣的東西呢？它既是創造性的原動力，又是破壞的兇手，有點莫名其妙吧，不是嗎？所以，民族主義這個東西，的確有點古怪，表面上看，好像理所當然，實際上，深一層想，卻未必如此，需要我們仔細解析一下。首先，從常識層面看。常識層面的民族主義，我們可以這麼理解：它在人們的心裡，好像先天存在著一種主觀的判斷好壞、是非、對錯的價值標準。價值標準成立了，接著便產生情感，繼而發展成態度。情感可能相當強烈，態度也可能具有極強的排他性。

以常識觀點來理解民族主義，對我們中國人而言，是輕而易舉的事。稍微讀一點近、現代的歷史，便可以發覺，所有歷史記載的大人物，幾乎沒有一個不是所謂的民族主義者。然而，這樣的理解方式，能幫助我們澄清問題嗎？

試舉一例。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中，康有為和梁啟超以及變法犧牲的六君子，固然是響鑼鑼的民族主義英雄人物，然而，你能說，慈禧太后和保皇派以及義和團，不是民族主義者嗎？他們的口號是「扶清滅洋」，意思就是：保衛自己的國家，消滅侵略、欺負我們的洋人，這難道不是民族主義？

所以你看，如果從常識觀點理解，民族主義很可能代表截然不同有時甚至針鋒相對的內容。

當代研究中國的西方專家，基本上已經取得這樣的共識：毛澤東和他代表的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和他代表的國民黨，這兩股政治力量，影響中國現代歷史，甚至影響現代世界歷史都非常巨大，可是，在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眼中，最後的結論——他們都是民族主義者。

魯迅是民族主義者，胡適之難道不是？雖然，兩個人的主張和立場，南轅北轍；情感和態度，幾乎可以相互割喉。我們甚至可以說，汪精衛也是民族主義者。為什麼不呢？胡蘭成就寫過《戰難和亦不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嘛，為了讓老百姓少受苦難，忍辱負重，維持和平，難道不是一片愛心？

民族主義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代表，大家不要忘了，就叫做「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這裡用的 National 這個詞，中文可以譯成「國家」，也可以譯成「民族」。總之，你若是要找一個全世界範圍最大的民族主義者，他的創始人的名字就叫希特勒。

這樣一舉例，一分析，我們就發覺，民族主義這個東西，如果從常識觀點理解，它就像一把雙刃刀，兩面的刀口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社會影響。

我剛才講，左、中、右三派，在保釣運動初期坦誠合作，但是到了後期，幾乎反目成仇，這

個變化，裡面說不定就有兩面刃的作用。

但是，要深入一點理解這種雙面刃作用，常識觀點無法解決問題，必須把民族主義看成一種意識形態。所謂意識形態，是從外文翻譯過來的概念，英文叫做 Ideology。Ideology 是什麼呢？最簡單的定義就是：一連串不同的 ideas，通過內在的邏輯聯繫，變成了一套指導行動的理論。

人類歷史上，意識形態往往發生巨大影響，我們必須仔細說明一下。表面上看來，意識形態好像是一種哲學，一種理論，而且，還帶有一點宗教的味道。然而，它好像並不那麼學院，那麼純粹，它在歷史上經常產生巨大力量，造成劇烈的社會變化，驅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足以影響大集團 人口在歷史上的轉向。

深入一點看，意識形態終究跟哲學不太一樣，它固然是一套理論，是有很多 ideas 結合在一起，而且是通過理性的推演，組成相當嚴謹的邏輯結構，有前提，有推論，有驗證，有結論，前後照顧，體系完整，然而，嚴格說，它不是真正學術上的哲學。為什麼呢？因為，哲學是要幫助我

們認識、了解 這個世界和我們的人生，基本上，泛泛地講，可以這麼說。

而意識形態呢，不只如此，它要求的不止於此，它要更進一步。除了理解世界和人生，它要改變這個世界，改造這個世界，要求我們的人生價值和目標轉向，與之配合，以便最終重新建立世界秩序。

更進一步，意識形態一定要求行動配合，不能只是紙上談兵。一旦投入行動，便立即產生組織問題。

所以，如果從意識形態這個層面去理解民族主義的話，這個民族主義就比較不簡單了，跟常識層面的理解，整個樣貌就不一樣了。通過意識形態這個概念來理解民族主義，當代的社會學和人類學對此有很多研究，但是為了今天討論方便，我只介紹一個比較簡單明瞭的 formula，或者是一個架構，當作我們的分析工具。

上世紀六、七〇年代，英國作家芭芭拉·沃德(Barbara Ward, 1914-1981) 相當活躍，經常在英國的《經濟學人》和美

國的《外交季刊》、《大西洋月刊》和《紐約時報週刊》等重要雜誌發表有關政治文化方面的文章，受到當時西方知識界的普遍尊重。

1966年，她在美國出版一本書，題目是《民族主義與意識形態》(Nationalism and Ideolog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這本書就是從意識形態這個特殊角度出發，專門討論人類社會生活發展的歷史。她把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劃分為四個彼此不同而又相互關聯的階段，分別是：部族主義時期、帝國主義時期、民族主義時期和後民族國家時期。

這四個階段的發展應該這麼理解：每一個階段都有一個支配力量，但同時孕育了最終取代它自己的下一個階段。同時，新的階段也繼承且無法完全拋棄前一階段的某些特性。舉例說，民族主義是民族國家形成時期的主要意識形態，這個意識形態具有非常巨大的、幾乎可以說是改天換地的創造力，不但產生前所未有的政治、社會變革，激發了經濟上的空前生產力，而且可以說，由於它的衝擊，全世界因而改觀。以我們今天的理解而言，若是說民族主義這個

意識形態基本創造了我們所知的現代世界，也未嘗不可。利用芭芭拉·沃德介紹的這個架構，不難發現，民族國家先後形成以來，的確有個現象：民族國家的發展成長過程中，曾經產生過一些怪胎：希特勒的國社主義、日本的軍國主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等等，都好像在民族國家的現實裏面，埋藏著部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基因。不要把這個現象局限在上述三個特例，就我們所知的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發展過程，甚至以民主自傲的當前台灣，部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基因，它所夾帶的陰魂不散的幽靈，也隱約可見。

那麼，四十年前，以民族主義為主要驅動力的保釣運動，其中隱約埋藏著一些陰魂不散的幽靈，也就不足為怪了。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回顧過去，這些混進了我們思想和行動的幽靈，是必須面對的。我這個「反芻」，不特指左、中、右的任何一派，我是向任何一位自認為具有自由意志的獨立知識分子進言。

展望未來，我要趁此機會，介紹另一位英國作家，劍橋大學教授理查德·杜金斯（Richard Dawkins, 1941-）。杜

金斯是當代相當重要的思想家，從他的本業演化論生物學研究出發，目前可以算是世界上知識界公認的最重要的無神論者。

杜金斯的成名作叫做《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發表於 1976 年。根據他關於演化論生物學的研究，他認為生物界最具主宰性質的力量就是「自私而且永遠不死的基因」。基因通過複製自己而傳承，繼續生存繁衍。世界上的每一個生物個體，從單細胞生物到我們人類，都不過是基因的短期載體，載體過一段時間就沒有了，基因卻能通過它的複製功能，通過我們的下一代和無數子孫後代，繼續生存繁衍下去。每一個生物的個體，都通過生殖、複製的手段，成為永恆的基因載體。

動物界有所謂的「犧牲個體以換取整體生存機會」的行為，生物學家在不少動物物種中發現這種現象。在人類文明裡面，往往把「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行為，視為道德的最根本起源。當物種面臨絕滅危機，作為小我的個體，雖然犧牲，但大我物種如能因此倖存，基因就傳下去了。能不能用這個概念來理解四十年前爆發直到今天依然保持頑

強生命的保釣運動？民族主義的根子，是不是就是我們基因的自衛機制？這樣的想法，我覺得不夠全面。杜金斯還有一個重要的創見。

基因的英文是 gene，杜金斯創造了一個新詞，叫做 meme。這個字沒有中文，我仿照基因這兩個字，翻譯成「明因」。在生物界裡面，基因具有代代相傳、永續存活的本事，杜金斯所說的「明因」，也有代代相傳、永續存活的本事。「明因」是指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一代一代傳承的一些理念。舉個例來說，基督教的「上帝」，在杜金斯看來，就是一個明因，而且是非常 powerful 的明因，因為它的影響非常大，一代一代傳下去，不會死，只要能傳下去，就不會死。

只要文明存在，它就活著。佛家的「慈悲」，是另一個很 powerful 的明因。那麼，我們中國儒家的仁、義，這一類理念呢？我覺得也是非常 powerful 的明因，因為它維繫了幾千年來數以億計人口的一種基本生活信念，而且變成了社會組織的基本架構，一個非常重要、維繫社會秩序穩定的巨大力量。

發明這些明因的人，比如說，耶穌，已經死掉了。釋迦牟尼死了，孔、孟也都過去了。但是他們創造的明因，就跟生物界的基因一樣，只要文明存在，它們就能永遠活下去。耶穌、釋迦牟尼、孔、孟以及我們，不同文明圈的每一個個體，都是這些明因的載體。

杜金斯的這個「明因說」，對我們曾經熱情參與過保釣運動的人，有一個啟發。反芻民族主義應該得出這樣的結論：展望未來，提倡、推動、發揚民族主義或救國運動，這條老路，比較狹窄，而且具有一定的危險性。參照杜金斯的「明因說」，我願意提出三點意見，供大家參考。

第一點，就是要好好地理解我們自己的明因，這個傳承在什麼地方？它跟當代文明世界的關聯性何在？

第二點，我們必須繼續努力，創造屬於我們的新明因系統。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眾所周知，這二、三百年來，整個世界的遊戲規則，是按照希臘、羅馬、西歐的文明傳統制訂的。這個遊戲規則是不是完美無缺呢？至少，我們看到，兩次世界大戰、核戰威脅和全球環境的汙染，全人類

付出了慘重代價。如果我們無法創造新的明因系統，就只能永遠跟著希臘、羅馬、西歐那個文明系統的明因去玩遊戲。將來還會遇到什麼樣的風險、危機，我們的子孫後代必須照單全收。

前面提到的芭芭拉·沃德，提到過人類社會發展的第四個階段，即後民族國家時期。沃德女士死於1981年，她的理論大概以上世紀七〇年代的世界現實為基礎，無法預測到蘇聯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可是，這個人還是相當有遠見的。她指出，後民族國家時期的人類大概有兩條路：一條路是國際共產主義，另外一條路是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現在的國際現實，很顯然，證明了這兩條路基本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終很可能變成一條路。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三點。

明確地說，在世界必然邁向全球一體化的未來，必須挑戰的是，我們過去創造的和今後創造的最好的明因，如果要貢獻給全人類的後代子孫，就應該作為新的準則、規範，將目前公認的遊戲規則予以修訂重寫，使之成為真正保障人類和平共處的新憲章。

## 附錄

我想針對光興兄剛剛提的問題談一下。因為我也算是濫竽充數在聯合國工作了差不多三十年，所以稍微有一點了解，基本上聯合國的成立，核心就是集體安全制度，這個制度造成了五個常任理事國有否決權，這樣一個荒謬地違反民主的制度，為什麼會形成這樣呢？

很簡單，打怕了。兩次世界大戰打得西方自己都害怕了，因為接下去，核子的威力很可能面臨的是人類的毀滅、整個地球的毀滅，所以才有聯合國這個理想。

以後呢，聯合國還通過一些很多內部工作人員的努力，發展出來那樣一套模式，通過社會上的 NGOs，非政府組織，他們發現了一些世界上的問題、人類社會的問題。他們討論，然後串聯、開會、呼籲、請願、示威，各種活動都搞，慢慢就把這個議題形成大家比較熟悉、關切的問題。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保護環境的問題，在六〇年代的時候剛開始有人意識到這個問題，最早是在加拿大，一些比較有這樣意識的年輕一代，開始慢慢地在呼籲、吶喊。這

樣搞了好幾年以後，最後通過「聯合國」，聯合國這個機制就變成了可以提供一個平台，讓想法在這個地方有個發揮的原點，然後通過這個平台可以讓全世界知道。

最有名的就是 1972 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從那個環境會議，最後得出了一個結果，就是在第二年，1973 年，第一個在非洲建立的聯合國機構的總部，就建立在肯亞的首都。我有幸到了那邊，志願到那邊服務了三年。像這類的，包括很多的議題，都是這樣透過了聯合國的各種活動，慢慢變成人類的共同 awareness，舉例說，婦女的問題，還有很多很多的問題。比如最近我看台灣報紙上的新聞，有東南亞曾經受過地雷傷害的人來台灣宣傳。所以如何在戰爭結束後，如何清除地雷也是很重要的問題。像這類的問題成千上百，通通透過一個新的方式，這個方式就是說，你只要有理想，先在你的社會裡面成立一個非政府組織，然後去推動你的計畫，當你真正抓到一個東西，真正把這個 awareness 推廣到一個比較大的社會時，這個時候你可以透過聯合國的機制，把這個東西變成了普遍的、人類共同了解的新知識、新機構或是新動作。

這都可以做出來，我覺得這個是聯合國對人類最有貢獻的。但是，集體安全制度，在能不能廢除呢？不能廢除，因為戰爭的威脅還是存在，所以它還是有這套機制在運行，所以我們在台灣不能把聯合國完全看成它只限於這塊，這一塊是它很重要的核心機能，但是整個的價值意義不完全在那邊，這是我對您所提出的問題的一個反應。

## 後記

這篇文章是根據在新竹清華大學召開的保釣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專題發言錄音稿改寫的。發言前的兩、三個禮拜，我雖曾在思想上做了一些準備，但當時因為事忙，沒有寫發言稿，只寫了一個簡單的大綱。多謝清大研究院的莊榮惟、宋玉雯和劉羿宏，費了很大功夫，根據現場錄音寫出聽打稿。我發現聽打稿的內容基本完整，但不免有不少累贅、疏漏，甚或有詞不達意、邏輯斷裂之處，因此花了一點時間，重新爬梳改寫。

2012年4月30日一 記於紐約 寓所

鄭鴻生：解嚴之前的海外台灣左派初探

一、前言：從一九七〇年代的保釣運動談起

台灣一般人對保釣運動的印象，除了這幾年來不時有從北海岸出發前往釣魚台列嶼的保釣船，與日本海上保衛廳的艦艇發生衝撞而引來一些媒體關注之外，就是四十年前發生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的一場愛國運動。當年的參與者，所謂老保釣，如今也都過了耳順之年。從2009年在新竹清華大學舉辦的保釣文獻會議，到2011年在世新大學舉辦的保釣四十周年會議，我們在現場看到的確實主要是一群六、七十歲，頭髮花白，不少已經退休的老留學生、老學人，其中大半還是理工科出身的。這些人雖然已過耳順之年，然而發起言來的情感與氣勢卻都還不輸時下憤青，可以看出這是一場青年運動對參與者一生的衝擊與影響，讓他們在生命的深層還保留著青春狀態。所以說，保釣運動是遠遠不能被政治的、愛國的概念來框限住。這是本文要探索的其中一個面向。

1987年解嚴之前，海外台灣留學生具有群眾性質的政治運動主要發生在北美洲，一個是台灣獨立運動，另一個即是保衛釣魚台運動。台灣獨立運動基本上是以右傾的親美反共思想為其意識形態，雖然有左派台獨存在，但只是整個

台獨運動裡的邊緣分子。相反的，保釣運動一開始就有受到社會主義啟蒙的左派學生參與其中，成為最大的主導力量，並且還將運動轉化為中國統一運動。而當時中國正是處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成為全球青年進步運動的理想標竿，因此當年很多參與保釣運動的台灣留學生不僅曾經被四〇年代全球青年造反運動猛烈衝擊，還受到文革理想深刻感召。可以說約略同時在一九七〇年代初發生的這兩個台灣海外留學生政治運動，是台灣戰後新生代來到美國留學之後，一左一右的兩個運動。從這個觀點來看，發生在四十年前的保釣運動就不只是一場愛國保土運動，更是一場海外台灣留學生的左翼啟蒙運動。

四十年前發生在美國的保釣運動隨著轉化成統一運動。就像五四運動，它起源於一場學生愛國運動，這個「國」原初是一個廣義的中國，但接著保釣高潮而來的冷戰局面的巨大變動，在1971年9月在密西根州安娜堡舉行的國是會議之後，這個中國就由中國大陸來代表了。由此，海外保釣運動遂轉化成為中國統一運動（簡稱統運）。於是這個原初的、較為素樸的愛國運動就帶上了左翼的色彩，這幾乎是20世紀第三世界知識青年尋求國家自主與民族解放

的命定途徑。

這樣的一種左翼的愛國運動，或說民族解放運動，基本上有著兩個特質：其一是反帝，其二是社會改造。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在一九七〇年代的情境下，就是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世界霸權及其對第三世界的侵凌，而尋求國家的主權獨立。第三世界的社會改造就是認為原來抵抗不了列強侵凌的、落後的、反動的社會政經體制，必須經過徹底的改造而走向前瞻的、現代的、真正民主與平等的理想社會。這個理想當然不是美帝所代表的政經體制與意識形態所能提供，因此必須另尋出路。從保釣到統運之路基本上就是這麼一個左轉過程，一方面反抗美帝將中國領土釣魚台私相授受給日本（一個前帝國主義國家），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的主權獨立與社會主義改造，尤其是當時的文化大革命，則提供了追求理想社會的另類藍圖。

從保釣到統運，在幾乎整個一九七〇年代吸引了很多台灣赴美留學的知識青年，不少人以身相許，成為他們一生中抹滅不了的青春激情，因此我們今天還能在四十年後看到這些人重新聚會、相濡以沫。

1970 年 底 開 始 的 海 外 保 釣 運 動， 在 1971 年 9 月 轉 化 成 統 一 運 動， 然 而 這 股 動 力 在 1976 年 文 革 結 束 後 開 始 衰 退， 而 在 1979 年 鄧 小 平 採 取 反 向 的 改 革 開 放 政 策 之 後， 更 失 去 了 原 初 的 動 力， 遂 沉 寂 下 來 而 進 入 尾 聲。 之 後 又 隨 著 中 國 大 陸 的 改 弦 更 張 與 蘇 東 集 團 的 解 體 所 帶 來 的 全 球 左 翼 運 動 的 大 退 潮， 於 是 這 個 涵 蓋 整 個 一 九 七 〇 年 代 的 廣 義 的 海 外 保 釣 運 動 的 左 翼 內 涵 也 逐 漸 模 糊， 抽 象 的 「 愛 國 」 幾 乎 就 成 了 如 今 回 顧 的 刻 板 印 象。

然而正如五四運動有其多重的面向與豐富的意涵，而不能刻板地被限定在愛國運動的範疇，保釣運動也有其多重的面向與發展。首先，保釣運動不只發生在海外，也在台灣與香港爆發而且各有著深遠的、多於愛國運動的影響。保釣運動在台灣的部分，我在十年前出版的《青春之歌》一書，記錄了1971年到1973年台大學生的保釣學運過程，今年我在世新大學舉辦的「保釣四十周年——理想還在召喚」的會議上也發表了〈七〇年代台灣保釣運動的珍貴資產〉一文，闡述當年台灣保釣運動的多面性，以及對那一整個世代人的影響。這一部分在此就不再多言，本文要講

述的是一向較少言及的保釣運動背後的一支重要力量，就是不會對中國大陸的政策言聽計從，而較為強調台灣本身解放力量的「海外台灣左派」的來龍去脈。

台灣留學生的海外保釣運動轉化成統一運動之後，基本上只能在海外華人與留學生圈子裡活動，較難在台灣本土有著力點。但是這裡要講的這支海外台灣左派則有著另一番光景，首先它胎動於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其中部分人士積極參與保釣運動，成為影響釣運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它也從釣運人士中吸納更多新血。在海外釣運 / 統運沉寂之後，這股擴充後的力量繼續面向台灣，不僅從一九七〇年代就開始奮力支援台灣的民主運動，並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後也成為促成台灣社會運動發展的重要力量。可說從六〇年代初活躍到台灣解嚴的八〇年代末，前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

海外台灣左派是一個概括性的稱呼，這群人除了思想上受到馬克思、列寧與毛澤東的影響外，還有幾個特點：

1. 台灣解嚴前，他們因為各種原因，包括上了黑名單，甚

至被吊銷護照，或因學業尚未完成，基本只能在海外活動，尤其在美國。

2. 他們不以「民族本位」來思考問題，但基本上也不質疑自己的中國人的身分，並且基本肯定從辛亥革命到四九年解放的中國現代革命道路。

3. 他們認為台灣問題以及更大的整個中國的問題必須放在相對於歐美日的第三世界的視野來檢視。

4. 他們大多數不認為台獨是條出路，因此不屬於台獨左派（但有少數台獨左派也源自這群體），但對台獨運動的發生抱著歷史性的同理心。

5. 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在如何統一的想法上。基於對台灣曾作為日本帝國殖民地，以及那時正作為美國保護國而位居冷戰前線，這兩段歷史特殊性的理解，他們認為台灣不能只是等待祖國的解放，必須發展出自身的社會解放力量。就是說，必須有台灣人民積極參與在內，才是最理想的統一與解放。當然這樣的看法與立場並非那般涇渭分明。由

於他們基本「面向台灣」，認為台灣社會在經過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左翼肅清之後，必須有自身左翼力量的重生與茁壯，因此他們與海外統運和台獨左派之間也就存在著一些模糊空間。在這前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由於發生過多次歷史性的變局，這批海外台灣左派在不同時期面臨不同的形勢，而有著不同的課題與行動。同時也陸續有新到的年輕台灣留學生加入，確實能呈現出一個上下傳承的線索與特質，可讓我們稱之為海外台灣左派。因此以歷史性事件為綱，我們大致可以將其分為幾個時期：保釣前的六〇年代、釣運 / 統運的七〇年代以及後釣運 / 統運的七〇年代。在分別敘述這幾個時期之前，讓我們先來考察一下當年的時代背景。

## 二、解嚴之前台灣留學生的時代背景

### （一）大批來到美國的台灣留學生

海外台灣留學生的保釣運動在一九七〇年下半年開始醞釀發展，在1971年4月10日的華府保衛釣魚台大示威達到最高潮。<sup>1</sup> 那天估計有2,500人參加，其中3/4來自台灣，

1/4 來自港澳。這是個不得了的數字，北美洲各地的台港澳留學生那時總共二萬多人，當然參加者也包括一些已經畢業工作的學生和各地華僑。在那經濟並不充裕的年代，他們必須包巴士、搭飛機，或者開車，很多是遠從西海岸或加拿大，在4月10日那天聚集到華盛頓首府來。而不克趕赴華府的也在各地舉行數百人之眾的示威遊行。可見這個運動在北美台港澳留學生界影響之廣。

一九七〇年代之初會在遠隔重洋的美國爆發這麼一個影響到那一整個留學生與留美學人世代、強而有力的保釣運動，是有其當時的特殊背景。不只保釣運動，與它同時同地同一個留學生與留美學人社群也興起了台灣獨立運動，幾乎是與釣運 / 統運平行發生與發展。

要理解這個現象必須回到當時的全球冷戰局勢與台灣在其中的位置與角色。海外保釣運動醞釀於1970年底，也就是說參加保釣運動的留學生是在一九六〇年代來到美國留學的。到了一九七〇年代下半台灣在美國的留學生（還在修學位的）已經超過三萬人，在美國的外國留學生數目中是數一數二的，另一個留美學生很多的國家是伊朗。這些

留學生大半都不是富有權貴家庭出身。就是說不是自費或公費留學，而是靠美國大學的獎學金來到美國。當時美國願意提供大量的獎學金名額給這兩個國家，當然有其特別考量的動機，而這兩個國家能產生這麼多的留美學生當然也有其特殊的時代條件，及其與美國的特殊關係。

美國為何願意提供巨額獎學金給第三世界國家？道理很簡單，首先是培養第三世界的親美派，再來是吸收第三世界的菁英分子來為美國工商業服務。大凡每個大帝國都有這種雄心氣魄來這樣操作，不須多做闡述。問題在於為何選擇台灣？這就要看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台灣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冷戰局勢中的位置與角色了。

台灣當時一方面作為美國圍堵中國大陸的第一島鏈中的關鍵一環，另一方面又是以代表全中國的中國人自居。中國大陸的「赤化」以及韓戰時帶給美國軍隊巨大的災難，一直是美國戰後難以吞嚥的苦果，因此如何栽培親美的中國人就成為了美國在韓戰以後的重要課題，而這時能夠被栽培的中國人就主要來自台灣，因此大量的獎學金名額就開放給了台灣的學生。這是一九七〇年代保釣運動發生時，為

何會有那麼多台灣留學生的國際政治背景。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中美關係解凍，中國大陸採取改革開放政策的一九八〇年代為止。

## （二）戰後台灣教育的普及化

台灣當時也適時能夠提供這麼多夠格的大學畢業生，尤其是理工科的，來到美國留學。這除了有中國社會傳統上就重視子女教育這因素外，就主要來自戰後中華民國政府的普及化與平等化的教育政策了。

我與先父是同一個中學——台南一中——畢業，差別的是他是在日據時期（1935年），而我是在國府時期（1969年）。我就讀台南一中時，每一個年級有20個班，每個班平均50個學生，就是每個年級有1,000個學生。而父親畢業時他那一年級總共畢業了85名，分成兩班。每個年級不超過100人，不到一九六〇年代台南一中學生的1/10。何況日據時期全台灣給台灣人就讀的中學校屈指可數，每個學校又只有這樣的學生數目，可說是菁英教育了。到了一九六〇年代台灣的中學在國民政府普及化的平等教育政策下，都已

經成了平民化的中學校。

隨著中學畢業生數量的增加，公私立大學也急速擴展。我們可以從一九五〇到一九六〇年代台灣各級學校的升學率來看。在我出生的1951年，小學畢業生升上初中的升學率是38.6%，我小學畢業的1963年增加到54%，到我大學畢業的1973年則增為83.7%；而1951年初中畢業生就讀高中的升學率是57.3%，到我初中畢業的1966年則增加到75.8%。以全體國民的教育程度來看，中等學校以上學歷的人口在1952年只占8.0%，到了我升上初中的1963年是14.5%，而在1975年我退伍時則上升到30.4%。若以絕對人數來看也呈現急速上升的趨勢，1951年台灣從小學到大專等各級學校的當屆畢業生是16萬人，1963年增加到45萬人，到1973年更增加到近90萬人；其中當屆中等教育畢業生在1951年是3萬6千人，到我高中畢業的1969年則增加到27萬7千人；而在學的中等教育學生人數1951年是12萬8千人，1969年增加到102萬8千人，有七倍的成長率。可以說相較於日據時代，台灣在經過一九五〇年代開始的普及化教育後，到了一九六〇年代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口確實已是個不小的群體。（參見表一）

來到一九六〇年代，雖然台灣經濟已經開始發展，但經濟結構並沒能夠容納得下逐年增加的大學畢業生。然而這些大學畢業生卻有了一個新的出路，即是前往美國留學。美國也就在這個時候基於全球戰略布局，而提供台灣的大學畢業生大量的獎學金名額。

年份	1951	1963	1966	1969	1973	1975
升學率：小學升初中	8.6%	4.0%	9.0%	.5%	3.7%	9.5%
升學率：初中升高中	7.3%	3.3%	5.8%	.2%		
中學畢業以上人口	4.5%	5.8%	.5%	7.8%	0.4%	
各級學校應屆畢業生總人數	6萬人	5萬人	5萬人	萬人	9萬人	5萬人

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人數	3 .6 萬 人	27 .7萬人
中等學校在學學生人數	1 2.8 萬 人	10 2.8 萬 人

資料來源：《歷年度各級教育簡況》（教育部統計處，2008）和TaiwanStatisticalDataBook（經建會，1983）。

### （三）留學美國成為台灣青年的出路

美國對台灣戰後一代的知識青年而言本來就非陌生之地。一九五〇年代開始，美國繼日本成為台灣的宗主國之後，美國的影響在台灣全面展開。戰後知青一代都不會忘記那時各地設立的美國新聞處的吸引力，以及他們辦的

《今日世界》雜誌與出版的圖書所提供的精彩內容；也不會忘記這些影響在一九六〇年代成為用來反抗國府威權體制的思想工具。

於是台灣這批戰後出生，成長於一九五〇 / 一九六〇年代的新生代知識青年，在國府普及化與平等化的教育體制下遂大批地進入大學，而在大學畢業服完兵役之後，又順理成章地大批地接受美國大學獎學金，前往美國留學。這是一九六〇 / 一九七〇年代之交台灣學生出國留學的情況，那時主要的留學國就是美國，很少人去歐洲或日本。於是這一批台灣留學生在美國遂形成一股不小而多樣的力量。

台灣的大學畢業生大約從一九五〇 / 一九六〇年代開始大量的前往美國留學，然而一九八〇年代之前留學生學成回台的比例甚低，大半都在美國就業定居下來。這種有去無回的情況當年還引來了一句調侃的話「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因為出國留學的以台大畢業生最多。於梨華也寫過《又見棕櫚，又見棕櫚》與《會場現形記》<sup>2</sup>等小說，來探索這批羈留北美洲華人知識分子在大洋兩岸間的情事。當然剛開始時台大畢業生出國留學的最多，因為

它本身成立早，學生也多，但到一九七〇年代之後，來自其他學校的也不亞於台大的了。

基本上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只要大學成績不差，畢業服役之後無須馬上承擔家庭經濟責任的男生（就是說小康之家即可），又有出國留學的強烈動機，總是可以想方設法來到美國留學，而申請美國大學獎學金雖是最佳的途徑，尤其是理工科的學生，但其他方式也不少。那個時候即使沒能拿到獎學金，在美國打工的機會很多，移民檢查寬鬆，只要有心，半工半讀就能在美國社會混下去。過後要解決身分問題，基本上都不是難事。當然獎學金是個重大資源，讓你無須半工半讀，有餘裕從事很多課外活動。因此在一九六〇 / 一九七〇年代，除了循規蹈矩在美國的大學研究所修學位的之外，還有不少身分不明的、跳船的、退學的、居留過期的，或因被國府吊銷護照而成為黑戶的，構成了美國的台灣留學社群的一片熱鬧景象。

美國的台灣留學生界還有另一個特點，在當時中國人的共同認同下，他們與港澳留學生是互通聲氣的。此外各大都會區都還有唐人街 / 老華僑社區，也成了台灣留學生各種

活動或運動的場域。

#### （四）世局遞嬗與留美學生的變化

台灣留學生在美國的人數與活動的高峰是在一九七〇年代到一九八〇年代前半，而在一九八〇年之後，由於中美和解，加上中國大陸採行改革開放政策，美國的大學遂開始把原先撥給台灣學生的名額逐漸轉給大陸學生了。這對美國的政策而言是一致的，他們如今可以直接從中國大陸的學生吸收人才，培養親美派了。而同時台灣由於經濟的發展，更多的家庭可以負擔得起自費留學的費用；而台灣的大學畢業生也不再那麼狂熱於出國留學，即使出國也有更多選擇與競爭國度，例如英國、德國、澳洲、日本等。此外，台灣留學生界二、三十年來熱烈的政治活動，也因1987年的解除戒嚴而重心轉移，海外不再成為反對活動的主要場域。

如此，在一九九〇年之後，美國台灣留學生社群的熱鬧景象遂被中國大陸留學生所取代，何況那又是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一項數據可以幫忙說明這種情況：2002

那一年在美國的外國留學生中，印度與中國大陸是人數最多的兩個國家，都在六萬人以上，台灣掉到第五名，不到三萬人，其中還包括很多高中畢業去讀大學部的，與前一世代有著極為不同的組成。<sup>3</sup>

前面提到一九七〇年代美國的台灣留學生人數是數一數二，而另一個留學生最多的國家則是伊朗。伊朗的情況和台灣頗為類似而更極端，首先那是巴勒維時代的伊朗，1953年巴勒維在CIA的幫助下奪回政權之後，將伊朗建構成一個親美政權，成為冷戰時期美國在西南亞的一個重要戰略據點。由此，一九六〇 / 一九七〇年代也有大批伊朗子弟來到美國留學，在巴勒維王朝垮台前夕的1979年曾有超過五萬留學生在美國的紀錄。他們的社群也孕育著有如台灣留學生界那般的政治氣氛，對伊朗祖國有著深沉的關懷和激進的行動。

伊朗留美學生界也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後如同台灣留學生界一樣，由於一個政治局勢的轉變而人事全非。那是發生在1979年的柯梅尼革命，推翻巴勒維，出現一個全新的、反美的穆斯林政權。此後美國大學校園難得見到伊朗學生，

在新世紀甚至掉到2,000 人以下，美國也找不到像台灣這樣的一個小 伊朗，可以繼續用來栽培親美伊朗人了。於是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後，印度與 中國大陸就取代了伊朗和台灣，成了在美國人數最多的外國留學生群了。

可以說台灣去美國的留學生從一九六〇年代到一九八〇年代，在全球冷戰的高低潮變化中，前後熱鬧了將近三十年，而這一切都與世界局勢的變動 有著密切的關係。本文所要探索的海外台灣左派的演變，即與這三十年的世 局遞嬗息息相關。

### 三、六〇年代全球青年造反運動的衝擊

一九六〇 / 一九七〇年代這麼多的台灣留學生匯聚到美國，照理應如原初設計，不管回到台灣還是留在美國，都會接受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走上 一條親美的道路。實際上確實也達到了大半的功效，台獨運動即是其中一個 收穫。戰後新生代親美的台獨運動從一九六〇 / 一九七〇年之交在美國興 起，至今不衰，並且作為美國左右兩岸關係的一顆棋子，而成為影響台灣政局與兩岸局勢的巨大力量。

然而作為與美國主流價值十分搭調的台灣獨立運動，只是台灣留學生的一方風景，另外卻也有一大批留學生反而意想不到地受到六〇年代全球性青年造反運動的深刻影響，而走上對美國霸權及其價值的反思與反抗之路。美國社會在一九五〇年代歷經麥卡錫主義的白色恐怖後，戰後新生代在進入六〇年代時即開始反思美國社會的主流價值，及其在全世界的霸權角色。

### （一）從黑人民權到反越戰

美國戰後的黑人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從1955年阿拉巴馬州 蒙哥馬利市的「罷乘種族隔離公車行動」開始，到1960年在北卡羅萊納州葛林斯堡一家百貨公司飲食部的「種族隔離區強坐行動」(Sit-in)，1963年8月金恩在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前〈我有一個夢〉的演說，而在1968年的《民權法案》達到最高潮。與此密切相關的「校園言論自由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也在1964年底的柏克萊加州大學爆發。而美國大舉介入越南戰場更是引發更大規模的抗議行動。1963年開始就有和平運動者開始抗

議美國介入越南戰場。1964年8月美軍在越南外海製造東京灣事件，詹森總統藉此從國會取得出兵權，更大舉出兵越南，隔年就達到30萬兵力。又為了增兵越南，開始大規模徵兵，於是引發美國青年的抗議，尤其是也被列入徵兵範圍的大學生。

於是從1965年開始，反越戰運動迅速在全美各地蔓延，尤其是各個大學校園。全國性的學生組織也相繼組成，像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 與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在一九六〇年代的下半期隨著越戰的升高、美軍傷亡的日趨慘重以及美軍在越南農村的暴行，例如1968年的美萊村屠殺事件 (My Lai Massacre)，反越戰運動遂進一步與黑人民權運動合流，成為要求改變美國社會主流價值與體制的兩大重要推手。美國的大學校園遂成為這個戰後新生代青年運動的主戰場。學生不只遊行，還發動罷課，占領行政大樓等等，並且把各種社會團體如婦女、宗教、工會等社團全都捲了進來。反越戰運動並且擴大到全國政治層次，1968年8月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用來提名當年總統候選人）在芝加哥舉行，會場被反戰示威群眾包圍，芝加哥

市長出動了三萬名以上警察與國民兵強力鎮壓。

騷動的校園一直延續到一九七〇年代，衝突越發激烈而血腥。例如1970年5月4日發生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的國民軍射殺四名反戰示威學生事件（Kent State Massacre），以及十天之後的密西西比州傑克森州立大學的學生示威活動中，警察射殺二名學生（Jackson State Killings）。這一連串的兩次校園射殺事件引來全國民意的反彈，並引發了首次大規模的全國學生大罷課。這些流血抗議終於迫使尼克森政府開始考慮退出越戰。直到1973年初，南越、北越、越共與美國四方人馬簽訂巴黎和平協定，美軍逐步撤出越南之後，反越戰運動才進入尾聲。

## （二）從巴黎街頭到美國黑豹黨的左翼旗幟

從一九六〇年代初到一九七〇年代初的這段以美國反越戰和黑人民權運動為主導的戰後新生代青年運動，也同時在其他國家發生，歐美日等已開發國家幾乎無一倖免。其中1968年5月在法國爆發的學生運動與接著而來工人運動及其全國大罷工，更是成為其他國家青年運動的標竿。

1968 年的法國學生運動與工人運動不僅是戰後新生代青年運動的高峰，也是六〇年代全球進步左翼風潮的象徵。在保守反共的一九五〇年之後，

1959 年卡斯楚的古巴革命正是挑戰美國為首的冷戰秩序的濫觴。一九六〇年 代初中蘇共公開決裂，隨後在1963 到1964 年間，兩國更針對國際共產主義 運動的路線展開公開論戰，中共先後發表了九篇評論文章，抨擊蘇聯的霸權路線與僵化的官僚體制，構成有名的「九評」。這些都在為落後國家提出一個 有別於美蘇兩大強權及其體制的另類出路，給全球特別是第三世界的左翼力 量極大的鼓舞與啟發。尤其是在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之後，對左翼人士而言更證明了蘇聯道路的不可行。

在這種變局下，中國大陸1966 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在全球青年運動 的熱潮中，毛澤東的革命路線遂成了極吸引人的號召。「毛派」於是在世界各地，尤其是第三世界，從此形成一股實在而不可輕忽的力量。

而美國社會反動保守勢力所構成的阻礙，也讓民權運動裡的一批人士激進化，有人遂喊出「黑人力量」(Black Power)的口號，採取有別於馬丁路德金恩溫和路線的非和平的手段，來爭取黑人的平等權利。其中最有名的即是主張左翼革命路線的「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以及Malcom X 及其黑色穆斯林 (Black Muslims)。他們都遭到FBI 的殘酷鎮壓。這條路線後來產生不少激進小團體，一直到一九七〇年代中期還在活動，例如1974 年發生的進行都市游擊戰的共生解放軍 (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綁架赫斯特報系老闆女兒事件。左翼力量在一九六〇年代的復興還配合著文化上突起的青年叛逆風潮。從美國的花童 (Flower Kids)、嬉皮 (Hippies) 運動，與民權 / 反戰緊密相繫的抗議民歌 (如Pete Seeger、Joan Baez、Bob Dylan 等)，英國的搖滾樂如披頭四、滾石，到法國的新浪潮電影，以及其他文學、繪畫與戲劇上的各種前衛藝術，所在都有。這些文化上的叛逆風潮一路影響到流行消費層面，例如披頭四的歌曲，男性留長髮，幾乎是在全面挑戰美國在戰後建立起來的保守反共僵硬虛偽的中產階級價值體系。從一九六〇年代到一九七〇年代，這些戰後新生代的青年「反文化」風潮遂與風風火火的社會與政治運動合流並進，

形成我們今天所謂的「六〇年代」。

### （三）左翼思想在海內外台灣青年中的的復甦

處於冷戰陣營前鋒的六〇年代台灣，雖然仍在國府嚴厲的戒嚴體制之下，但由於政治上的親美立場，美國文化及其「反文化」遂也透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管道源源流入。正式的管道有全用英語發聲的美軍電台（AFNT，即ICRT 前身）和美國新聞處及其中文刊物《今日世界》與出版社；非正式的則來自各種媒體，包括進口的刊物如《時代周刊》與《生活畫報》、電台的熱門音樂、外文書店等。而其中更重要的是知識分子自行引進的各種資訊與觀念，配合著台灣在一九六〇年代的文藝出版與創作盛況。

於是開始了美國文化全面影響台灣的年代。歐美青年那時各種叛逆的訊息如反越戰、民權、嬉皮、搖滾樂及新潮電影大量傳入。台灣青年在經過「文藝復興」的洗禮同時，也如飢似渴地接受全球性青年造反風潮的感染。<sup>4</sup> 因此歐美青年運動除了帶來政治方面如反越戰與民權運動的衝擊外，還有著文化方面的深遠影響。經由音樂、書刊、影像

的傳布，美國青年的「反文化」運動，從花童、嬉皮、搖滾樂到嗑藥等等思潮，也感染了這個年代的台灣青年知識圈，直到七〇年代。

六〇年代台灣知識青年接受歐美青年造反的反文化運動影響還只是間接的，當時在美國校園的台灣留學生就直接受到衝擊了。有當時的留學生回憶說他是在校園罷課的烽火硝煙中完成博士學位的。六〇年代有機會到美國留學的台灣學生，可以說是親身體驗到美國大學校園的動蕩與爭論以及社會的問題。這對很多來自反共戒嚴體制思想禁閉下的台灣知識青年，是個大開眼界的機會。很多當年的留學生都曾回顧說：留學之前他們把美國奉為理想社會的標竿，而六〇年代的民權、工人與反戰諸進步運動才讓他們驚醒，不僅開始對美國社會體制進行反思，也開始擺脫美國的霸權意識形態來重新認識被妖魔化的中國大陸。這是台灣留美學生思想轉變的環境與契機，由此開始了台灣戰後新生代在海外尋找另類出路，而重新串起左翼連線的歷史性集結。

此外他們在美國還有了一個重新認識中國的環境。美國在

度過麥卡錫主義的白色恐怖之後，在五〇與六〇年代之交興起了一股重新關注中國的熱潮，每個重要大學都成立了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並收藏了大量有關中國的圖書，包括大陸出版的中文書刊。這些關於中國的大量圖書與報刊提供了台灣留學生一扇新的窗戶，一個有別於原來在台灣被灌輸的反共教育的新中國視野。不少有心的留學生就從這些中國研究中心的圖書中得到左翼啟蒙與對中國的全新認識，並開始組織讀書會。

這些開始受到左派理論與實踐影響的台灣留學生，其中不少是理工科的留學生，而數學系出身的更是自成一幫，後來不少人回到台灣隱身各個領域。文法科留學生受到左翼啟蒙的，則有不少是殷海光的學生或受其影響者。聯繫六〇年代初期的中西文化論戰來看，在思想上可說是從自由主義西化派到馬克思主義革命派的大蛻變。

這些戰後第一批接受國府教育而後出國留學卻又開始左轉的台灣青年，有著極為不同的家世背景與學科訓練。例如在柏克萊加州大學讀哲學的台南人許登源，出身鐵路員工家庭，是殷海光當年所服膺的西方分析哲學的入門大弟子；

其夫人桃園人陳妙惠是他台大哲學系同學。金寶瑜是公教家庭出身的旗人後代，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後在美國賓州的布林莫爾學院(Bryn Mawr College)取得經濟學博士。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台北人陳若曦，出身小康家庭，就讀台大外文系時即與白先勇等一群同學共創《現代文學》，參與台灣六〇年代的文藝創作風潮；其夫段世堯則是工科學生，外省軍人家庭出身，兩人都來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留學。還有其他留學生幾乎涵蓋了社會上的各個階層。

#### (四) 蟄伏的六〇年代左翼台灣留學生

六〇年代的台灣，歷經五〇年代對左派進行肅清的腥風血雨之後，基本上被塑造成幾乎是鐵板一塊的親美反共社會。左翼組織徹底崩解，左翼思想幾乎完全被消滅，而任何左翼的風吹草動即刻會遭來撲殺。面對這麼一個惡劣環境，來到美國後接受左翼啟蒙的台灣留學生在實踐上能有的選擇不多。回歸社會主義祖國參加建設是其中很自然的一個，認為把社會主義祖國建設好了，台灣的解放就是迎刃而解之事；或說即使不能回台灣實踐，至少回祖國大陸參加建設還可以立即盡其心意。陳若曦與段世堯夫婦在1965年參

加他 們在學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一個左派讀書會時，就已經決心回中國大陸。還 有一些留學生也選擇同一條道路。

當然還是有新受左翼啟蒙的海外留學生試圖對島內有所行動與影響，但 都功敗垂成。例如留學美國夏威夷大學的陳玉璽在海外發表左翼言論，卻在1968 年2 月在日本暫留期間，被日本政府與國府合謀強制遣送回台，而被當局判處七年徒刑，後來在夏大師生的救援下減為三年，出獄後再回到美國繼 續學業。那年稍後的5 月台灣則發生了陳映真案，多人被捕入獄，也牽涉到已經來到美國的蒙詔、劉大任等受到左翼啟蒙的留學生。可以說，台灣這種 對左翼的鎮壓還直接延伸到海外來。

於是這第一批左轉的海外留學生面對六〇年代台灣在戒嚴下的嚴厲環 境，除了選擇回歸社會主義中國像段世堯 / 陳若曦夫婦外，只能暫時羈留異邦靜待時機了，而又基於左翼重視理論的特質，不少讀書會被組織起來，研 習理論，重讀歷史，理解世局，並且互通聲息，互相串聯，以待實踐契機之 到來。

此外有一些個別海外留學生在接受左翼啟蒙後，選擇進到美國社會基層，甚至到第三世界去工作的。例如在印第安納大學攻讀生物學博士的林俊義，在1971年透過門諾教會的安排到非洲肯亞從事教育工作，後於1975年回到台灣東海大學任教，並開啟台灣的環保運動。

於是在六〇年代台灣如此嚴厲的環境下，不回去社會主義中國的，或不認同其為祖國的，幾乎就只能羈留異邦等待時機了，其中許登源、陳妙惠夫婦是必須提到的重要人物。許登源夫婦在1963年來到了柏克萊加州大學攻讀分析哲學，卻發現美國學院哲學系搞的是很專業的數理邏輯，與他們在台灣追隨殷海光沉浸在邏輯實證論的那種生命實踐的境界完全不搭嘎，大失所望。這時他們卻發現柏克萊加大中國研究中心的圖書館收藏了很豐富的中國大陸出版的報刊與圖書，提供了與原先在台灣所接受的反共教育極為不同的思想資源，讓他們得以重新認識中國當代歷史，而發展出對社會主義理想社會的嚮往，並重新思考台灣的出路。

而這時在全球左翼陣營裡還有一件大事發生，就是中蘇共的公開決裂與論戰。在1963到1964年間，兩國共產黨針

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路線展開 公開論戰，中共先後發表了九封公開信，抨擊蘇聯的霸權路線與僵化的官僚體制，即是出名的「九評」。九評帶給許登源夫婦極大的震撼與啟蒙，讓他們 有機會重新認識中國革命與毛澤東的路線。接著柏克萊加大的學生運動也在 這時爆發（1964 年開始的言論自由運動），校園內左翼思潮澎湃。於是他們 遂放棄了西方分析哲學，開始研讀馬克思主義，並被作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指路明燈的毛澤東思想所深深折服。陳妙惠於是轉讀圖書館系取得碩士 學位，作為羈留美國的謀生工具。1965 年許登源曾在蒙韶的引介下來到美國東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參加陳若曦夫婦的那個讀書會，帶領他們學習左翼理 論。後來經由陳若曦，他們也認識了周大緒 / 金寶瑜夫婦。相對於段世堯與 陳若曦的回歸社會主義祖國，許登源與陳妙惠選擇了暫留美國，等待回台實踐機會的來臨，這一選擇反映出六〇年代海外台灣左派面向台灣，認為台灣 社會亟需重建自身左翼力量的信念。

1966 年10 月陳若曦與段世堯夫婦經過一番折衝終於回到北京，卻碰上 文革熱潮，走了一條不曾預期的實踐之路。選擇留在美國的許登源夫婦則在同一年12 月放棄柏克萊

加大的學業，卻沒放棄回到台灣的可能，走上了一條與陳若曦不同的道路。夫婦倆遷移到美國東岸另起爐灶，陳妙惠找到圖書館的工作，許登源則到麻州大學讀取電腦碩士學位。而後許一邊在紐約一家銀行的資訊部門工作，一邊繼續深研左翼理論，結交同志，組織讀書小組，靜待實踐契機的來臨。於是在他們周圍就形成了一個同時關注大陸文革與台灣變化的圈子，如蒙韶、周大緒、金寶瑜、傅偉勳等人。其中蒙韶還是1968年陳映真案的漏網之魚，是陳映真讀書會的成員，在1965年出國後繼續與陳保持密切聯繫，而被當局列為同案分子。而當許登源與陳妙惠夫婦尚未離開柏克萊時，已經受到左翼啟蒙的劉大任與郭松棻也先後來到柏克萊加大就讀，延續了那裡的台灣左翼讀書圈子，劉大任還陪著許登源夫婦搭灰狗巴士橫貫北美洲一路串聯來到紐約。<sup>5</sup>或許我們可以說陳若曦與許登源代表的不同道路，與其說是在左翼思想上的差異，毋寧說是對生命實踐的不同選擇。

如此，讀書會成了羈留美國的台灣左派留學生這個蟄伏時期的主要活動。讀書會作為左翼分子的一種重要活動是有其馬克思主義的特性的，尤其對知識分子而言。馬克思主

義講求的不只是對世間不平的道德義憤，不只是在堅持一個政治立場，也不只是在擁抱一個類宗教式的對理想世界彼岸的信念，而是在實踐中更知性地去認識人類社會演化的真相。馬克思認為他的理論是科學的而非空想的社會主義，因此左翼分子特別重視政治經濟學的學習。有著這麼一個強烈的知性要求，到了一九六〇 / 七〇年代，全世界的左翼理論書籍已是汗牛充棟，但是基本的經典還是大家必讀之物。

於是在海外台灣左派的圈子裡，讀書會的形式就一直延續到保釣運動前夕，並成為保釣運動的一股重大推力所在。幾乎在每所有眾多台灣港澳留學生的大學校園都有類似的活動，例如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劉大任、郭松棻、傅運籌等，奧斯丁德州大學的王義雄等，以及哈佛大學的廖約克、龔忠武等人的學習小組，當運動一來，都成為該地區甚至全美的保釣主力。

#### 四、風起雲湧的七〇與八〇年代

##### （一）從保釣運動到美麗島事件的實踐場域

海外留學生保衛釣魚台運動開始於1970年與1971年之交，是這批左轉了的台灣留學生的實踐契機，上述哈佛的龔忠武、廖約克，德州大學的王義雄等人都積極介入，而沉潛在柏克萊加大的劉大任、郭松棻、傅運籌等人所辦的保釣刊物《戰報》更是成了運動中的鮮明旗幟。許登源與林盛中也曾加入紐約保釣刊物《群報》的編輯群。雖然左翼留學生不是海外保釣運動主要的初始發動者，<sup>6</sup>但在介入運動之後在運動的思想、觀點與方向上所扮演的積極角色，影響了無數參與保釣運動的台灣留學生。很多人開始以左翼進步的視野重新審視時局、檢討歷史、重看兩岸關係，而認識到美國的霸權本質，以致改變世界觀，將生命重新定位。保釣運動成了這一代台灣留學生的世代志業與鮮明印記。

幾乎接著保釣運動而來的是中美和解（從季辛吉1971年7月密訪北京開始）以及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1971年10月），標誌著中國大陸對歐美世界圍堵政策的一大勝利。由於左翼的力量在保釣運動的啟動與開展上起了如此重大的作用，加上中國大陸被歐美世界接受，而當時文革的理

想色彩更是感召 了很多保釣參與者，因此整個運動接著會向中國統一運動轉化也就順理成章了。這年9 月，保釣運動的各地成員在密西根大學所在地安娜堡（Ann Arbor） 舉行國是會議，通過支持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的決議，正式宣告統一運動的 開始。由於當時中國革命熱潮未退、文革理想還在光芒萬丈之時，統運人士的心理重心遂擺在中國大陸，將中國革命的理想及其成果作為中國統一最 厚實的基礎。可以說，中國大陸的文革作為六〇年代全球青年造反運動的一環，是當時台灣留學生左轉的一大因素。若沒有這一因素，恐怕保釣運動會 有不同的面貌，不會是那般的波瀾壯闊。

由於這是來自反共盟邦台灣的留學生左翼運動，馬上引起美國情治單位 的注意。又因為中美開始和解，他們更是密切監視來自台灣留學生的政治動向，而在留學生組織中安置了不少線民。在這種情況下，參加保釣 / 統運的活躍分子遂經常受到如FBI 等單位的騷擾，甚至迫害。例如當時在奧斯丁德 州大學讀土木工程博士的王義雄，由於參與發動當地的保釣運動，並在中國 同學會與台灣同鄉會裡積極推動保釣理想，又於1974 年去大陸訪問，而被線 民打了

報告，遭到FBI 約談。接著他的夫人張梅梅在1978 年參加旅美台灣婦女訪問團去了大陸後，FBI 又來要求合作而被他拒絕，於是他就被移民局以國家安全為由驅逐出境。這個來自美國官方的迫害，還讓他一度必須躲到墨西哥。後來透過美國友人、保釣同志與台灣同鄉的幫忙，他才回到美國與妻小團聚，最後一家人落籍洛杉磯地區，繼續支持海外台灣人的左翼運動。而他的身分問題則拖到1982 年才得以解決。王義雄參加保釣而遭來迫害的經歷 有著十足的代表性，顯示出參加保釣運動的台港留學生所引發的美國政府的冷戰神經癱瘓。

可以說，保釣到統運的過程影響了這整個一代的留學生與學人，形塑了 他們的另類世界觀，燃燒他們生命的青春熱火直到世局又再一次改變，是整個七〇年代海外台灣與港澳留學生的共同記憶。然而在1975 年越戰結束，全球青年運動逐漸沉寂；1976 年毛澤東去世，接著發生四人幫事件；1978 年底 鄧小平復出，改採「改革開放」路線等一連串事件之後，這波保釣 / 統一運動遂走入尾聲。

與此同時，台灣在經過國府退出聯合國的挫敗之後，原先

個別孤軍奮戰 的黨外人士再度活躍，他們在1975 年創辦了《台灣政論》雜誌作為集結點。自1960 年《自由中國》停刊之後，《台灣政論》是十五年來第一本成氣候的政治刊物，雖然只出了五期，到了年底就被禁刊了，但它的出版不論在政治上或台灣意識上都是劃時代的，是七〇年代台灣政治轉折的一個重要徵兆，代表著台灣本土政治勢力的崛起，以及民主運動的展開。這個變化也深深影響到海外的台灣留學生，包括深受政治啟蒙的保釣學生，於是也促成了不少以 台灣民主發展為主要關心對象的活動團體。

在美國與保釣運動約略同時發生的還有台獨運動。1970 年全球「台獨聯盟」成立，合併當時在美國、加拿大、日本、歐洲和台灣的台獨組織，而以美國為主要基地。台獨聯盟的主流派自然採取毫無第三世界概念的親美反共路線，與保釣運動在整個七〇年代同時在台灣留學生中展開影響力的競爭。然而其中也有一些與許登源這些人同樣在六〇年代美國留學時代受到啟蒙的 左翼分子。

在台灣黨外民主運動勃興的1978 年底，美國宣布將與國府斷交，當局停止正在進行國會選舉，並於翌年初誣陷黨外

高雄老縣長余登發為「匪諜」，將其逮捕入獄，引發黨外人士首次公開示威的「橋頭抗爭」。最後在1979年底引發了高雄美麗島事件，及後續的一連串逮捕、審判、林家血案等動蕩。由此而將台灣民主運動與台獨思想往前推了一大步。

這些是保釣運動之後而鄧小平復出之前，羈留海外的台灣左派所面臨的局勢。在這期間，中國革命依然光芒萬丈，台灣資產階級民主運動開始蠕動，海外親美台獨運動已經興起，這些都是台灣左派如何面向台灣的重大課題。

## （二）「社盟」與《台灣人民》的摸索

六〇年代就開始集結的老左派如許登源這些人，在七〇年代初的保釣統運與台獨運動同時興起的新局面下，就要面對一個新的難題。他們原來處在著重左右之分而統獨爭議較為壓抑的情境，問題意識圍繞在台灣社會的階級分析與革命階段等議題，如今因為保釣運動的爆發、中美的開始和解、中國大陸的進入聯合國以及右派台獨勢力的崛起等這些形勢的變化，突然必須直接面對統獨問題了。或者說，

對海外台灣左派而言，新的形勢迫使統獨問題 登上了議程表。

接受左翼啟蒙並且深受中國大陸革命影響的這批海外台灣左派，如何對待也是一樣接受左翼理念，卻主張獨立的台獨左派呢？這個左派內部的統獨 爭論就在保釣運動後社盟分子所辦的刊物《台灣人民》上面展開。

「社盟」就是在一九七〇年代初形成的「台灣人民社會主義同盟」，是個台灣留學生社會主義者的鬆散左翼聯盟，其成員在社會主義的共識下，有肯定中國革命道路的，也有主張台灣獨立的，但都特別強調台灣人民在左翼運動 上的主體能動性。因此不同主張的成員就各自形成小組，以生產工具取名， 例如角尺組、鋤頭組、斧頭組等。各小組之間相對獨立，甚至相對保密，橫向聯繫極其謹慎隱秘，而以《台灣人民》這份刊物作為他們共同發聲的舞台與溝通論辯的管道。不管統獨爭論，他們基本上認為台灣基於其歷史條件，必須重新發展出社會主義運動，也相信台灣社會有左翼運動的潛能，有自求解 放的條件。

《台灣人民》在1972年10月發行第一期，開始針對台灣的出路進行左翼理論的探討。這本刊物由住在西雅圖的陳惠松擔任主編，所有稿件集中到他那裡。由於還是在嚴密的冷戰時期，必須防備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與台灣國府的雙重監視與迫害，例如上文提到的王義雄事件，因此出版上很多步驟必須隱密進行。陳惠松於是在家裡配置了一台中文打字機，由他的夫人李富美負責打字。陳雪梨這時也來到西雅圖參與最初三期的創刊、編輯與打字工作。她在台大保釣運動時就讀外文系一年級，隨後休學來到美國。1972年春天她正準備回台大復學，這期間她除了參與《台灣人民》的籌備與編輯外，還曾寄了一箱左翼書籍回台灣給保釣朋友。隔年初春她卻因這箱書牽涉到台大哲學系事件<sup>7</sup>而上了黑名單，不能回台。黃武雄在學成回台前，也曾與其兄弟積極參與創刊事宜。

這本刊物最初的印刷是由在西雅圖開設印刷店的一位台灣同鄉贊助設備與紙張，而由刊物工作人員晚上去自行印製的。後來每期打字與編排完稿後，就寄到東岸的許登源處，由許找紐約的印刷廠印刷，再拿回來自行裝訂成書發行。書上所列的通訊處卻是遠在加拿大最東岸的哈利法克斯

(Halifax) 一個郵政信箱。

服膺中國革命路線而積極參與《台灣人民》這場論辯的許登源，因此遭來一些統運人士認為他統獨立場不明的批評。為此許登源夫婦在1972年底密訪北京，與當時剛回歸中國大陸工作的保釣同志林盛中寫了一份〈對台工作意見書〉提交給周恩來，建議中共當局重視台灣人民在統一與解放過程中的能動性。<sup>8</sup> 之後中共在統一問題上在原先的「神聖領土」宣示之外，加上「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呼籲；同時在各中央組織架構上開始設立台灣省代表團。文革高潮中的這個對台政策調整乃是海外台灣左派最顯著的成果。除了顯示中共重視保釣運動人士與海外台灣左派的意見外，還反映出中美和解與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所帶來的局勢變化已經將台灣問題擺上了檯面。台灣的左翼組織在五〇年代被全面撲滅之後，中共完全失去與台灣社會連結的機制，以致來到一九七〇年代重返聯合國後的這個變動時刻，就必須直接來面對台灣人民了。

在新的形勢下，還有一些在「社盟」這個大傘之下沒有曝光的一些人也在1972年前後回到台灣來，進到各個大專院

校教書。其中有不少受到左翼啟蒙的數學家來到台大數學系與中研院數學所，包括黃武雄等人以及與他們有關係的唐文標。但除了出身香港的唐文標很快進入文藝領域挑起現代詩論戰，以及黃武雄與台大保釣學生有所接觸，並利用中學數學教育改革的機會在台灣南北遊走一遭，進行社會調查之外，幾乎只能進入蟄伏狀態，動彈不得。

社盟回台分子的蟄伏不動，反映出左翼分子在台灣進行實踐工作的艱難。五〇年代以降任何風吹草動，都會立即引起注意而遭到撲殺。例如1968年的陳映真案、1972年成大學生吳榮元蔡俊軍案、1973年台大哲學系事件以及1977年戴華光案等是其中犖犖大者。因此海外台灣左派除了回台一途，還是延續了六〇年代兩條道路的選擇：回歸社會主義祖國，或是留在美國等待時機並對台灣留學生進行啟蒙。被保釣風雲所捲入的眾多台灣留學生中，陸續有人低調、默默地回歸社會主義祖國，其中林盛中是極少數公開的人之一。也有很多人因上了國府的黑名單而回不了台灣，甚至被吊銷護照成了黑戶，如林孝信、劉大任等。他們是別無選擇地留在美國。

這些六〇年代開始的台灣海外第一批左派分子終究沒能共同解決新局勢下的難題，《台灣人民》最後還是因為統獨爭議在1975年2月出了最後一期第十期之後停刊了。停刊後，社盟分子顏朝明與Philip Chen曾回到台灣任教，並參與新起的黨外運動，但在1978年底中美建交而選舉中斷的緊張肅殺氣氛下也回到美國來。

### 三) 芝加哥「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的奮鬥

雖然保釣統運的發展將重心擺在中國大陸繼續革命的進程上，但保釣分子中還有一批人將重心放在台灣。那時還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物理博士學位的林孝信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在保釣運動的發動上，林孝信曾做出很大的貢獻，他利用他們當時為台灣籌辦的《科學月刊》通信聯絡網《科學月刊工作通報》，以「循環信」的方式傳遞保釣信息，讓信息很快傳遞到遍布全美各大學的300多個聯絡員，對運動的開展起了莫大作用。和多數籌辦《科學月刊》的留學生一樣，林孝信也在芝加哥大學積極投入保釣運動，創辦了《芝加哥釣魚台快訊》推廣保釣理念，以致護照被國府吊銷。

隨著保釣運動的發展，林孝信也接受左翼的啟蒙。而重要的是他與芝加哥大學保釣會把關心的重點放在台灣社會的發展與解放上。支持台灣正在蓬勃興起的各種社會運動、文學改革運動、人權運動與黨外民主運動等。他們積極介紹這些社會與政治變遷給海外留學生，傳播海外不容易看到的資訊，舉辦演講會與討論會，發動募款捐助台灣的這些活動等等。由於當時台灣仍處戒嚴狀態，多數的支援活動必須以隱蔽的方式進行。唯必要時仍然有適當的公開方式，最顯明的例子為1976年的營救政治犯陳明忠的公開活動。

由於對台灣的關心，「陳明忠事件」發生後立即引起林孝信等人的注意。老政治犯陳明忠於一九五〇年代在綠島被關了十年，出獄後在1976年再度被捕，並判死刑。此消息經由在台灣活動的美國人權工作者Lynn Miles（中文名：梅心怡）帶出，登在美國的華文報紙上，引起保釣學生的關切並發動救援。由於案情嚴重，時間緊迫，芝加哥的林孝信這批人，還有不少香港同學，在短短幾天內做了大規模的動員，包括在全美國留學生界發動募捐，集資在《紐

約時報》刊登全頁抗議廣告（1976年11月27日），以及相應的一兩百位國際關心人權人士的聯署、募款、示威遊行等等。這公開活動規模之大堪稱

1971年保釣四一〇大遊行以來所僅見，最終促使台灣當局改判陳明忠15年。基於把重心放在台灣以及這些具體活動上，芝加哥釣魚台行動委員會持續運作，成了海外保釣運動存在最久的團體。《芝加哥釣魚台快訊》也成了釣運發行最久的刊物，一直到1977年才停刊。

1979年底台灣發生高雄美麗島事件，黨外民主運動面臨當局鎮壓的危機。在局勢急遽變化下，一九八〇年初林孝信以及他的熱烈支持者如李義仁、李乃平、邱燕、陳杏村、李正雄、蔡烈輝、桂懷瑄、劉申忠、林清茂、劉婉玲、熊建勛、楊寧蓀、陳津渡、陳文嘉、劉沅、陳淑貞、黃建寅、洪永泰、王惠珀、舒詩偉、陳美霞等一夥人隨即成立「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還有一些香港參加保釣運動的留學生如王于漸、陸元輝、雷鼎銘、馮慧文、黃賢、梁榮誠、劉澤甫等人也在許多地方出錢出力。接著出版《民主台灣》，將整個運動的重心放在台灣的民主抗爭上。此後芝加哥也

成為當時台灣民主運動人士如蔡仁堅、陳鼓應等人訪美時必經之地。

由於林孝信等人和六〇年代的海外台灣左派一樣，認為台灣社會必須有自己的社會改造與解放力量，才能達成真正的統一，於是積極介入台灣的民主運動。因此不免要與各種政治光譜的政治活躍人士與團體接觸，有如許登源的情況，結果也不免招來部分統運人士認為他統獨立場不穩或地方主義的批評。在這樣的狀況下，林孝信還是苦心孤詣，雖然已是美國移民局的黑戶，還像個苦行僧那樣遊走整個美國，串聯各地台灣左翼分子積極面對台灣政治與社會的變化。他尤其重視保釣之後新來乍到的台灣留學生，努力地將深奧的左翼理論普及化，對他們進行啟蒙工作。七〇年代開始的林孝信和民主運動支援會一幫人可以說是代表保釣之後新起的、面向台灣的海外左派。當然保釣運動之後的整個七〇年代，類似芝加哥林孝信的左翼集結在美國其他各地也不少，他的組織與行動只是比較顯著的例子。

來到八〇年代，芝加哥的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還以夏令營的方式，不時將受到保釣運動影響的留學生集合起來，互

相切磋砥礪，不少人受到影響而回到台灣來。林孝信每年定期主辦夏令營，地點就分布在從美國中西部的芝加哥到東岸紐約這一段80 號州際高速公路所經過的城市。這個夏令營是個較為輕鬆、帶著園遊會氣氛的全美台灣左翼留學生交流會，讓大家相濡以沫。不少人在這裡初次相識，如那時在哈佛的夏林清 / 鄭村棋、在印第安那大學 的何春蕤 / 卡維波、在大芝加哥地區的舒詩偉、丘延亮以及瞿宛文 / 鄭鴻生等人，都在這裡首次碰頭。這些關係就一直維繫到回台灣之後。林孝信每次也會邀來台灣政治與社會運動界人士來參加，像蘇慶黎、陳忠信、柴松林等 人，企圖建立一個海外台灣左派與台灣政治與社會運動人士之間的橋樑。

#### （四）從《台灣雜誌》到《台灣與世界》的進步言論場域

美國東岸也有一批人開始進行與林孝信的民主運動支援會性質相同的活動，卻是以刊物的形式出現，就是葉芸芸等人在1977 年創辦的《台灣雜誌》 以及接著在1983 年發行的《台灣與世界》。

《台灣雜誌》是隨著台灣民主運動的興起，海外台灣左派第一份面對一般留學生的有關台灣的刊物，起源於1976年底葉芸芸／陳文典夫婦、黃于燕夫婦以及陳其南夫婦等三家當時在耶魯大學的台灣同鄉，為援救台灣的政治犯陳明忠而印行的一份手刻鋼版9的專刊叫《動蕩的台灣》，成為全美留學生界救援陳明忠的重要力量。這份專刊還由陳明忠的綠島難友——當時寓居耶魯的台灣老左派台南人胡鑫麟醫生（小提琴家胡乃元之父）——執筆數篇。胡鑫麟是台大眼科醫生，1950年與許強同案被捕，在綠島關了十年。援救陳明忠一事可說是在保釣／統運的文革與中國熱潮中轉而面向台灣的一個重大旗號。葉芸芸等在耶魯大學的三家人接著在隔年創辦了《台灣雜誌》雙月刊，起初也非打字印刷，財務支援主要來自花俊雄、黃于燕等老保釣。這份刊物的創辦，一方面是支援新起的台灣黨外民主運動，另一方面也以左翼視野來重新尋找台灣的歷史。最初的讀者對象設定在一般台灣同鄉與留學生，所以會把刊物拿到台灣同鄉會的活動場合去擺攤。因此剛開始時也屢屢遭到統運人士批評為地方主義。但那時正值四人幫事件之後，保釣／統運人士受到衝擊，開始重新思考中國革命與台灣解放的問題。於是後來有不少保釣人士出錢出力支援這份

刊物。

隨著中國大陸鄧小平的改弦更張與台灣美麗島事件的發展，《台灣雜誌》來到八〇年代後逐漸得到更多的支持，於是到了1983年就提升為打字排版，接著在這年6月改名為《台灣與世界》，由雙月刊變成了月刊，擴大發行範圍，成為一份對海外僑界進行左翼啟蒙的重要刊物。這份刊物一直定期發行到1987年6月解嚴前夕才停刊，加上前身的《台灣雜誌》，從1977年到1987年一共有十年之久，影響深遠。

從《台灣雜誌》到《台灣與世界》前後十年的時間，所涵蓋有關台灣的議題包括鄉土文學論戰、黨外民主運動、台灣環保問題、台灣的弱勢團體等，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台灣史的重新挖掘。旅居日本的戴國輝以梅村仁為筆名在刊物上主編一個「二二八史料」專欄，將1947年當時關於事變的各種報導進行嚴謹的歷史整理與註解。葉芸芸也投入心力在日據到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台灣左翼歷史的挖掘上，包括為羈留大陸與美國等地風燭殘年的老左派所做的口述歷史，以及蘇新遺稿的整理，為那個時代留下可

貴的歷史紀錄。他們並在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的 1987 年，參與了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紀念研討會」，還以兩期的篇幅進行專題報導，提供一個有別於國民黨與台獨觀點的左翼視野。

當時面對美麗島事件後崛起的海外台獨運動，不可避免的要面對所謂台灣意識問題。1983 年葉芸芸趁著陳映真來到愛荷華大學訪問之際，請了戴國輝和陳映真進行一場關於「台灣意識」的對談。這篇對談紀錄也同時登在台灣 的《夏潮論壇》上，是《台灣與世界》與台灣島內左翼連線的開始。之後也有一系列文章討論當時台灣所謂「中國結 / 台灣結」之爭，企圖清理出一個人民的視野。

這份刊物緊扣著美麗島事件之後八〇年代台灣的政治與社會變動，除了每期都有一定篇幅的「台灣文摘」外，從 1983 年王昇倒台、1984 年立委選舉、1984-1985 年之交的江南案及其後續政治影響、1985 年底縣市長選舉，到 1986 年底黨外人士終於組成民進黨，以及蔣經國的接班問題等一系列發展，都成為刊物一再涵蓋的報導專題。而基於發展台灣自身解放力量的立場，他們也密切關注海外傾台獨

人士的政治活動，例如 1985 年洪哲勝脫離台 獨聯盟組建台灣革命黨、同年全美台灣同鄉會的台灣前途討論會，以及許信良在 1986 年組織台灣民主黨等活動，都是該刊的報導專題。此外《台灣與世界》對台灣新興的社會運動也多所著墨，尤其是剛起步的環境保護運動、原住民運動與婦女運動。環保方面除了甯明杰與林俊義等人 寫過多篇文章外，刊物還專題報導了 1985 年開始的反核能發電與 1986 年的 鹿港反杜邦設廠運動，還有蘭嶼成為核廢料儲存場問題。此外他們也訪問、介紹了台灣新生代民歌運動中的抗議歌手，如楊祖珺、胡德夫、羅大佑等，以及他們各自參與的黨外與原權會活動。

他們在文藝方面也大力推介並刊載台灣具有社會意識的作家。從李黎、洪銘水等評介陳映真出獄後的創作，1985 年的楊逵紀念專輯，吳晟、楊青 矗、鍾肇政、七等生等作家的評介，還有王拓獄中所寫新小說〈牛肚港的故事〉的首刊與連載，都可看出他們延續鄉土文學論戰的道路。此外，他們也 注重母語傳承的問題，登了不少洪哲勝以及台灣老左派胡鑫麟、蘇新等人寫 的閩南語研究文章。

他們也一直關心著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一九八〇年代的曲折發展與兩岸關係，包括三峽建壩、1987年初胡耀邦的下台所引發的學運、中港台三地轉口貿易與兩岸三通等問題，並以台灣被壓迫人民的立場對大陸當局的對台政策屢屢提出建言與批評。

然而這兩份刊物並非只是心懷台灣、關心大陸，他們也放眼整個世界的局勢與發展，尤其是第三世界，以及跨國公司形成後的工業發展問題。雖然因為篇幅與人力所限而未能多所發揮，但整體內容確是涵蓋了當時所有進步運動的議題。

由於這份刊物涵蓋面的寬廣，稿源也就來自各個方面，例如《中報》的陳玉璽、王耀南、《中國時報》的黃樹仁、主編《華僑日報》副刊的王渝，老保釣如花俊雄、湯錦台、崔少明、倪慧如、夏沛然、李黎，環保運動的甯明杰、林俊義，新生代的李榮武，每期提供政治漫畫有兩年之久的CoCo，經歷過台灣白色恐怖年代的大陸籍畫家秦松、麥非，華府的朱養民、李哲夫，來美的訪問學人蕭新煌，還有日後慘遭殺害的劉宜良（即江南）等等，甚至傾向台獨的洪

哲勝、謝里法、張良澤等人，不一而足。因此刊物的資源雖然主要出自台灣出身人士，但也有來自旅美華人社群的支持。這份雜誌的名稱正是標示著關懷的對象不只限於台灣與大陸，還面向整個世界，對左翼而言就是面向第三世界。可以說《台灣與世界》月刊的發行是保釣運動與海外華人在一九八〇年代共同的大事，提供海外華人一個進步思想導向的言論空間。

當初《台灣雜誌》發刊時是在美國東岸耶魯大學所在地，一九八〇年代初隨著陳文典、葉芸芸夫婦因工作關係搬到西岸南加州的聖地牙哥，編輯部也搬到那裡。由於聖地牙哥靠近洛杉磯，這份刊物遂也得到蔡建仁等人的支援。1983年他們又搬回東部的華府定居，並將擴大的《台灣與世界》編輯部設到紐約，因為那裡正是東岸華人薈萃之處，人才與資援較不虞匱乏，包括編輯人員與印刷發行，其中尤為關鍵的是得到在紐約經營印刷廠的老保釣陳憲中的支持。陳憲中不僅平價承攬印刷，還在工廠裡提供一間辦公室作為

《台灣與世界》的編輯部與發行部。一九八〇年代初個人

電腦與網路才剛起步，還沒有中文電腦排版工具，

一台龐大的中文打字機需要專業人員來操作，而那時正有位香港留學生葉鳳新有此技術，志願幫忙，打字工作遂一直由她承擔。香港留學生的積極參與，包括加入編輯群，代表著這份刊物得到保釣運動人士的廣泛支持。當時釣運／統運已經進入反思期，而台灣民主運動處於上升的歷史時間點。這份刊物可以說是在統運走入尾聲之後，葉芸芸等人重新整合了一批保釣運動的廣泛資源，不分省籍與港台，確立了面向台灣的定位而出現的。

因為雜誌社組織鬆散，除了極少數的編輯與發行等專職人員外，其他都是來去自由的義工。必須一提的是，在大紐約區參與《台灣與世界》的這批人中有陳玉璽，他那時已經從台灣出獄來到美國在紐約的中報當總主筆，還有和他一樣出身夏威夷大學如王耀南（擔任總編輯）和朱立創（以周勵春之名擔任總經理）等幾個人。夏威夷大學在六〇、七〇年代曾經是美國左翼進步運動的重鎮，不少台灣留學生在那裡受到啟蒙，成露茜也出身該校。王耀南在1986年回台灣後總編輯一職就先後由崔少明、黃樹仁與夏沛然接

任。此外，從芝加哥轉到紐約地區工作的倪慧如 / 鄒寧遠夫婦也一直是刊物在編輯、撰稿與財源上的持續支持者。

這兩份先後發行的刊物的經費早先來自台灣同鄉黃于燕、花俊雄等幾位已經就業的老保釣人士。隨著刊物的發展，就有越來越多不分省籍包括港澳留學生加入支援行列。後來財務由二十多位人士認股，每股美金 500 元，每年固定認養 1 至 20 股不等。認股最多的是徐松沅、陳星吟、鄒寧遠 / 倪慧如 夫婦、陳文典以及綠島出來的老左翼胡鑫麟等人。此外也有少數同情或傾向台獨的人，基於支援島內民主運動與關懷台灣的立場而來捐款。其他還有老一輩對國民黨不滿的人士，馬來西亞、新加坡的華裔留學生等，可見這份刊物凝聚力量之廣泛。

#### （五）八〇年代新形勢下的突圍：《台灣思潮》與洛杉磯的集結

林孝信成立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葉芸芸創辦面向台灣的《台灣雜誌》與《台灣與世界》、許登源夫婦千里迢迢密赴北京提出〈對台工作意見書〉，以及《台灣人民》這一刊物

試圖在統獨之間尋求一個左翼的平衡點等等，都是在保釣運動後的這麼一個七〇年代新形勢下的奮鬥。可以說七〇年代保釣運動之後，這些面向台灣的奮鬥基本延續了六〇年代海外台灣左派的特徵，即是對統一與解放的辯證看法：中國的統一與台灣的解放必須有台灣人民積極參與其中。

然而時局接二連三地變化：大陸從 1976 年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到 1978 年鄧小平復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改弦更張採取「改革開放」路線，又一次帶來巨變。台灣則從 1971 年退出聯合國、國民黨法統逐漸崩解、黨外民主運動風起雲湧、海外台獨運動大受鼓舞，到 1978 年底美國與中國大陸建交、1979 年底美麗島事件，也進入政治動蕩期。這些變化對海外台灣左派而言都是新的挑戰。

鄧小平復出後改行「改革開放」政策，並對解放後三十年來的革命路線進行清理，文革的內部問題也逐漸暴露。這對於奉此革命路線為準繩的統運人士是個翻天覆地的變化，內心難以適應。再則，在這政策下中國大陸的對外吸引力主要來自其逐漸開放的市場與快速成長的經濟。在美國的左翼統運於是失去了動力。

對於海外台灣左派尤其是服膺毛澤東革命路線的人而言，鄧小平的改弦更張更是個理論上的大挑戰。原來的《台灣人民》這一刊物的問題意識已不足以面對此一變局，何況該刊也早在 1975 年就停刊了。許登源、顏朝明與金寶瑜等這批老左派遂在八〇年代初參與保釣後新生代蔡建仁所創辦的《台灣思潮》，一起主導這份新刊物的議題與方向，並撰述多篇論文與評論。這本由洛杉磯的蔡建仁負責編輯與發行的新刊物在 1981 年 5 月創刊，共發行了八期，最後一期出版於 1984 年 4 月。這份理論刊物不只在探討台灣社會的演變，因應美麗島事件後的新局面，也要來面對後文革的大陸變局，面對中國大陸是否走資的問題，以及第三世界革命道路的問題。

台灣原來不分統獨的黨外民主運動，在美麗島事件後逐步轉化成以親美台獨派為主流的運動。在台灣被禁刊的《美麗島》雜誌移到洛杉磯來發行《美麗島週報》，由那時羈留美國的許信良於 1980 年 8 月創刊，先後找來陳婉真、孫慶餘、陳芳明等人負責編輯（邱義仁在 1982 年回台路過南加州時曾參與其中）。當時在洛杉磯的蔡建仁、顏朝

明等人曾以延續《美麗島》雜誌包容 統獨的精神幫忙尋找房舍，參與創刊與編輯。但終究因路線不和，不容於右 派台獨的主流派而退出。這份台灣民主運動的海外宣傳刊物遂淪為右派「台 灣民族論」的吹鼓手，成了海外台灣人的當道言論。

因此《台灣思潮》的創辦也是要來處理 1979 年底美麗島事件後，台灣民 主運動的統獨變局檯面化的新局。這是對海外台灣左派的另一個挑戰，原 來在六〇、七〇年代，台 灣的問題著重在左右之分（「右」指國民黨，「左」指 民主派），統獨只是《台灣人民》內部爭議。海外左派基本上支持島內民主運 動，認為先要進行民主革命，如今卻要來面 對台灣民族論興起的問題，面對 運動上的統獨問題了。這是《台灣思潮》創刊的重大背景。

在企圖以階級分析與第三世界視野來超越狹義的統獨陷阱上，許登源用 何青與彎弓為筆名寫了題為〈對台灣社會階級分析的一些看法〉的一系列文 章。這組文章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從不同的角度去探討分析台灣社會，為這 個台灣的統獨變局提供階級分析的理論基礎。而顏朝明則以王茂

盛為筆名寫了〈從革命觀點看台灣製造業就業人口的演化〉與〈從革命觀點看當代台灣就業人口〉等數篇文章，探討 20 世紀台灣現代化下產業工人的形成與發展，也構成一組重要論文。

《台灣思潮》也要來面對與處理中國大陸文革結束後的左右變局，譬如許登源以彎弓為筆名寫的一篇〈社會主義的再認識—對當前中國經濟理論若干問題的批判〉，針對當時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理論加以探討和批評。

對於第三世界革命道路的問題，《台灣思潮》也用了不少篇幅在討論「依賴理論」及相關問題，陳玉璽（筆名王春根）與金寶瑜（筆名鍾望如）都加入這場論辯。此外，這份刊物也投入篇幅探討左翼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等議題，並發掘光復前的台灣左翼運動歷史，試圖重新連結這個傳承。

相較於《台灣人民》這一刊物的參與者是六〇年代的台灣留學生，《台灣思潮》則有受到保釣運動影響而在七〇到八〇年代來到美國的台灣留學生

加入。以台灣流行的「年級」說法，又可說是海外台灣左派「二、三年級」到「三、四年級」的傳承。蔡建仁是在七〇年代中後期來到美國，他在創辦《台灣思潮》之前就已在洛杉磯活動數年，那時王義雄／張梅梅夫婦、顏朝明等人也先後來到這裡。七〇年代末，蔡建仁先在洛杉磯聚集了這一批海外左翼力量，包括六〇年代的老左派與七〇年代的老保釣如顏朝明（老李）、王義雄／張梅梅夫婦、曾宗偉、羅小如、Philip Chen、劉克非等，及從美國各地轉到洛杉磯讀書或就業的留學生如紀欣、井迎瑞等。八〇年代初，他們以此為基礎，加上東部的許登源夫婦與金寶瑜，大家按月捐款支助創辦了《台灣思潮》，由蔡建仁負責主編，紀欣與張梅梅先後擔任總務。他們並積極教育剛來美國的新一代台灣留學生，包括來到洛杉磯讀電影系的王介安、焦雄屏等人，為他們舉辦過無數次的讀書會及電影欣賞會（觀賞評論侯孝賢、楊德昌等導演的台灣新電影，以及大陸與第三世界電影），少則八、九人，多到數十人，影響涵蓋南北加州。八〇年代的洛杉磯就因為他的積極活動而成為海外台灣左派的一個重要據點。

當時成露茜已經在洛杉磯加州大學成立亞裔民族研究中心。

她雖然著重 在美國華裔 / 亞裔社區的工作，但一直與蔡建仁保持密切聯繫，她的學生王振寰則經常參加洛杉磯據點的活動。蔡建仁又在全美國到處串聯，將各地台灣左翼人士聯繫起來，並找來參加讀書會。此外洛杉磯的這一群人也費了不少精力去聯繫照顧流寓大洛杉磯區的日據時期台灣抗日左翼人士，像簡娥、郭德金、蔡德音等前輩。這些人都已是垂暮之年，但就像楊逵在一九七〇年代初年在台灣復出那樣，代表著兩個世代的重逢。

八〇年代由於黨外民主運動的衝擊，台灣社會開始鬆綁，遂有不少留學生在洛杉磯的這個海外台灣左派據點的啟發與影響下，在解嚴之前就回到台灣，如王介安與吳正桓。此外從這裡也經常有人回台如紀欣等，回台接觸異議人士，探望捐助美麗島事件受難者家屬，並支援參與各次選舉的台灣黨外人士以及剛萌芽的勞工運動組織勞支會。口耳相傳下，洛杉磯據點於是成了台灣社會與政治運動人士到美國訪問時必經之落腳處，羅小如、紀欣與王義雄等人的家就成了接待中心，先後接待過陳映真、郭吉仁、蔡仁堅、汪立峽、莫那能等人，以及美麗島事件坐牢出獄者如張富忠、陳忠信、王拓等人。蘇慶黎於八〇年代在美國東岸進

修期間也曾數度來此長住，成為島內與海外左派之間的一個重要聯繫。很多台灣議題的討論，像原住民問題，也經由這個聯繫而擴散到海外華人留學生圈與相關刊物。

在 1987 年解嚴之前的這段期間，洛杉磯據點所組織的無數讀書會中最 重要的乃是《資本論》讀書會。這主要是為了因應七〇年代末期中國大陸的變局以及西方新馬理論的流行，所帶來海外台灣左派在理論上面臨的難題。蔡建仁認為大家必須回到馬克思的原典，尤其是這部對資本主義終極分析與批判的政治經濟學頂峰之作，來從頭學起。1981 年開始顏朝明就曾為大家講解左翼理論，接著在 1983 年開辦的《資本論》讀書會每次約有一星期左右的時間，成員來自全美各地已經就業或還在求學的，也有從台灣遠道而來的政治與社會運動活躍分子如汪立峽等。開始時曾在東部華府葉芸芸家開辦，招來美國東部的留學生，後來就主要在洛杉磯開班。而遠在紐約的許登源、底特律的金寶瑜和近在洛杉磯的顏朝明幾位六〇年代台灣老左派則來帶頭幫助大家學習。這個《資本論》讀書會確實很有助於參加者在左翼理論上的深化，以及此後的持續集結，可謂影響深遠。

基於台灣左派運動必須自我培力的信念，蔡建仁一直鼓勵並策畫同志回台發展群眾組織，推動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參與各個戰線的奮鬥。而羈留海外不克回台的人則出錢出力來支援台灣島內的發展。於是乃有解嚴之後回到台灣的這些與洛杉磯據點有關係的人曾被冠以 LA 派之名。此外紐約的許登源、陳妙惠夫婦那裡也是一個重心。他們所積極參與的《台灣人民》刊物在七〇年代中期由於形勢變化而退場（其中傾向台獨的部分人士接續辦了《台灣革命》、《台灣時代》等刊物），八〇年代開始許登源遂與蔡建仁合作辦了《台灣思潮》來面對新的形勢。同時許登源夫婦繼續以其一貫立場與台灣同鄉會以及台獨左派如洪哲勝等人保持著聯繫，家裡的大客廳也會成為他們的交流點。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家的大客廳同時也是台灣左翼或新受左翼啟蒙的留學生的聚會所。許登源以其哲學的背景、理論的深度與對形勢的獨特見解，深深吸引了無數追求左翼理論視野的台灣留學生，不時從美國各地聚到紐約。而六〇年代的海外台灣老左派如蒙詔、金寶瑜、傅偉勳等人也繼續聚集在他身邊，發揮很大的影響力。在當時中共革命路線的改弦更張與台灣民主運動的乍興，而左翼思想一時陷

入混沌的情況下，許登源成了八〇年代台灣左翼留學生的理論倚靠。

## 五、迎接台灣解嚴與冷戰結束

### （一）解嚴之前台灣海外左派的集結

於是整個八〇年代在美國的台灣左派就自然形成了幾個主要集結點，各以紐約的許登源、華府 / 紐約的葉芸芸、芝加哥的林孝信以及洛杉磯的蔡建仁為中心。這幾個中心剛好分布在美國的東岸、中西部與西岸三個主要都會區。當然這幾個大據點也只是在行動上比較突出而起領導作用的，其他的城市與鄰近地區也有不少小據點。

例如東岸的波士頓地區本是菁英薈萃之地，自有其澎湃的進步思想，並與這些據點有著密切聯繫。哈佛先有龔忠武、黃維幸等人，後有夏鑄九、夏林清與鄭村棋等年輕一輩。

又如西岸加州的舊金山灣區本來就是激進思想與運動的重鎮，自有著一群六〇年代的老左派如趙先國。他年少時被

國民黨拉夫當兵來到台灣，退役後 移民美國，落腳舊金山灣區，在奧克蘭經營一家電視修理店。由於他同時與社 盟分子和保釣運動都有密切關係，電視修理店是很多人路過灣區必經之地， 因此在六〇、七〇年代左傾的台灣留學生中成了聯繫各方人馬的關鍵人物。

此外柏克萊加州大學也一直聚集著不少追尋另類出路的台灣留學生， 從六〇年代起，許登源、陳妙惠、劉大任、郭松棻等人就曾在這裡熱烈活動 過，並成為保釣的主力。夏鑄九哈佛學成回台後在一九八〇年代又來到柏克 萊加大進修，當時比他更年輕的學生群在柏克萊組成的箴言社成員吳永毅、 王蘋、丁乃非、陳光興、郭文亮等，都曾熱切參與這幾個大據點的活動。

就這幾個據點的代表人物的年紀而言，他們分別是三〇、四〇、五〇年 代出生的三個年代人，但基本上都是光復後接受國民政府教育，成長於台灣 五〇與六〇年代的戰後新生代。因此更重要的是，雖然有著這三個年代的年 齡差距，卻有著相同的成長背景，彼此觀念溝通不是問題。而參加到這幾個 據點活動的留學生也基本上是重疊的，聚集到林

孝信的夏令營相濡以沫的一群人，會在下一次紐約許登源家客廳裡再次碰面，也可能接著參加洛杉磯的讀書會，一起研習資本論，然後為《台灣與世界》或《台灣思潮》撰稿。1987年2月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紀念研討會」就是由紐約的《台灣與世界》、芝加哥的「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以及洛杉磯的《台灣思潮》共同具名合辦的。又如洛杉磯年輕的王介安，他在1985年回台之前就曾經到全美國各個大小據點串聯一番。

由於這幾位帶頭人物積極在全美國串聯，以及這幾個據點的各種活動與刊物，就把當時抱著第三世界胸懷，不想接受美國資本主義的全球既定秩序，而要追尋另類出路的台灣留學生幾乎一網打盡了。後來回到台灣來而繼續走在追尋另類道路的這些人，很少不曾與上述幾個據點之一接觸過。

## （二）海外台灣左派共識的形成

在八〇年代的美國，這麼一批三〇年代到五〇年代出生的台灣留學生有著這麼熱絡的交流，雖不曾形成過任何形式

的行動組織，但也凝聚出一些基本共識。他們以有別於海外統運或右派台獨的想法聚在一起，以第三世界左翼理想相標榜，自有其共同的成長背景與思想發展過程，遂在那時形成了一些共同理念，而能互相維繫，直到台灣解嚴的時刻。

五〇、六〇年代共同的成長背景是個重要的因素，在當時冷戰結構的限制下，台灣的青年造反首先主要是以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形式出現，如《文星》雜誌的中西文化論戰、李敖的反傳統與個性解放，甚至殷海光推介的海耶克都曾在知識青年中風靡一時。成長於那個時代的叛逆青年無不受到這套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洗禮，殷海光的高徒許登源更是其中的鮮活例子，劉大任、郭松棻等人也走過這一階段，包括筆者在內的台大哲學系事件的牽涉者更是接棒的追隨者。

青年的反抗由於受到時代的限制而必須先以右翼的自由主義為其形式，然而同時發生的全球青年造反運動卻又帶來了左翼的衝擊，以致不論在台灣還是海外，都發生了從自由主義到馬克思主義的蛻變，經此蛻變乃有保釣運動的實

踐動能。

如此保釣運動就成了串起海外台灣左派從五、六〇年代的萌芽狀態到七、八〇年代的成長發展的居中關鍵事件。以保釣運動為樞紐，海外台灣左派肯定了從辛亥到解放的中國現代革命過程，甚至也進一步肯定四九年後的革命路線，而保釣運動就有如海外中國人的一場七〇年代的五四運動。這個五四運動與保釣運動所內含的中國人身分，也即是這一批海外台灣左派的基本共識。

然而雖有著中國人的身分共識，統獨卻一直不是這批人的最高判準。只是在這個身分共識下，原來比較以統獨之分為最高判準而又傾向台獨的左翼分子，或者只能退出這圈子（發生在《台灣人民》時期），或者就暫時擱下此議題了。但他們即使在這種不認為台獨是條出路，並且也對其親美反共的主流派完全缺乏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觀念的立場進行嚴厲批判，但對台獨的生成環境也還是抱著歷史性的理解態度。

這種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霸權的第三世界視野，是這些

人的基本立場。

在六〇年代到七〇年代，中國革命路線與毛澤東思想作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標竿，曾是這些人左翼啟蒙的因緣與解放理想的主要資源，並成為胸中的圭臬。因此中國現代革命運動的各階段及其路線之爭是這些人極為重要的問題意識與爭論所在，中國革命的演變遂成為他們內在思維的重要部分。例如 2007 年許登源在台灣出版的《現代辯證法》一書的封面就印著「徹底批判中共官方馬克思主義」一句話，可以想見中國現代革命的進程與變化對這些人的深刻影響。

雖然他們以中國人的身分接受中國現代革命歷史，並認為台灣的解放與兩岸的統一是歷史的必然，但重要的是他們強調台灣因為歷史的特殊性，而應有不同的、具有自身特性的解放過程。這個相對於中國大陸的台灣歷史特殊性在於：首先它是被現代帝國主義長期殖民統治過的唯一中國省分，就是台灣割讓給日本五十年，而有了有別於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發展狀態；接著就是在戰後的冷戰局面下國府嚴厲施行四十年的反共親美政策，以及以美國為主要市場

的外銷出口導向經濟政策，這兩項政策都極為成功，而極大地削弱了左翼活動的各種因子，也構成了缺了左眼的台灣社會，以及對中國革命道路的偏見與敵意。

八〇年代的海外台灣左派基於上述的這些體認，認為台灣左翼在五〇年代被摧毀殆盡之後的今天，台灣人民不能只是等待祖國的解放，必須發揮其主觀能動性，重新發展自身的解放力量（今天的說法就是自我培力或給力），積極參與解放過程，才會是最理想的統一。基於這種觀點，台灣即是他們的最終實踐場域，台灣社會與政治的各種發展與變動就成了他們主要關心所在。從林孝信積極支援台灣民主運動、蔡建仁在回台前積極介入農民運動、葉芸芸挖掘日據與光復初期的台灣歷史、許登源回台傳授資本論，以及解嚴後他們對工人運動及其他社會運動的戮力推動等等事蹟，都反映出這個積極面向台灣的基本立場。

### （三）台灣解嚴與一個海外時代的結束

實踐的契機終於再次來到，1986年底黨外人士成功組成民主進步黨，接著1987年7月台灣解除戒嚴。這是台灣進

步運動的轉折點，社會與政治運動不再非法，報禁解除帶來言論鬆綁，入境黑名單逐步解禁。對於沉潛如此之久的海外台灣左派而言，這是保釣運動之後的另一次實踐契機。其場域就在台灣，別無選擇，大家遂陸續回到台灣來一展抱負了。而且八〇年代在美國受到這些老左派影響的留學生，也多在八〇、九〇年代之交完成學業，適時回到台灣的學術界來。如此《台灣與世界》與《台灣思潮》這兩份刊物的歷史任務結束，此後「海外台灣左派」就成了歷史名詞。

雖說 1987 年的解嚴是海外台灣左派回到台灣進行實踐的轉折點，但八〇年代也正是全球局勢再一次醞釀轉變的開始，代表保守主義的雷根當選美國總統（1981-1989），柴契爾長期執掌英國政權（1979-1990），他們重新建立了右派意識形態霸權。接著 1989 年北京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同年蘇聯東歐集團開始崩解，1990 年李登輝利用三月學運推動國民黨本土化，1991 年底蘇聯正式終結，1992 年鄧小平南巡後進一步推動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思潮開始席捲中國大陸。這一連串的發展帶來的是美國的獨霸，以及新自由主義成了全球主流意識形態，中國大陸也不能倖

免。而台灣自不例外，台獨思想也 成了當道意識形態，整個「五年級」後的世代即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的。對於才回到台灣的海外左派來說，這個變化比起五、六〇年代反共親美的威權 體制、七〇年代之交興起的親美台獨運動，以及八〇年代大陸的改革開放路 線，可說帶來更大的挑戰。

隨著這個新局勢的成形，可以看出海外台灣左派回到台灣的發展就不免 有了各種分歧、迷惑、困頓與挫折，但已非本文所能詳細論說。如今又過了 二十多年，全球局勢又開始一次劇變，歐美可能陷入長期經濟危機，而中國 大陸竟然變成了「世界工廠」。一、二百年來西方現代化浪潮下帶來的各種左 的、右的「進步」思潮，在第三世界各地攪起的各種動蕩與混亂，似乎走到 了盡頭。各種原有的現代或後現代術語與概念，似乎也失去了與現實的相關 性。面對新局，出路在哪？海外台灣老左派接著會如何走下去？這些問題也 就非本文所能涉及了。

附記：回到台灣後的海外台灣左派素描

海外台灣左派在解嚴前後陸續回到台灣來，然而他們面對

的卻是個新而分歧的困難形勢，但還是能夠在八〇、九〇年代之交蓬勃發展的各種社會運動上起了不小的作用。首先是台灣戰後第一個合法的工人政黨「工黨」在1987年底的建立，還在海外的許登源以及已經回台的蔡建仁、鄭村棋、王耀南、王介安等人都曾積極參與建黨工作，出謀劃策。王耀南後來還接替蘇慶黎擔任工黨秘書長。

後來由於工黨發展上的問題，蔡建仁、鄭村棋、吳永毅等人都分別直接下到基層去發展組織，開展工人運動。蔡建仁持續介入各種社運。夏林清和鄭村棋則成立勞教中心，積極訓練勞工運動骨幹，後來並開枝散葉，擴大到各種形態的勞動人民，包括性工作者、外勞、身心障礙者以及其他社會運動組織。

他們回到台灣之後最先密集接觸的莫過青年學生，遂積極在學生進步社團中散布左翼理念。因此當1990年3月野百合學運起來時，鄭村棋與夏鑄九兩人還被學生推舉進到五人教授顧問團，而蔡建仁則是當時學運重要力量

「民學聯」的思想啟蒙者。

王介安在解嚴前的 1985 年就回到台灣來，先是到處在學生中組織讀書會 與電影放映會，帶動了一批追求進步的知識青年，後又陸續參與「綠色小組」 的成立、《南方》雜誌的創刊以及工黨的籌建。工黨失敗後，他轉而投身影像工作，卻在 1992 年英年早逝。

解放理念中的一個核心議題「性解放」也在何春蕤、卡維波、王蘋、丁乃 非等人的奮鬥下開展了有別於主流婦運的性 / 別人權運動，二十多年來他們 屢屢迎戰性別議題上的各種保守反動勢力。

當然這些出身知識分子的海外歸來左派更不忘發行刊物。蔡建仁、夏 鑄九、鄭村棋等人在解嚴後就與進步知識分子陳忠信、傅大為、錢永祥等人 合作，參與主導進步學術刊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在 1988 年的創刊。卡維 波、陳光興、舒詩偉與吳永毅等人接著積極參與到另類批判刊物《島嶼邊緣》

在 1991 年的出版。蔡建仁也曾帶領一批青年學生辦過一份社運刊物《實踐筆記》。而《台社》能夠發行二十多年，吸收了當年以洛杉磯為集結點的諸多留學生，並屢屢提出扣緊時局演變的議題，成為台灣進步學術界與社運界的重要旗幟，也是這批人共同努力的成果。

心繫台灣多年的許登源與陳妙惠夫婦此後經常回到台灣。許登源除了在政治大學客座講授資本論外，還成立了「台灣《資本論》研究會」，對六〇、七〇年代後出生的新世代傳授左翼理論，直到去世（2009 年 3 月 31 日）。他在走前一年多曾將回台後的著作、演講與教材集結成書，出版了《現代辯證法》一書，<sup>10</sup>並將此書獻給已經過世的老戰友，書頁印著「以最深沉的感謝與熱情，這本書獻給蒙韶，他是我走上這條路的同志」。

底特律的金寶瑜除了持續地參與全球左翼運動外，也在一九九〇年代開始積極支援菲律賓的人民解放運動（Bayan, the New Patriotic Alliance of the Philippines），並且經常回到台灣教授左翼經濟學課程，栽培後進；而原來藏身洛杉磯的顏朝明則不時回來宣揚直接民主理念。

林孝信回到台灣後，除了戮力推廣保釣運動的精神及其延續之外，也投身社區教育工作，曾長期擔任「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常務理事，可說是持續他將左翼理論普及化的一貫精神。2003 年的二次保釣運動與 2011 年的保釣運動四十周年紀念活動，都在他積極推動下展開。他的夫人陳美霞是公衛專家，回台後於 2000 年在成功大學成立了公共衛生研究所，並在 2003 年 SARS 風暴中推動「公共衛生教育在社大」，後於 2007 年成立「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致力於透過社區大學將公衛教育推廣到社會基層。電腦專業的劉沅在解嚴後回到台灣貢獻所學，退休後也加入保釣精神的社會推廣工作，積極參與 2011 年開始的保釣四十周年活動。在七〇年代受到保釣運動影響的還有很多專業科研工作者，他們在解嚴前後也有不少人回到台灣來加入各個科研機構，提升各個領域的研究水平。

葉芸芸經常回到台灣來繼續整理出版她多年來收集的台灣歷史資料，對左翼傳承在日據世代與民國世代間的斷裂進行彌縫，包括蘇新在內的因二二八與白色恐怖而成為流亡者的口述史，以及她父親葉榮鐘先生的著作全集，包括很

重要的、他親身參與其中的《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

11 王耀南 在解嚴前後回台從事工運。倪慧如和鄒寧遠夫婦在海外花了十數年的功夫到處收集資料，完成《橄欖桂冠的召喚》一書，<sup>12</sup> 在台灣出版，介紹上個世紀三〇年代志願到西班牙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的中國人，為他們可歌可泣的故事留下歷史見證。《台灣與世界》的其他參與者，也都繼續投身各種社會運動，例如朱立創在紐約從事社區工作。

解嚴前就回到台灣的夏鑄九和他的同儕與學生一起，顛覆了原來台灣的都市規畫研究，使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成為引領城鄉區域改造的重鎮。他們也經常是台灣各種社會運動的前鋒，尤其在有關空間權利的議題上。

在北美華人學圈自成一格、極具六〇年代風範的成露茜（1939-2010），於一九九〇年代回到台灣，克紹箕裘，接掌《立報》，並開辦《破報》與《四方報》。她還在世新大學創立了強調理論與實踐並重，在台灣的學院體制內獨具特色的「社會發展研究所」。

陳光興回台後開創了台灣的文化研究領域，並奮力展開亞洲論述與運動連結，以突破台灣學界的歐美中心意識，還進一步建立了亞洲各國進步學術社群的實質聯繫，以此基礎發行很受國際進步學界重視的 InterAsia 英文學術刊物。在這過程，他還接續在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成立「亞太 / 文化研究室」，帶動了一批新生代。

丘延亮先到香港做人類學論文田野後，回台工作不成而留在那裡，一邊教書一邊參與當地社運。數年前他終於回到台灣學界，並熱切支持原住民與弱勢團體運動。舒詩偉先在新竹北埔蹲點，長期進行社區工作；近年來主持青芽兒永續教學中心，致力為台灣的三農問題尋找可持續性的另類出路。紀欣先是從事婦運，創辦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後又投身中國統一聯盟，擔任主席。井迎瑞回台後擔任台灣電影資料館館長，搜集搶救了將近 200 部的台語老片，後又到台南藝術大學長期推動音像紀錄的研究學程。瞿宛文致力於脫離主流經濟學的束縛，而從第三世界落後國家的角度出發，來探討東亞的經濟發展。在八〇年代留學美國期間不曾與前述團體掛上鉤的趙剛，卻是直接與正在辦《人間》雜誌的陳映真建立關係，而在回台之後也迅速參與

到海內外這些人的相關志業。這些都是其中較為顯著者，其他還有英年早逝的吳正桓以及很多人也都不忘初衷，在各自的不同領域堅持另類道路的追尋。

以上海外台灣左派回台後的各種奮鬥，限於筆者認識，闕漏在所難免。其是非成敗皆是難以一時定論，而必有其長期歷史意義，確有待於各個領域的參與者來進一步詳細反思與前瞻了。

2012 月 6 月 5 日定稿

本文得以完成，必須感謝王義雄、金寶瑜、林孝信、紀欣、陳妙惠、陳雪梨、葉芸芸、劉大任、劉沅、羅小如及其他多位參與者提供很多寶貴資訊。

1 鈞 / 統運資料編輯委員會編 (2001)《春雷聲聲：保釣運動三十周年文獻選輯》，台北：人間，第 3 章、第 3 節、第 2 篇〈四一〇全美中國同胞華府示威記要〉，頁 351-356。

2 於梨華（1966）《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台北：皇冠；  
於梨華（1972）《會場現形記》，台北：志文。

3 本章所用各國留美學生統計資料來自：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c., Open Doors

(online),

<http://www.iie.org/en/Research-and-Publications/Open-Doors>。

鄭鴻生（2007）〈台灣的文藝復興年代〉，《思想》第 4 期，  
台北：聯經。

5 劉大任於 2011 年 9 月新竹清華大學「東亞脈絡下的釣  
魚台：保釣精神的繼承與轉化」研討會時告訴筆者。

6 海外保釣運動的起源請參閱：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12-03/1713215789>

35\_4.shtml，以及釣／統運資料編輯委員會（2001）《春

雷聲聲：《保釣運動三十周年文獻選輯》，台北：人間。台灣保釣運動請參閱：洪三雄（1993）《烽火杜鵑城：七〇年代台大學生運動紀實》，自立晚報；與鄭鴻生（2001）《青春之歌：追憶一九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聯經。

7 台大保釣運動與哲學系事件請參閱：鄭鴻生（2001）《青春之歌》，台北：聯經。

8 林盛中（2009年元月28日）〈與《告台灣同胞書》共成長〉，《人民日報》。

9 「刻鋼版」是以鋼筆尖的筆在表面塗蠟的紙——稱為「蠟紙」——上刻寫圖文，然後在「油印機」上將油墨透過蠟紙印到紙面上。這是在電腦打字、影印機複製出現前，最便宜、最普及的印刷方式。

10 何青（2007）《現代辯證法：〈資本論〉新說》，台北：台灣資本論研究會。

11 葉榮鐘（2000）《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下兩冊），台北：晨星。

12 倪慧如、鄒寧遠（2001）《橄欖桂冠的召喚：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中國人 1936-1939》，台北：人間。

郑鸿生，台湾台南人，自由作家。1970年进入台湾大学。在台大就学期间曾介入台大学生保钓运动、民主抗争与民族主义论战。1973年台湾大学哲学系毕业，同年10月服兵役分发至绿岛，退伍后赴美国留学，改读电脑专业获电脑硕士学位，并在电脑网络公司工作。1988年回台湾，进入资策会，多年在台湾电脑业工作。1996年与妻游学澳大利亚悉尼一年，而后从事写作。

王智明：一九九〇年代後的釣運 \*——兩岸保釣的交流與合流

一般咸認，1971年4月10日的華府大遊行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高峰，在那之後釣運就逐漸消沉，進而分裂

為統一運動、革新保台與台灣獨立等不同政治勢力與家國想像。在 1971 年秋天的安娜堡國是會議上，左右分裂大勢抵定後，即令還有部分留美學生在 1974 年推動保釣運動，海外的保釣大潮的確已成「昨日之怒」，釣魚台問題也在中日雙方同意擱置爭議後而沉寂下來。然而，釣運並沒有就此消聲匿跡。保衛釣魚台的實質目標雖未達成，卻也不算失敗。中台日三方政府後續在釣魚台問題上堅持主權與實質擱置的作法，使得釣魚台持續成為中台日民族主義的施力點，並最終在 1990 年以來一連串的事件中形成更大且更直接的衝擊，其意義與影響有待探索。因此，本文嘗試整理與分析一九九〇年代以降的保釣運動：一方面描述釣運與釣魚台問題在兩岸三地的具體狀況；另一方面試圖對三地不同的反應與作法提出解釋與分析。最後，面對今年（2011 年）3 月東日本大地震與南海主權爭議浮現的新情勢，本文嘗試從一個「批判區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而非民族主義的觀點——來思考保釣運動的意義與未來。

---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新竹清華大學亞太 / 文化研究室

於 2011 年 9 月 17 至 18 日所舉辦的「東亞脈絡下的釣魚台：保釣精神的繼承與轉化」研討會。筆者感謝與會學者與朋友的回應與建議。

#### 四一〇大遊行之後：從海外到本土

在保釣運動的論述裡，華府的四一〇大遊行是一個圖騰。它標誌著留學生愛國情緒的沸點，上承五四愛國保土的思維與記憶，旁接六八學運去殖民、反帝國的激情，也印刻著左右分裂的傷痕和民族主義的虛無。它是學生力量（student power）的展現，但也具現了理想主義未竟其功的困頓與挫折。林孝信就曾寫道：「四一〇的華府遊行聲勢浩大，約有 2,500 名的留美學人走上街頭，然而遊行沒有獲得正面回應，反而造成了失望與彷徨。因此，大家開始思考保釣不成的原因，也繼續探索延續保釣運動及其精神的其他可能。」<sup>1</sup> 正是在這樣的探究中，留學生回溯由帝國主義與國共對抗所形成的中國現代史，因而理解了釣魚台主權爭議的背後有著複雜糾結的國際政治圖謀與冷戰結構制約，從而衍生了「支持國府、革新保台」與「支持中共、推動統一」的路線之爭，以及大概可以稱為「民

主台灣、社會啟蒙」的第三條路線。<sup>2</sup> 換句話說，四一〇華府遊行後的分裂其實意味著不同政治傾向的保釣實踐；路線與方法雖然不同，甚至互相對立，但目標都是為了確保釣魚台主權歸屬

「中國」。也因此，在這個過程中，釣魚台問題漸漸淡出了留學生的視野。如何介入太平洋兩岸中港台三地的社會實踐，成為受過釣運洗禮的海外知識分子最重要的關懷。

比方說，支持國府、革新保台的右派學生組成了「全美中國同學反共愛國聯盟」（簡稱「愛盟」）。部分愛盟學生，例如邵玉銘和趙林，畢業後回到台灣創辦了學術刊物《人與社會》雙月刊，<sup>3</sup> 並陸續進入國民黨政府裡做事。<sup>4</sup> 透過國民黨的「劉少康」辦公室，愛盟成員郁慕明、趙守博等人參與反統戰與反台獨的工作；解嚴之後，面對逐漸本土化的國民黨，愛盟成員更於1990年籌組政團「新連線」參與選舉，甚至在對抗黨內主流勢力失敗後離開國民黨，自組「新黨」，成為一九九〇年代台灣的一股政治勢力，對抗以李登輝和民進黨為代表的本土化力量。<sup>5</sup> 深藍背景與大中國情結使得新黨的政治人物（如郁慕明、李慶華、金介壽等人）更願意關心釣魚台問題；他們也因而成為

1990 年 後台灣釣運重要的組織者與支持者。相對而言，支持中共、推動統運的留美 左傾分子往往名列黑名單，回不去台灣，所以大多留在美國或轉往香港和大陸發展，他們的社會實踐因而比較多元：例如劉大任、郭松棻等保釣健將，除了持續創作在香港和台灣發表，還進入聯合國擔任編譯工作，為中共重回 國際社會做出貢獻。少部分人轉進美國政界（如成功當選參議員的吳仙標）和 商界（如在紐約華埠經商的程明怡），成為中美交流的重要橋樑。更多人立足 華埠與學界，從事學術、社區與文化工作——開書店、辦刊物、搞廣播—— 在民間推動統一運動與中美交流，並為華裔爭取權利、維繫華人認同而努力。<sup>6</sup> 另有少部分的人，如林盛中與吳國楨，乾脆回到中國，投身祖國的建

設大業。<sup>7</sup> 1977 年鄧小平復出，確立「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後，越來越多的留美學人回到中國或是從事各項扶助中國民間的活動：例如，喬龍慶與呂克 群夫婦在美國發起了「認助中國鄉村教育專案」的活動；楊貴林、董敘霖夫婦 成立「滋根基金會」，投入財力與人力，在中國偏遠地區扶貧助學；另外還有

1995 年成立的「樹華基金會」，也在推動教育相關的

資助和培訓工作。8

抱持第三條路線的保釣人士，如林孝信，在留居美國期間，除了在 1974 年在芝加哥發起保沙運動，以延續釣運火苗之外，還參與成立了「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在海外為台灣的民主運動盡心盡力。不論是營救陳明忠、聲援施明德、余登發、許信良等人，還是編輯《鄉訊》和《民主台灣》等刊物，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儘管有黑名單與白色恐怖的阻隔與箝制，釣運的隔洋應和，雖然短暫，卻在台灣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它不僅連繫著《新希望》、

《大學雜誌》與《科學月刊》等重要刊物，引爆了台大的民族主義座談會和台大哲學系事件，最重要的是，以《夏潮》為核心的思想與文化活動，鼓舞了一代青年關懷社會、書寫鄉土的精神，為解嚴前的台灣延續一縷左翼傳承。9 彼時的黨外運動亦在海外的精神與財務支援下快速崛起，成為突破戒嚴體制的宏濤。誠如楊祖珺所言，在一九七〇年代和一九八〇年代的台灣，看似隔絕在海外的保釣其實是以「動詞樣態」存在台灣的；10 它滲透在民主與民族的想像裡，也糾纏在左右統獨的拉扯之中。在香港，釣運的影響同樣深遠：香港學聯 1971 年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

「保衛釣魚台七七大示威」，不僅留下了火紅年代的重要記憶、創造了《七十年代》、《抖擻》與《盤古》等重要的保釣陣地，更延續了在地社運「反殖民、反貪汙、要民主」的左翼傳承，成為香港社

會運動的重要里程碑。《盤古》的編輯古兆申就說，「保釣運動引發了很多香港社會運動」；劇作家侯萬雲也表示，七〇年代香港保釣其實「給我們一個契機，藉來動員打擊殖民地政府，成為一股最強的凝聚力」。11

以上所述都是四一〇華府遊行後重要的保釣實踐。在內戰分裂與冷戰分斷的雙重結構制約下，保釣運動雖然停滯，但是這些海外知識分子，不分左右，依然以實際行動回饋與影響家國。他們或許有著不同的政治立場，但是對於民族的想像與期待卻是相對統一的。儘管這些社會實踐的屬性不同，他們依然是在愛國主義的道路上前進。因此，儘管一九九〇年代以後「兩岸分治、一邊一國」的政治現實不變，老保釣們依然堅持保釣的立場，期待釣魚台主權終將在兩岸的交流與合作中獲得確保。然而，一九九〇年代以降的國際政治情勢以及兩岸三地的內部變化，卻為保釣運動的發展中埋下不確定的因子。

## 兩岸共同保釣的浮現

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兩岸三地的華人社會開始發生劇烈變化：改革開放的路線大幅提振了中國的經濟，即使是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一場腥風血雨也沒有停下中國發展的腳步。經濟發展與港澳回歸反而提升了中國大國崛起的信心與企圖，並在2008年的北京奧運中達到高潮。1987年解嚴後，台灣迎來了「本土化運動」，全面進入藍綠對抗的時代，在省籍與統獨爭議中進行尚無止休的內耗。同時，香港在1982年的「中英聯合聲明」中被宣告回歸的命運後，開始面對九七焦慮。這使得香港民眾必須迫切思考本土認同與民族主義的意義。這些不同的發展使得香港民眾對於釣魚台問題有著不同於台灣與大陸的敏感與情緒，也架構了一九九〇年代以降保釣運動的兩波高潮。1990年10月18日，日本交流協會

聲明台灣人前往釣魚台需要申請簽證。此舉很快引發港台民眾的不滿。三天後，香港 16 個民主派團體代表 30 多人聚集在銅鑼灣示威；同一天，載有台灣區運聖火的漁船駛往釣魚台申張主權，遭到日艦驅趕而折回。這個事件雖然沒有造成太大的衝突，卻引發台灣媒體的關切，並觸發港人於 10 月 28 日發動更大規模的集會遊行，12 為新一波的釣魚台爭議與保釣運動揭開序幕。同時，中國政府也開始思考釣魚台與海洋主權的問題，並在 1992 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領海法》，將釣魚台列嶼列入中國領海範圍。此舉當然觸動了日本的敏感神經；當時的日本首相在出席眾議院院會時特意聲明釣魚台為日本領土。這可算是中日雙方在 1972 年周恩來表示擱置釣魚台主權後的第一次交手，也預示了中國在海洋主權上將採取更積極主動的態度。

1996 年 7 月日本的右翼團體青年社，在釣魚台列嶼的北小島上設置了一座太陽能燈塔。同時，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與外相陸續宣稱釣魚台為日本領土，並據此劃定 200 海里的專屬經濟海域，同時揚言將驅逐進入釣魚台海域的台灣漁船。日本此舉引起台灣漁民的反彈。8 月初台日召開半官方會議，初步達成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釣魚台

的共識，總統李登輝更表示台灣漁民不該到釣魚台示威，以免引起衝突。李登輝此言引發港台民眾激烈的反應，而有了後來登島拆塔的提議。9月起，中國公民上書國家主席江澤民，要求派兵前往釣魚台，捍衛領土完整；大陸高校學生開始醞釀反日示威；香港市民亦舉行遊行，表達反對日本侵占釣魚台的決心。中國民間保衛釣魚台聯合會順勢在北京成立，召集人童增呼籲軍方採取強硬措施，並規畫在9月

18日於北京舉行反日遊行。雖然北京的反日遊行因公安局阻擾而無法舉行，但是香港保釣團體舉辦的「九一五保釣大遊行」和「九一八保釣燭光晚會」分別吸引了近六千名民眾參加，可謂盛大。1971年就參與保釣運動的陳毓祥更

趁機成立全球華人保釣大聯盟，擔任召集人，租用船隻準備登島。在台灣，愛盟、新黨與新同盟會成員共同組成「中華民國保釣聯盟」，發動簽名連署與遊行抗議，表達誓死保衛釣魚台的決心。在美國的華人公民團體民聯陣自民黨的主席徐邦泰更主張兩岸政府應採取「聯合軍演」，以彰顯共同護土的決心。13 9月22日，全球華人保釣

大聯盟租用遠洋貨輪「保釣號」從香港出發前往釣魚台，隔日在離岸 70 公尺處被日艦截停。9 月 26 日再次出發，於抵岸前同樣遭到日艦包圍；保釣人士於是決定游泳登岸以張主權，但是陳毓祥卻在這過程中不幸溺水身亡，成為為保釣而犧牲的第一人。陳毓祥之死，港人為之震動。三天後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的燭光追悼晚會吸引了五萬多香港市民的參與，在靜默祝禱中掀起 1990 年後釣運的第一波高潮。10 月 7 日，港台保釣人士再度出海，成功搶灘登上釣魚台，並在島上揮舞青天白日旗和五星紅旗。釣魚台上兩岸國旗一同飄揚，雖然造成不少尷尬與爭議，14 卻成為釣運史上的經典畫面，也暗示著保釣人士對兩岸政府聯手保釣的期待。15

1996 年登島成功後，港台保釣人士不斷有登島宣示主權的計畫，但是兩岸政府對保釣出海的行動有了更為謹慎的管理與限制，以避免對日關係惡化。釣島海域因而平靜了一段時間。然而，甫才卸任總統的李登輝，在 2002 年接受《沖繩時報》訪談時，卻表示「釣魚台屬於日本」。這段談話迅速引爆爭議。林孝信發起二百多名老保釣連署譴責李登輝的說法，並串聯全球保釣人士籌組「全球保衛釣魚台聯盟」。這也迫使接任總統的陳水扁，必須重申釣魚

台是中華民國領土的基本立場。然而，這些口角風波只是突顯了台灣內部藍綠對抗的基本格局，並沒有擴大釣運影響力的效果。不過，老保釣們卻在這些爭議中再次體會到「政府不可依恃，保釣仍須繼續」的道理，並在兩岸新情勢底下重新思考釣運的策略與作法。

釣運的第二波高潮發生在 2004 年起的幾次衝突中：首先 2004 年 3 月 24 日，七名中國民間保釣志願者無預警地登上釣魚台，旋即遭到日本警方的拘捕與盤查。中國外交部立刻介入交涉，要求日本政府無條件釋放中國公民。隔年 4 月，為了反對日本修改教科書與申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中國民間掀起大規模的反日示威遊行；在北京，約一萬名學生及民眾走上街頭，高喊「中日斷交」、「拒用日貨」，更焚燒日本國旗、向日本大使館及日僑住宅丟擲石塊和水瓶。同年 6 月，台灣漁民屢屢在釣魚台海面遭到日艦驅離，使得漁獲大受影響。漁民在忍無可忍的情緒下，決定自力救濟，準備集結漁船包圍日本海巡艦艇。此舉引起台灣朝野高調關注，新當選的總統馬英九更以抗日的姿態，發出「不惜一戰」的豪語，進而有了立法院長王金平搭軍艦出海護漁的場景。2005 年初，日本防衛廳推出「西南島嶼有事」的對策方針，針對中日兩國有領土爭議的釣

魚島、沖繩本島及以西的其他島嶼，表示要堅決徹底地打擊「侵犯」島嶼的外國軍隊。接著日本政府又宣布日本右翼團體在釣魚島上設立的燈塔，將交由海上防衛隊接管與維修。2月25日，香港、北京、江蘇、湖南、廣州、北美紐約、台灣等地的保釣團體，於上午11時同步前往當地日本領事館，抗議日本政府接管釣魚島上的燈塔。兩個月後，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主辦「四一七反日入常」大遊行，有近萬人參與；中國內地亦有十個城市舉行反日示威，深圳規模最大多達十萬人，示威者數度與公安推撞，造成交通癱瘓。瀋陽有萬人上街示威，試圖包圍日本的駐領館；廈門則有6,000人參加反日遊行；廣州、東莞、珠海、南寧、成都、長沙及寧波都有集會遊行。一時之間，反日情緒高漲，加深了保釣的力道。2008年6月10日，日本軍艦在釣魚台海域撞沉台灣漁船聯合號更是引發爭議；台灣朝野異口同聲要求政府強硬表態，以保衛釣魚台主權與漁民權益。同年10月，「中華保釣協會」在內政部立案登記正式成立，由前東吳大學校長劉源俊擔任理事長，前永和市民代表黃錫麟出任秘書長，常務理事則有林孝信、胡卜凱等老保釣。中華保釣協會的出現象徵著一九七〇年代的保釣運動正式回到台灣。中華保釣協會一方面在台灣推

動保釣論壇與紀念活動，以期活化釣運，賦予新生，另一方面它也積極地與港澳、北美和大陸保釣團體的聯繫，朝向兩岸聯合行動的方向推進釣運。16 2010年9月釣魚台風雲再起。日本巡邏艦追撞中國籍漁船；日本海上保安廳以「涉嫌妨礙執行公務」為由，逮捕船長詹其雄，造成中日關係一度緊張。經過多日折衝，日方最終釋放了船長，也讓近二十多年來的保釣爭議暫時劃下休止符。

這二十年來，保釣議題的再度激化，其實有著幾個重要的背景值得觀察。首先，港澳回歸形成了中國崛起的態勢，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勃興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回歸迫使港澳居民必須在中國民族主義的框架重新認知自身的本土認同，而以理想主義形式被保存下來的保釣運動，便成為港澳居民「重做中國人」，表述主體性的重要資源與切入點。香港學者司徒薇就指出，一九七〇年代在香港，保釣運動具有反帝國反殖民的色彩，這使得保釣運動能夠取得道德與意識形態的正當性，而成為英國統治時期香港市民社會與文化身分得以發展的重要資源。<sup>17</sup> 同時，面對回歸的召喚，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不僅提供港澳民眾發聲的講台，更成為他們迎拒回歸的舞台，讓他們在後殖民的疑懼中主動取得中國人的合法身分，進而重新定義民族主

義的內容。日裔作家新井一二三對 1996 年香港的保釣運動有如下的觀察：「九六年的香港 保釣，明顯是『九七』的前奏曲。香港人下意識地把注意力從『九七』轉移到 保釣去，下意識地發洩了政治上的不滿情緒。同時，他們也下意識地得罪了 祖國媽媽，分開生活長達一百五十年的母子，重新團聚談何容易」。18 因此，

陳毓祥的溺水辭世雖然是意外所致，卻很快地上升到為保釣、為民族犧牲的道德高度。原來反帝國反殖民的左翼保釣開始有了右傾的味道。19

另一方面，港澳回歸連接著大國崛起的思維與論述，使得中國政府不能只在經濟發展上努力，而要對民族主義所想像「國體」(nation-body) 完整 做出努力。這就使得中國不得不在海洋主權上採取更強硬的姿態，因為這不僅關涉中國東海與南海資源的探勘與開採，還牽涉到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以及中國在東亞地緣政治裡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在釣魚台問題上，中國政府 沒有太多退縮的空間。一九九〇年代中國政府在釣魚台問題上還表現得小心翼翼，不願招惹爭端。但是在 2000 年以降的幾次爭議裡，中國政府及媒體 都展現了大國主義的思維：釣魚台不再是

中日兩國的問題，而是整個東亞與 南海石油政治及大國角力的一部分，是中國邁向盛世、和平崛起必須解決的 問題。比方說，中國《南方報網》在 2009 年就在好幾則釣魚台問題的報導中 指出：日本之所以敢無視中國人民與政府的感受，掀起釣魚台主權爭議， 主要是因為中國「一直採取息事寧人的忍讓政策」；中國可以借鑑韓國的作 法，「發起民間的抵制行為，更可以發起成立民間保釣組織，建立保釣專項 基金，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到釣魚島去宣示主權」（2009 年 2 月 10 日）。面對日 本增兵沖繩，乃至駐兵與那國島，《南方報網》除了指出日本此舉意在防止兩 岸聯手之外，更進一步質疑日本擁有琉球主權是否合法（2009 年 7 月 7 日）， 同時倡議兩岸進行軍事合作，建立「共同捍衛中華海疆主權合作機制」（2009 年 3 月 30 日）。《南方報網》的評論家熊劍甚至語出驚人：「琉球獨立，既屬歷史與國際正義，亦為解決東海之爭，收復釣島及兩岸統一之最佳及最合理方 案」以及「台灣，中國崛起之殤，琉球，中國強國之殤」（2009 年 2 月 24 日）。中國媒體的報導反映了大國崛起的心情，以及如何突破美日安保體制封鎖的 焦慮。因此，中國政府對釣魚台問題的表態直接衝撞了美國在東亞的利益以及東亞區域安全的機制，它也

將衝擊台灣的未來及其國族意識的發展。不過，正因為中國政府擔心過度高張的民族情緒，將造成社會的不穩定，並使得國際政治的操作更為棘手，港澳及大陸民間保釣的空間反而因此遭到壓縮。例如，在北京推動釣運的童增就曾在 1996 年被公安以「擾亂國家安定」為由帶走；而人稱「廈門班長」的李義強也在籌備 2009 年長沙保釣論壇時遭國保軟禁；又在後來廈門反 PX 化工場的「散步」時，被公安以「非法遊行、集會、示威」之名逮捕。於是，保釣在中國成為一個政治正確，卻無法付諸行動的民間主張，因為它雖然一方面服膺中國崛起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卻以民族主義的旗幟偷渡批評當局的立場。不過，雖然中國民間保釣的意識與力量不斷增長，發展民間保釣的空間卻十分有限；不僅保釣人士長期受到國保及公安的監控，保釣行動與反日示威啟動與否，亦往往受制於中國政府的政治需要與策略考量。<sup>20</sup> 這使得港澳及大陸保釣人士對於台灣寄予厚望。

在台灣，對釣魚台問題的理解大致可以分為「保釣」、「保漁」與「保台」幾個方面。由於釣魚台爭議直接衝擊的是台灣漁民在釣魚台海面捕魚的權利與安全，因此保護漁民與漁權是台灣朝野一致的共識。然而，如何保漁卻有

兩種截然不同的想像：在 2005 年軍艦護漁的爭議裡，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泛綠一方相信漁民的權益可以透過台日的漁權談判來確保，而不需要上升到主權爭議的高度；他們甚至認為日本對台灣漁船「不僅是在扣押與警告方面，遠較對其他國家寬鬆，甚至是執法手段，亦是在對所有國家中最为軟性的」。21 林濁水也說，台日漁業協定之所以談不成，不是因為政府立場太軟弱，而是因為「我國認為領土解決是漁場劃分的前提」，而使得談判困難重重。換言之，主權問題的僵持才是使得「保漁」缺乏成效的原因，而且這同時也給中國製造涉入台灣事務的機會，非但保釣無功，更恐有失台之禍。22 對泛綠人士而言，保釣人士「聯中抗日」的想法，「無異確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形同幫助中國偷渡對台主權的主張」。23 周奕成亦曾如此評論：「保釣、保漁、保台，正好就是三種不同層次的國家利益，只是優先順序應是顛倒的：保台（國家安全）優先於保漁（經濟利益），保漁（經濟利益）優先於保釣（國家尊嚴）」。

24 不過，雖然周奕成的優先順序是基於「維持和平、共創經濟利益」的務實考量，他仍然無法迴避釣魚台之於台灣主權意義的追問；也就是說，如果迴避了主權問題，台灣有什麼立場去和日本談合作開發，又有什麼立場去護漁和

保台？如果迴避主權問題，台灣又當如何因應日本在沖繩和與那國島的增兵行動？這些正是保釣人士不斷追問的問題以及堅持保釣的原因。換言之，「保釣、保漁、保台」的優先順序其實是由敵我意識的區分所決定的。對於泛綠而言，中國只可能是敵人，不會是朋友，但是保釣運動的歷史經驗正好提供了一個完全相反的答案。這也是為什麼在台灣，釣魚台問題的討論與中國崛起的大勢已經無法脫鉤，並且曝露了台灣「親日附美」的小國主體性，而成為藍綠統獨爭議的一部分。在一定意義上，今天保釣運動要爭取的其實

不只是釣魚台的主權歸屬，而是一個中國民族意識重新在台灣扎根、全面反思台灣國際地緣戰略位置的機會。在這個意義上，兩岸共同保釣的想法其實有著特定的歷史軌跡。從一九七〇年代在「漢賊不兩立」情感結構下開展的統運，就是將「反抗美帝、兩岸統一」作為保釣的方法與前提。然而，歷經改革開放、解嚴與兩岸交流，釣運內部的左右對立，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事實上已經不再那麼尖銳了。改革開放帶來中國崛起的大勢，對應著台灣本土化運動而形成的藍綠分裂，使得老保釣們更願意放下左右意識形態的爭執，共謀釣島主權的民族宿願。這也是龔忠武、

王曉波、林盛中等人在《春雷聲聲》一系列的釣運文獻選輯中所表 達的看法。龔忠武就說，釣運統運刊物「集中傳達或反映了大和解的訊息： 國際的大和解、兩岸的大和解以及中國人的大和解」。25 這個說法或許與當 時的感受有所偏離，但是從後見之明觀之，釣運確實有超克兩岸分斷的潛能 與意義。因此，1996 年成功登島、揮舞兩岸國旗的那一刻，其意義不是重新 取回釣魚台，而是象徵性地克服了內戰以來的國共分裂，投射了兩岸和解的 願景。只是，這個中華民族主義的勝利是一時的，它既不能保住釣魚台，也 無法面對中國內部的民主問題以及台灣民族主體性的呼求。儘管兩岸政府不 斷重申，在釣魚台問題上沒有合作的企圖與空間，兩岸共同保釣的呼籲仍然 不絕於縷，出兵保土的要求越發激烈。26 這也是為什麼到了 2000 年以後，驅 動釣運的主導論述與情緒其實是反日與抗美，核心關切是石油資源與海洋戰略，而不是啟蒙與愛國。27 換句話說，過去 20 年的發展是：釣運的重心慢慢地從海外轉向本土、從港澳移向兩岸；它從一個民間自發自主的社會運動， 逐漸地演變為兩岸政治與國際政治角力的一個場域，從而依附在國家戰略與 民族主義的思維裡，而失去了社會運動原有的批判立場。如果保釣的核心宗 旨依然圍繞著在現實政

治上無法輕易解開的主權議題打轉，而忽略了釣魚台 三個字在社會裡的現實意義時，它的努力就很容易透過反日抗美的情緒被吸納至右翼民族主義的思維裡，轉變為鷹派和統派。這樣的結果只會造成台灣 內部政治與民族情緒的激化，以及增加東亞區域安全的風險。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必要走出右翼民族主義的迴圈，重新思考保釣的在地意義與區域 意義，並重新探問：究竟為何保釣？為誰保釣？保釣的主體又是誰？適逢保釣四十周年，在回顧與展望之際，這是我們不能迴避的問題。

### 保釣四十年：批判在地主義與東亞對話

過去兩年（2010 至 2011 年），保釣團體在兩岸和北美分別舉辦了一系列的四十周年紀念活動。「台灣同學會」在江西南昌於 2010 年 8 月舉辦了「保釣、統運四十周年」紀念大會，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隨後舉辦「釣、統運文獻展」。28 同年 12 月，北美華人社團亦在紐約法拉盛舉行了兩天的紀念活動。台灣，

在林孝信等老保釣的帶領下，則在 2011 年規畫了五場保釣系列活動，分別是在 4 月 9 至 10 日在台北世新大學登場的「理想還在召喚」四十周年紀念大會；5 月 7 日假台灣師範大學舉辦的「青年與社會改造：保釣、五四、學生運動」論壇；9 月 2 日在政治大學召開的「第三屆釣魚台列嶼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9 月 17 至 18 日在新竹清華大學舉行的「東亞脈絡下的釣魚台：保釣精神的繼承與轉化」國際研討會；以及 12 月 18 日在台灣大學舉辦的「東亞視野中的保釣運動」研討會。這些活動林林總總，性質與方向不盡相同，尤其是在台灣的五場系列活動，除了紀念，更有重新定位保釣的企圖，以及與當代台灣社會對話的期待。對於為什麼要籌辦保釣四十周年紀念大會，林孝信就有如下的表述：「為什麼保釣運動的社會改造理想不能在台灣產生深遠影響？台灣社會的改造面臨哪些困難？台灣社會的理想何在？台灣社會需要何種動力驅動我們走向未來？如何將保釣運動的理念、力量和當前台灣社會運動結合起來？」。29 的確，在世新、師大和台大三場由林孝信主導的活動裡，可以清楚看見老保釣對於召喚理想主義、傳承保釣香火期盼殷切。他們希望保釣不只是一場海外知識分子的政治洗禮，更可以是一份推動

台灣前進的思想遺產。他們相信保釣依然可以發揮啟蒙的效果，提振台灣青年日漸薄弱的社會關懷。

然而，儘管活動進行得轟轟烈烈，保釣的召喚並沒有吸引太多年輕朋友的參與，它與社運的對話也看不出太多的交集。似乎歷史已走得太遠，保釣前輩的理想與當代青年的掙扎和關懷無法接軌，他們的民族主義立場與當前台灣的國族處境又多所扞格。對年輕一輩來說，「保釣」兩字像是一段神奇而遙遠的歷史，是父祖輩的青春夢；他們尊重也在乎，卻無法感同身受。他們可以領會理想主義的重要，卻看不到保釣運動在台灣的前景。反而是東亞脈絡的提出似乎可以打開一條新的思路，可是四十年來對領土主權的堅持，又使得老保釣們難以離開民族主義的框架和情感，從不同觀點來理解釣魚台的當代意義，他們因而也難以明白當代青年對釣魚台的陌生與漠然。

《破報》記者劉美好在〈理想召喚了什麼？：保釣四十與當代台灣對話〉這篇報導裡就對這些世代差異進行反思。處在時空氛圍完全不同於四十年前的當下並帶著新世代獨特的在地感性，劉美好不諱言指出，「回到當年的時代脈絡，愛國的這個『國』毫無疑問的指稱『中國』。四十年後

本土化認同已經占了至少半數人口比例，因而當我聽見老保釣人以非常絕對的中國人認同強調其「統派政治態度時，就因自己的台灣人認同而直覺產生不可避免的違和感——而這或許也正是台灣多數年輕人不可能進入保釣論述、進而關心保釣運動之「因」。她認為，過去二十年台灣社會的變化，「現實上已經無法由簡單無爭議的『我們都是中國人』的認同概念出發」；釣運要能重新走進台灣社會，與不同的社運勢力對話與連結，有待於老保釣們放下「占有」（島嶼）與「召喚」

（後輩）的父權姿態，重新認識與回應當代台灣的社會環境與問題。劉美好指出，象徵性的占領反而是對土地的不尊重，而「回歸人類看待土地的態度本身，是這四十年歲月中長出的另一種回溯，回溯到更古早的歷史之前，省思人與自然的關係」。30 換句話說，如何從土地與環境的觀點重新思考保釣的目的與意義，對於劉美好來說，是比完成民族主義保釣宿願更重要的事。作為八〇後的台灣熱血青年，劉美好的觀察是有代表性的，也很能夠反映保釣今天在台灣的處境。因為已經牢固的本土認同，使得台灣的八〇後青年沒有條件分享老保釣的歷史意識，也無法進入釣運的民族主義敘事。對他們來說，更關鍵與迫切的問

題是資本主義與開發思維對於土地、農業與傳統生活方式的破壞；更需要滋養的是一種批判區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的胸懷——一種為了環境正義、尋求共生，而願意放棄民族本位優先性的思維<sup>31</sup>——因為父權的民族主義往往是土地的敵人而不是朋友。在這個意義上，保釣的民族主義召喚是蒼白而無力的。它必須走出民族主義的神話，放棄釣魚台的資源與開發論述，才有可能與當代台灣重新接軌。同時，它也必須面對自身賴以維繫的民族主義與大國想像，以批判的姿態，面對崛起的中國，並介入中國內部的論述生產中，不論是釣魚台、南海爭議，還是民主自由。所以，重

訪保釣的意義不在於繼續保釣，而在於重新理解保釣的意義以及活化批判的精神，以介入當下。誠如老保釣錢永祥在保釣四十周年大會上所說的：「我們有沒有可能在這兩天紀念完以後，不要再回顧，而開始針對華人世界的民主正義問題好好談一談？那麼老保釣就沒有白活了。」

32

綜觀過去二十年的保釣風雲，我們不難發覺釣運的發展慢慢偏離左翼的思維，並且越來越受到地緣政治論述的

制約。當原先樸素的愛國精神被灌輸到中美對峙的新冷戰意識裡，釣魚台自然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毫無退讓的空間。如此一來，釣魚台只會像韓日之間的獨島和日俄之間的北方四島一樣，成為東亞區域安全的火藥庫，成為維繫美日安保體制、東亞新冷戰僵局的緊箍咒。若是如此，保釣的結果只怕是戰爭而非和平、保釣的主體是政權而非人民。我們究竟是為了釣魚台海底的資源而保釣？還是為了一償強國宿願而保釣？擁有釣魚台究竟是為了將它開發成另一個破壞生態的渡假小島，還是建造成一座生人勿近的海上碉堡？這樣的釣魚台對於生活在周邊的人民又有什麼意義？

事實上，姑且不論大陸層礁架的延伸如何證明釣魚台的主權歸屬，釣魚台海域長久以來確實是周邊漁民（包括沖繩和台灣）的生活範圍。對他們來說，大海沒有疆界，魚群也不會遇到國界而轉彎。作為一個經濟生活領域而言，釣魚台是跨越疆界的；作為太平洋生態的一部分，它沒有，也不必擁有，一個國家的身分。日本學者淺井基文也指出，「釣魚台問題是 20 世紀傳統權力政治思考下的產物」。他認為，不管是現在還是未來，釣魚台的爭議都無法用民族主義的方法來解決。相反的，當我們展望未來人類走向時，

「不該跟隨不合時宜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概念隨波逐流，而應以 21 世紀未來人類歷史的方向為基礎來解決『領土問題』，甚至應該去思考如何讓領土問題消失才是」。<sup>33</sup> 歸屬與疆域本是人為的想像，不是自然的狀態。今年（2011 年）3 月東日本大地震的啟示之一就是生態的破壞以及災難的影響是超越國界的；沒有誰可以阻擋核輻射塵的擴散，也沒有人能夠避免地震的發生。如果我們不能防止天然災難，那麼我們至少應該避免人造禍害。在一定意義上，釣魚台爭議最切實的效果在於避免了釣魚台海域的大規模開發，從而維繫了一塊相對富庶的天然漁場，由周邊漁民所分享。或許保釣的終極意義不在於對於釣魚台列嶼的主權占有，而在於保護釣魚台及其海域不受開發、剝削與污染。在海洋主權爭議不斷、天然災禍頻發的今天，也許只有從要求和平、環保以及去國族觀點出發的保釣運動才能真正的保住釣魚台，也才能夠打破民族主義的魔咒，穩健地走向一個互敬互重、對話合作的東亞。

## 注釋：

1, 見林孝儀 2010《保釣歷史的淵源跟對海峽兩岸的社會的意義》收於謝小苓、劉容生、王智明主編 2010《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頁 28-29。

2, 釣的第三條路線是林孝儀的提法。他說「持這條路線的人，基本上也是高度批評台灣政府，但是他們強調關心台灣，支持台灣內部追求正義的鬥爭。他們認為，即使追求中國的統一，也應該基於台灣人民的利益與認同為基礎，真正的統一運動應該以台灣內部人民的要求為主」(同前引，頁 32) 對於保釣學生的派別之分，邵玉銘另有「五派」之說：「留在美國派」、「回歸大陸派」、「革新保台派」、「台獨派」和「港澳派」見邵玉銘回憶錄 尚未出版。

3 《人與社會》於 1973 年創刊，1981 年改為季刊。1982 年出版革新號，但出版兩年即告停刊。

4 愛盟學生回台加入國民黨政府的人不少：如邵玉銘、魏鏞、張京育、郁慕明等人都是其中翹楚。不過，根據任孝琦的調查，自 1972 年以來，返國服務的愛盟成員，有近半數進入學術界或相關研究機構服務，實際從政的是少數，只占返國人數的一成左右。見任孝琦 1997《有愛無悔：保釣風雲與愛盟故事》台北：風雲時代，頁 224-225。

5 關於愛盟的故事，見任孝琦 同前引 頁 178-223。

6 雖然統一運動的發展一直謠傳有中共的指導，但是海外統運向來屬於民間團體。然而 1988 年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簡稱中國統促會 CCPPR 成立後，便將海外的統運團體收編旗下，而使得今日的統運多了一層官方色彩。

7 雖然在保釣高潮時有意願回到中國的留學生不少，但是到 1976 年文革結束前，只有少數海外學人獲准回大陸定居。見林盛中 2010《中國大陸的台灣同學會》收於謝小苓、劉容生、王智明主編 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 頁 241。

8 關於認助中國鄉村教育專案「滋根和樹華基金會」見收於謝小苓、劉容生、王智明主編《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裡的喬龍慶、楊貴平和李黎所著的文章。

9 關於這段歷史，可參考鄭鴻生 2001《青春之歌》台北：聯經；與郭紀舫 1999《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海峽學術。

10 見楊祖珺 2010《回見未來的希望：保衛釣魚台運動之後的活力扣連》收於謝小苓、劉容生、王智明主編 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 頁 216。

11 見盧瑋鑾、熊志彙 2010《雙程路：古兆申訪談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154；朱一心(2010年10月17日)《憶火紅年代香港保釣》《亞洲週刊》第24卷41期，[http://www.yzkc.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s&Path=223096271/41as1a.cfm](http://www.yzkc.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s&Path=223096271/41as1a.cfm)。

12 10月28日的遊行計有12,000名市民參與，由維多利亞公園遊行至位在中環的日本領事館。11月11日，日皇登基前夕，亦有500人出席保釣晚會。

13 見《中國時報》，1996年9月9日，第4版。

14 《中國時報》就報導：多位民進黨議員認為保釣隊伍搶攻上釣魚台時，插上中共五星旗，是「要引清兵入關」。香港保釣聯盟只得發出嚴正聲明，表示「一切純屬『意外』」（1996年10月9日）。

15 中華保釣協會秘書長黃錫麟，在與筆者的一次訪談（2011年8月7日）指出，1996年是兩岸三地聯合保釣的起點；保釣人士不只互相串聯，也在各方面互相協助，進而促成了2003年兩岸三地保釣聯盟以及2011年世界華人保釣聯盟的成立。大陸與香港民間提供資金，台灣與海外則在規畫與協調上進行努力。老保釣透過開會與出版，記錄與傳承保釣歷史與意識，新一代的保釣團體則提供體力與勞力出海保釣、進行衝撞，以維繫保釣議題的可見度。

16 2011年適逢保釣四十周年，港、澳、台、大陸與海外的保釣團體結合，成立世界華人保釣聯盟，由中華保釣協會的秘書長黃錫麟任會長。聯盟以香港為基地，把6月17日定為「中國民間保釣日」發動全球華人用各種抗議活動，宣示釣魚島主權。

17 Szeto, Mirana M. 司徒薇 (2009) “Analyzing Chinese Nationalism through the Protect Diaoyutai Movement”, *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35(2): 185.

18 新井一二三 1996年6月26日《保釣香港解讀》《中國時報》第19版「人間副刊」

19 見陳映真 1996年6月26日《我不會忘記悼念陳毓祥》《明報論壇》以及收錄在《保釣英雄陳毓祥祭奠堂紀念文選》中的其他文章，見<http://cyx.netor.com/>。不過，中國海外民運保釣後援會發在《北京之春》1996年11月《<http://beijingspring.com/bj2/1996/120/2003127175150.htm>》上的悼念文則充滿著對中共當局的批評。

20 感謝黃錫麟先生於訪談2011年8月7日中提供的訊息。

21 見姜皇泚 2005年6月11日《護漁先問四個問題》《自由電子報》<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jun/11/today-o1.htm>。

22 見林濁水 2005年6月21日《替老共爭釣魚台》《自由電子報》<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jun/21/today-o1.htm>。胡文輝 2005年6月24日《反日、脫美、入中藍 紅線！》自

由電子報》<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jun/24/today-f2.htm>。有趣的是，泛綠人士對釣魚台問題的論述往往展現李登輝的思維，相信釣魚台不屬於台灣，因此更不屬於中國。例如，九〇八台灣國運動所發表的國土宣言就表示「依據舊金山和約，台灣國的領土包括日本放棄的台灣與澎湖，但不含釣魚台；台灣國的疆域的四個極點分別是：極北為彭佳嶼、極東為三貂角、極西為澎湖的花嶼、極南為鵝鑾鼻」見田世昊2005年7月16日《台灣國運動發表國土宣言》自由電子報》<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jul/16/today-p3.htm>「台灣國」不只放棄了釣魚台，也放棄了南沙、金門和馬祖。

23 見賴怡忠2008年6月14日《對美日同盟開戰？》自由電子報》<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jun/14/today-o5.htm>。

24 周奕成2008年6月23日《保釣、保魚、保台》中國時報》

25 龔忠武2010《釣運春雷傳遞的時代訊息：兩岸大和解》收於謝小琴、劉容生、王智明主編《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頁118。

26 1996年釣運再起的時候，時任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的焦仁和（原亦是愛盟成員）就曾表示「兄弟鬩牆，外禦其侮是釣魚台主權爭議的最佳寫照，並暗示兩岸不妨重開辜汪會談，將釣魚台列入議題之一」（《中國時報》1996年7月22日，第2版）不過，幾個月後，中共便表示不會與台灣當局聯手對抗日本的侵略行爲（《中國時報》1996年9月8日，第1版）時任外交部長的章孝嚴也表示，政府有能力處理釣魚台問題，並排除與大陸合作的可能（《中國時報》1996年9月10日，第4版）

27 這樣的狀況在2011年4月9至10日保釣四十周年大會上特別明顯。雖然會議主旨是理想還在召喚，想要創造台灣社運界與釣運的對話，可是幾位老保釣的發言一再強調海底的石油利益與反日情緒。這使得整個活動的調性與台灣社會的整體關懷顯得很有距離，使得對話的期待失落在召喚執著裡。

28 兩岸的清華大學圖書館分別從2004年和2007年起開始收集保釣歷史文獻。新竹清華大學在2009年所舉辦的「一九七〇年代保釣運動文獻之解讀與編印」國際論壇與文獻展覽，不僅召集左、中、右各派的保釣前輩齊聚一堂，笑泯恩仇，也促成了後來兩岸清華在保釣文獻收藏上的合作與互助，形成另類的兩岸聯合保釣。

29 林孝儀2011《大會緣起》理想還在召喚；保釣四十周年大會手冊》台北：保釣四十周年大會委備委員會，頁1。

30 劉美姸2011年4月15日《理想召喚了什麼？：保釣四十與當代台灣對話》破報復刊第656期，<http://www.pots.com.tw/node/7941>。

31 關於批判區域主義這個概念，可以參考 Wilson, Rob (2000) *Reimagining the American Pacifi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 125-162。不過，筆者更想強調的是：以環境正義與共同生活圈為基礎的區域或本土想像，並以此構築交流與協商的前題。

32 引自劉美姪 同註30》

33 淺井基文著、羅國應譯2011《尖閣群島釣魚島問題及日中關係》收於東亞脈絡下的釣魚台：保釣精神的繼承與轉化會議手冊，新竹：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頁136-137。

孫歌 新崎盛暉：半世紀以來沖繩思想史問題意識的轉折

編案

新崎盛暉先生是沖繩極為重要的思想者，他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回到沖繩，不僅研究、教學，後來也在建立起的沖繩大學擔任過兩任校長。他的專業是政治學，一直在從事沖繩戰後的研究，若要了解沖繩的現代史，他的研究是無法略過的。新崎先生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持續地從事政治評論，對於沖繩面臨的種種現實問題進行回應，所以到現在三十年下來，留下了很多寶貴的資源。同時，新崎先生也帶領了很多市民運動，對於反基地一連串的活動，一直都介入社會的真實過程當中。

2010年11月，新崎教授受邀為「思想、歷史與文化高等講座」，訪問台灣一週，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三場活動的第一場，11月24日在新竹交通大學以論壇形式進行。主辦單位請專攻日本現代思想研究的孫歌教授，根據她閱讀過新崎教授的著作來帶頭發問，希望能更了解新崎老師的思想背景。

這次活動是沖繩資深思想者在台灣直接交流的場合，是機會難得的歷史紀錄，在此與讀者分享。我們特別感謝許婷婷女士的現場翻譯，阮婷婷對稿子的翻譯整理，以及孫歌教授最後校訂的工作。

孫歌（以下簡稱孫）：首先，我想從一個不同的角度來引言，我來台灣之後一直有一個感覺，就是沖繩離台灣很近，但是對台灣人來說，美國和日本大概比沖繩還近，因為雖然地理位置上沖繩比較近，但是台灣社會並沒有給予沖繩相應的注意和關心，而中國方面的情況可能比台灣還要嚴重。所以我們共同面對的課題，就是我們是否應該了解沖繩？我們究竟如何了解沖繩？新崎老師是沖繩具代表性的知識分子和活動家，在他個人的著述中，影響最大的是《沖繩現代史》，當然他還有許多其他方面的著述。據我了解，這本《沖繩現代史》在日本出版時，是分為兩本書，中文譯本是將兩本結合成一本的形式來出版，<sup>1</sup>這兩本書在沖繩本土以及在日本本土引起非常大的迴響，其中一個迴響是，到目前為止半個世紀的沖繩歷史，是如此地複雜，沒人能說清楚，新崎老師將歷史相對地說清楚了。但是，

我們今天和新崎老師的對話，先不從這本書開始，也許我們更想得知的是個人的經驗、歷史與紀錄，所以我想先對新崎老師提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請他談談個人的歷史，因為新崎老師是出生在東京的沖繩人，很長的一段時期他無法回到沖繩，直到沖繩回歸日本後他才回到了沖繩本土，所以我想請教新崎老師在東京生活時的那段經歷與思想體驗，與返回沖繩之後的思想體驗，可否簡單地介紹給大家。

新崎盛暉（以下簡稱新崎）：銜接剛剛孫老師的話題，比起日本及美國，沖繩離台灣雖然比較近，但是卻常常被台灣忽略。以日本全國的總面積以及總人口數來看，沖繩只占了0.6%的面積以及約2%的人口數，是個小型的地域社會。而這樣的沖繩，與中國以及台灣的關聯性，三者之間的歷史，特別是戰後美國占領下，沖繩的窒礙難行，以及現在美軍基地所引起的各種問題等，都是我所書寫、關心的課題。我所寫的《沖繩現代史》，在今年（2010年）推出了中文版的譯本，2008年在韓國推出韓文版的譯本，希望韓國、中國，以及台灣的人們，可以藉由這本書來認識沖繩這個面積很小（只占了日本約莫百分之一的存在）的地方，並以歷史的主體來看這個地方生活的人類所扮演的歷史角色。如果讀者能夠從我的書中去窺得這些，我將會非常開心。以上，是我回答孫老師的問題前，想先告訴大家的引言。

接下來我就依照孫老師的提問來一一回答。我活了超過七十年了，若真的介紹起我的生命史的話，恐怕太耗時間也擔心會失焦，我就以連結沖繩現代史的方式簡單地介紹。我是1936年出生。我的父母都出生於沖繩，因為求學、就業以及結婚的因素，離開沖繩來到東京，所以我是出生於東京的沖繩人。1936年，是中日兩國關係一觸即發的緊張年代，1937年日本對中國展開侵略行為，以廬溝橋事件為開端，正式挑起了一連串的戰爭，我就誕生在中日戰爭爆發之際。在戰爭進行期間，我進入日本的國民小學就讀，在我小學三年級時日本戰敗了，所以關於戰前、戰後的生活經驗，僅是我孩提時代的一點點記憶。

首先，我說自己是沖繩人，不只是因為雙親是沖繩人的關係，小時候在家裡，尤其是母親常常會說沖繩話，所以我對於沖繩話，至少聽得懂。在孩提時代的記憶中，我去理髮的時候，很愛和人家聊天，在沖繩話裡頭，像是老鼠稱做 benki，貓叫做maya，類似這樣的話題，我很熱衷於解釋給別人聽。而我以前也完全不認為沖繩人和日本人有哪裡不同，單純地覺得沖繩人就是日本人，乖乖地接受當時的軍國主義、愛國主義的教育。

在戰爭時期，從學校老師那邊學習「鬼畜英美（kichikueibei）」這個單字，與其說「學習」，不如說是被「灌輸」這個觀念，「鬼畜英美」是形容連鬼和畜牲都會害怕美國和英國。所以，在印象中，日本戰敗時，對我來說最為衝擊的一件事是美國進駐日本的這件事。然而當初教導我們「鬼畜英美」的老師，在戰敗初期都變成張開雙手去歌頌美國民主主義的讚揚者。也因為目睹了戰後的這些轉變，造成我不相信老師、不相信教育那一套說法，促使我選擇走上政治這條路。而我和沖繩的相遇是在1952年，在我進入高中時候的事。

1952年4月，我進入東京都立高等學校就讀，在4月28日那天，聯合國與日本簽訂的《對日和平條約（舊金山合約）》開始生效。就在國際社會中獨立的同時，日本和美國也簽訂了《安保條約》，以美國要保護沒有軍事力量的日本這個藉口來締結日美安保條約，條約生效的日期是1952年的4月28日。在4月28日這天，校長也因為日本獨立的事情，將全校師生聚集在學校中庭，宣布4月28日是可喜可賀的日子，要大家舉起雙手高喊三次「萬歲」來慶祝。由於沖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最後地上戰」的戰場，日本和美國太平洋戰爭的最後決戰地點，從那之後美國就持續占領著沖繩，所以《對日和平條約》雖然讓日本獨立了，卻也決定了沖繩必須繼續接受美軍占領的命運。這不只是沖繩出生的人才知道的事，至少當時的國、高中生都知道《對日和平條約》的內容。校長要求全校師生高喊萬歲來慶祝日本的獨立，而且在那之後日本全國各地皆有「提燈列隊」的活動（日本在逢年過節，或是有慶祝事宜時，會舉辦提著燈籠列隊遊行的慶祝活動）。我當時在面對滿心歡喜高喊萬歲的校長，以及多數的師生時，感到了我和他們之間有座無可言喻的無形高牆。所謂的沖繩，到底對日本而言是什麼樣的存在？而對沖繩來說日本又是怎樣的存在？這樣的疑問浮現在我腦海，就是在這個時候，我開始意識到沖繩這個地方。

雖然我從小就被教育成軍國少年、愛國少年，但在面對這樣的事件之後，我心中不禁開始意識到問題，並對大眾化的民主主義概念產生了違和感。我高中時期參加辯論比賽（就在同年6月的辯論比賽），題目是「何謂日本獨立的真意與正途？」當時參賽的我提出：「沖繩群島明明還在美軍的手中，有什麼理由歡呼萬歲？」另外，在同一年的秋天，我在書店遇見了一本書，書名是《沖繩の悲劇：ひめゆりの塔を巡る人々の手記》（中譯為《沖繩的悲劇：姬百合之塔參訪者手記》，無中譯本），這本書記載了在戰爭期間，被日本軍動員的從軍看護婦，所遺留下來的一些手記。這些被動員去從軍的看護婦，當時都只是國、高中生而已，也大概就是我買下這本書的年紀——高中一年級，高我的我因為這本書得知了在戰爭中這群看護婦的經歷，然而與當時的我年紀差不多的看護婦們，卻已經目睹了戰局的殘酷。要繼續講的話，也許會花很多時間。在我高中一年級的時候，遇到了許多對我來說打擊很大的事件，也讓我從愛國少年轉變為和平主義者，並將思索「如何解決沖繩的問題」，作為我人生一輩子的功課。所以高中一年級這一年，對我來說是人生的重大轉捩點。而我第一次參與的沖繩社會運動，是在我高中一、二年級時，為了支援沖繩的孩童，那群孩童只能在沒有門窗，以稻草鋪蓋成屋頂的馬舍中學習，因為學校在戰爭時被戰火波及而燒毀，所以我為了這群沒有學校可以去的孩童推行了募款活動。美國在那時候也已經占領沖繩七、八年了，主要的目的就是「將沖繩納為軍事上的據點」，所以對於教育與福祉層面的問題，當然不看在眼裡。所以在那個時候，沖繩的老師、教職員們，發起了補建戰後被燒燬校舍的募款活動，在日本大力宣傳、推動這項活動，而我在新聞中接收到這項資訊，隨著這項募款活動被推動到日本各地，我也努力向自己學校的師生們積極鼓吹這項募款活動。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將沖繩作為我人生中的課題，不停地去思考如何解決沖繩的問題，而我自己能夠做到的又有哪些？在我絞盡腦汁後想到的辦法，便是利用「言論」這個利器，將沖繩的問題讓大家

知道，這應該是我能力範圍內的事。所以我在選擇大學時，決定系所的標準與思考畢業論文要寫什麼題目，都是以沖繩為主要的考量要素。因此，我的畢業論文題目是「日本復歸運動之研究」，副標是「為了要理解沖繩問題的步驟」，而為了收集論文的資料，我想盡辦法希望能回到沖繩。

我在戰後 1959 年，第一次回到沖繩，為了要收集大學畢業論文的資料而回去。因為我是從小在東京長大，為了去沖繩必須要去東京都廳辦理護照，而製作護照的過程非常地不簡單，必須要寫三封英文的書信，交由當時沖繩的美軍政府，得到沖繩美軍政府的認可之後，再帶著許可證明回到東京都廳完成護照手續。除此之外，在那個年代前往沖繩不能帶任何日本幣鈔入境，當時的沖繩還在美軍占領期間，所以是使用美金，而且當時的日本在國際間是屬於赤字的階段，所以在外國旅行，也不得將日本幣鈔帶出境。因為我在沖繩有很多親戚，所以我當時的解決辦法是，拜託我在沖繩的親戚作為我的保證人，確定可以擔保我生活的一切開銷，當時我申請的名義是拜訪親戚以及掃墓，才讓我得以回到沖繩這塊土地。回到沖繩後，除了有實際去掃墓、拜訪親戚之外，我的主要目的是去收集資料，範圍是從戰時到戰後的一些資料，並且也做了田野調查，四處去訪問了很多人，在沖繩停留大概四十天左右。然而，在這過程中，卻被美軍政府的公安部門找上門，說我在沖繩的行動與當初所告知的理由並不一致，所以必須接受審訊。

在我大學畢業之後，曾經考慮過回到沖繩的報社擔任新聞記者。因為我了解到，沒有在沖繩生活過，沒有辦法真正地理解沖繩的事物，所以我透過父親的介紹，到父親大學時代同學的新聞報社去上班。本來對方很歡迎我的前往，但後來他對我說：「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為當時就連一個普通的學生造訪沖繩，都會受到美軍的監視，更何況是像我這樣，打算從東京搬到沖繩，在沖繩找工作的情形，根本是完全不可能的。在那之後，我曾經好幾次回到沖繩，也都不停地遭受美軍的騷擾以及盤問。在那段時間，我曾經用筆名發表了好幾篇有關沖繩的報導文學。在後來，我找了一份可以支撐生活開銷的工作，但對於沖繩的問題我依舊還是持續地關心，也間接地有接觸一些在沖繩從事抵制運動的相關人士。一直到沖繩復歸日本之後，我才有機會在沖繩工作，是因為當時的種種原因下，我之前所屬的沖繩大學需要老師，於是我前往擔任教師一職。

若是沖繩沒有遭遇戰爭，沒有遭到美軍占領的話，我應該不會自覺到自己是沖繩人，也許就不會將沖繩的問題當作自己一輩子的課題，我的生活方式可能就是成為一個平凡的日本人，一輩子在東京生活。不過，正因為高中一年級時的一些事件，讓我從少年時代就決定要選擇這條思考沖繩問題的道路，而沒有選擇其他的生活方式。我從1974年開始在沖繩大學擔任教職，在這之前我有出版了幾本著作，以及完成了幾篇論文，並從日本的文部省（教育部）那兒取得大學教師的資格，所以我後來才會受邀到沖繩大學擔任老師。可是說實在的，我自己本身從來就不認為自己是研究者，也從來都不把沖繩的問題當作研究對象去關心，因為沖繩問題對我來說，一直都是「必須要解決」的課題，是以此為目標，才導致我之後走向類似研究者的道路，我並非純粹為了研究才研究。

那麼，對於我的生平經驗，我就簡單介紹到這邊，開始在沖繩生活之後，也開始從事一些活動，關於

這方面的經驗，我想就待會兒孫歌老師，或是在場的各位想要了解這方面的資訊時，我再針對問題與各位分享我的經驗。

孫：剛才新崎老師在介紹完他的生平之後，有提到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第一個是假如沖繩並沒有被美軍占領，如果日本政府不是以捨棄沖繩的方式來換取自己的獨立的話，那麼生活在東京的新崎先生不會意識到自己是沖繩人，也不會將沖繩問題當作是自己的使命，所以，也可以說是沖繩的歷史性悲劇，使得新崎先生沒有成為一個平凡、平庸的日本人，而是變成一個有強烈歷史責任感以及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示。

那麼，我就先從這第一個問題來請教新崎老師，從他表述的內容中，我感覺到一種「沖繩精神」，我幾次到沖繩去，看到沖繩人民那麼艱苦卻又堅決地向美軍基地對抗，但是在那個社會氛圍中，我感受不到台灣式的「悲情」，儘管我認為沖繩社會有足夠的理由可以悲情，事實上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悲情的存在，但是在沖繩社會，悲情並沒有成為一個主導性的氛圍，我感受到更多的，是沖繩民眾的力量和他們抗爭的決心。所以我想請教新崎老師的第一個問題是，他是如何去看待沖繩這樣的一個鬥爭狀態以及理念？關於他剛才談論到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沖繩不是他的研究對象，而是他要解決的問題，這個等他談完第一個問題之後我再繼續提問。

新崎：這是非常龐大的課題，我不知道能不能夠回答得好。我也不敢說在沖繩沒有像孫歌老師所說的那樣悲情角色的定位，沖繩的民眾的確從以前到現在不斷地在進行鬥爭，但並沒有像孫歌老師說的那樣美好。這六十五年來，經歷的挫折是數也數不清的，在沖繩的社會中也存在著分裂，在透過嘗試許多不同的管道下，有些東西也慢慢地成形。用抽象的言語來說明還不如舉例來解釋，也許會比較清楚。例如說戰後的沖繩為什麼這麼討厭日本呢？或許現在比較沒有這種感覺，但這是曾經存在過的情況。再舉一個例子，之前陳光興老師來沖繩的時候，有提到一個非常微妙的問題，就是「琉球處分」可以說是日本運用武力來強行統治琉球的一個手法，但是為什麼沖繩還會想復歸日本？而這與沖繩獨立運動是否相關聯？上次我沒有完整地回答好這個問題，我想在今天試著好好地再次回應這個問題。

在沖繩，除了「琉球處分」這個說法常常出現之外，還有「第二琉球處分」、「第三琉球處分」這樣的說法。這是表示沖繩長期依賴外部單方面介入的力量來定位自己，也就是沒有自己主張的意思。最初的「琉球處分」一詞，指的是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想盡辦法成為近代化國家，將本來獨立的琉球王國變成了「沖繩縣」；「第二琉球處分」指的是剛剛提過的，戰後《對日和平條約》的締結，讓沖繩被日本捨棄，轉交給美軍占領、統治；「第三琉球處分」則是說沖繩在復歸日本之後，並沒有實現創造一個沒有基地的和平沖繩島的訴求，反而依舊讓日美同盟將大部分的基地都移轉到沖繩，讓原本沖繩民眾對於日本的期望變成失望。以上就是關於「琉球處分」內容上的演變，我先從解釋這個名詞所代表的意義來開始接下來的話題。

針對最初的第一「琉球處分」，歷史上的評論大概可以分成兩派。一派是認為琉球處分具有解放琉球

農民困苦生活的意義在，讓農民免於承受琉球王國以及薩摩的雙重壓榨；第二派是認為琉球處分是日本侵略、併吞了沒有武力的琉球。整體來說，第二派的說法比第一派的說法來得少。而以侵略、併吞的視點來看，甲午戰爭中台灣被日本併吞，日本後來也併吞了韓國，沖繩也被定位成被日本併吞的角色。在戰後，日本戰敗沖繩隨即被美軍占領，讓沖繩免於再被日本的軍閥支配，被解放的沖繩期待美軍能夠協助其獨立，有少部分的人對此抱有希望；但同時，也有著希望沖繩能夠回歸有共同文化的日本，這樣的聲音在大家越來越明白美軍並不會帶來解放的事實之後，了解到沖繩是處於異民族統治的情況。於是，不想被異民族美國支配的沖繩，開始嚮往不是異民族的日本，也就有了復歸日本的聲浪。

另外，還有一個說法是指出，戰前的日本與戰後的日本是不一樣的，戰前的日本是軍國主義、具侵略性的帝國主義性格，戰後的日本則是遵照和平憲法、不好戰的，也具備民主主義與講求社會體制的性格。還有一種說法是，就在沖繩推動要復歸日本的過程中，戰後的日本透過日美同盟的締結，來達到經濟發展的目的。我剛剛也有提到在1959年我要回沖繩的時候，不可以將日本的幣鈔帶入沖繩，但到了1965年，美國開始介入越南的內戰，日本許多資本家趁這個時候開始了對外的經濟活動，讓日本的對外經濟收入大幅地成長。不過這個時期的美國全面參與越戰，讓在沖繩抵抗美軍的鬥爭越發激烈，美國也開始對基地的立場感到不安。沖繩復歸日本的聲浪有一個特色，那就是本來期待復歸日本的因素中，最緊急想要解決的問題是希望能脫離美軍的統治，回到日本的懷抱。

至於基地問題，因為日本本土也有基地問題要解決，所以沖繩的基地問題就等復歸日本後再一併解決也不遲。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在美軍統治下的沖繩，到處受限，不能隨意離開沖繩，否則會被懷疑是到外頭偷偷進行抵抗美軍的活動，類似這樣的情況，沖繩在備受限制的情況下，想盡快脫離美國的統治。

不好意思，我講得太忘我了，我再簡單地整理一次，關於復歸日本運動的性質，第一是希望能脫離異民族美軍的統治，重返具有共同文化的日本的懷抱；第二是希望回歸遵照和平憲法、具備民主主義與講求社會體制的戰後日本。總而言之，第一要務就是，復歸日本，早日脫離美軍統治，這是第一階段。至於美軍基地的問題，就留到第二階段，復歸日本之後再來解決。

關於基地的問題，在1965年美國介入越戰開始，沖繩美軍基地便充分地被使用，成為美軍前往越戰的出發點，從嘉手納基地派出B-12戰機轟炸越南，這個事實讓基地問題，變得無法留到第二階段再來解決。雖然說基地是被強迫接受的東西，不是沖繩自願的，但是沖繩基地提供了越戰的支援，這樣的事實是不容忽視的，所以原本的復歸日本聲浪，在一九六〇年代後期，轉變為「反戰復歸日本」的訴求。在打著「反戰復歸」口號的同時，戰後的日本似乎和想像中遵照和平憲法的日本不一樣，在越戰開打，靠著支援美國而變成經濟大國的日本，沖繩為了解放而去投靠這樣的日本是正確的道路嗎？有少數人開始察覺到這樣的疑惑，演變成「反復歸論」的聲音，主張沖繩就是沖繩。

民眾運動以及美軍基地的問題，對於沖繩的解放有怎樣的影響，是我一直以來不斷思索的事。沖繩的民眾運動不斷地變化進行，到目前為止遭受了許許多多的室礙與挑戰，而目前民眾運動中最注目的焦點是，再過幾天，這個月28日（2010年11月28日）星期日，是沖繩縣縣知事大選的投票日，我在來台灣前夕，已經完成了投票的手續。現在在沖繩有許多抹黑、流言，我希望沖繩不要被這樣巨大的權力所迷惑，別再像之前一樣上當受騙，期許沖繩能在未來繼續地勇敢前進。

陳光興（以下簡稱陳）：我稍微補充說明一下。在新崎老師的書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論述是，所謂的復歸日本，是為了讓美軍撤出沖繩，但其實在一九六〇年代後期就已經發現，就算復歸日本，基地問題一樣存在，果然在1972年沖繩復歸日本後，美軍基地依舊存在。所以，復歸日本的策略運用失敗，對很多人造成很大的打擊。這是新崎老師對於復歸運動動力的解釋架構。

而我的疑問是，在民眾當中，是否有些人其實只期盼復歸日本，並不期待可以解決基地問題。關於這點，我知道有許多知識分子曾提出許多尖銳的看法，他們認為這不只是牽扯到基地問題，也牽扯到自主性問題，並提出了各個層面的問題意識。而新崎老師曾經提出過的「小國主義」，由於我對此不是很懂，想請新崎老師解釋一下小國主義的脈絡。再更尖銳地問，就是小國主義與沖繩的獨立運動之間的關係會是怎樣？不只如此，新崎老師也提過另一個重要、至今也是十分堅持的觀念——「脫北入南」，也就是脫離北方進入南方，這個南北有兩個層次的意義，第一層是地理概念，另一層是提到第三世界時，南方在資本體系中處於劣勢的情況，新崎老師提供了新的觀點，想請教新崎老師當初在提出這些觀點時的時代背景。

新崎：這是個非常困難的議題，若是延續剛才的話題來說的話，沖繩的返還，是因為復歸日本的運動已經勢不可擋，為了脫離美軍的統治的一種手段。美國想藉由占領沖繩來影響日本的企圖，因為沖繩的返還而無法實現；而日本也因為日漸成為一個大國，對於原本是自己的人民與土地的沖繩，卻被同盟國的美國統治，這實在有損大國的面子，就是這樣多重因素下，沖繩復歸成了定局。不過，原本期待沖繩復歸的人民，並沒有實現移除基地的願望，直到現在，也留下了許多未解決的問題。

而就「脫北入南」來說，因為相較於日本，沖繩是屬於南方的世界，也算是屬於第三世界，但在復歸日本後期待能得到富裕生活的同時，卻也因此失去了南方的觀點。若是換個角度來想，比如說越南也是南方，以站在越南的角度去看美國和日本，這也是一種新視點。

另外，「小國主義」是針對全體日本的概念，並非指沖繩該建立自己的國家，用意是在對抗像美國、中國的大國時，若是日本和近鄰，像是韓國等一起合作的話，是不是也可以和大國相抗衡，而不須一味地想要成為大國。我先針對這兩個問題回答，關於獨立的問題，我接下來會說。

首先，從沖繩獨立運動來談，在沖繩雖然不能說沒有主張獨立運動的人，但是人數極為稀少，而這些人當中，多數都是帶有政治立場，比如說會去參加縣知事的選舉，如果一般來說可以當選的票數是三

十多萬票的話，獨立運動路線的候選人可能只得到1,000票左右。也就是說，不是說沒有，但實在是不成氣候，況且與日本政府的對立立場，一直以來都是居於劣勢。而日本政府在中沖繩復歸後的立場，一直都是站在重視日美同盟，允許基地繼續留在沖繩。沖繩的民眾並不贊成基地留在沖繩，但如果基地真的是必須存在的話，何不遷到日本本土去？不然就是乾脆都不要基地，不要將世界變成被軍事力量主導的方式，而是以和平的關係去維持，這也是我們一直以來的立場。站在其他立場的人，有人說如果誰是站在認同日美同盟的立場的話，那麼就把基地送給他吧，不要留在沖繩。

想當然爾，對於基地問題，日本本土的立場與沖繩的立場是對立的關係，這也衍伸出一種現象，有些人會在居酒屋喝了幾杯之後，開始談論起沖繩應該要獨立的事，我稱它為「居酒屋獨立論」的現象。在感性超越理性，一提到日本政府時的不悅感，讓腦子自然地想去抵抗，於是開始高喊獨立，不過這一切也只局限在居酒屋中。然而，沖繩真的有獨立運動的本錢，沖繩的國際地位會允許獨立運動嗎？可是像最近的釣魚台問題又浮上檯面，在這樣的情況下沖繩如果獨立的話，能夠確保、實現東亞的和平嗎？我們必須要去顧及這些假設性情況。我從來就沒有否定過獨立運動，不過我更傾向屬於日本領土範圍內，以建立好各地地方自治的路線來處理的主張，特別是像沖繩這樣有其獨特歷史、人文背景的地方，所以我目前並不贊成用獨立運動的方式來對應現況，我認為其潛在的風險實在太大。

請容我再深入一點討論。像目前的釣魚台問題中也可以發現的，「國家主權」問題，究竟「國家」是什麼呢？這個約莫一百多年來的制度代表著什麼？以琉球的歷史來看，曾經被薩摩支配過的琉球王國，也與中國的明清有冊封關係，這無法完全用近代的國家制度來解釋清楚。所以在釣魚台問題中，中國的媒體控訴日本在清朝時將琉球給奪去，否則的話琉球本來也是屬於中國的。我認為這是一種令人傷腦筋的說法。當地居民的意見，一直是我覺得更為重要的事，去聆聽沖繩當地居民想要的是什麼，而不是被日本任意擺布，或是被強行決定領土範圍，必須要由住在當地的人們來決定，這是我的主張。

在沖繩話當中，有uchinanchu的說法，代表著沖繩在地人，相對的，yamadonchu則表示日本本島的人，也就是沖繩以外的日本人，在言語上有這樣的分類，也可以看出認為沖繩是獨特存在的精神。然而，沖繩卻也無法完完全全地割斷日本，強調與日本不同，沖繩的自我認同一直以來都存在異樣的氛圍及背景。沿著歷史的軌跡去追尋，最初在沖繩的文字使用，是日本的「片假名書寫」，漢字、漢文是後來才傳進來的東西。因為沖繩話與日本權力中心的日本語，是完全不同的語言，所以被認為是日本的「方言」。

所以，就像剛剛前面提到的琉球處分，有人認為是解放沖繩困苦的人民，也有人認為沖繩是日本所謂的「侵略合併論」中的戰利品。我們無法一刀就切斷沖繩與日本的關聯，也該顧及兩者之間悠長的歷史，所以在自我認同上，沖繩似乎是屬於日本卻也不屬於日本，這樣讓人迷惘的灰色地帶一直存在，但我認為這樣的灰色地帶才是該重視的。像台灣、中國、菲律賓，或韓國等地方與日本的關係，每每牽扯到國家主權的問題，往往都無法引向好的交流與共識。也因此，跳脫國家主權的模式，沖繩的「屬於日本也不屬於日本」的關係，顯得格外重要。日本的前任首相——鳩山由紀夫首相，曾提倡「東亞共

同體」，不只是他，在之前也有很多人有提過，不過鳩山首相所指的應該是國於國之間的協力合作。而我們所嚮往的，是脫去國境線的方式，讓沖繩民眾與鄰近的地方在經濟上、文化上能達到有效交流，這才是更為和平的辦法。

現在，沖繩正在舉行的縣知事大選，其中一名參選人是表面上迎合沖繩民眾，但某種程度上對日本政府是配合的態度；另一位則是與日本政府對立，反對基地的存在，堅持要解決沖繩的問題。目前選舉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中，究竟誰會勝出？將會對沖繩帶來莫大的影響，也會對鄰近國家的台灣、中國、菲律賓、韓國等地方帶來波及。

#### 與會者提問

提問一：我想代表自己，向新崎老師以及在沖繩運動的人致敬，我曾經在2004年到過沖繩一趟，在那之前因為上陳光興老師的課，我們共同閱讀了某學術期刊對於沖繩的論述，我還記得內容是有關美軍基地的事，當時的我對沖繩的事還帶有距離感，可是當我真正到沖繩去的時候，親自前往基地，親眼看到鐵圍牆把基地圍起，而圍牆周圍有當地居民在獻花，那時候的感覺是和閱讀文章不同的，也是在那一年開始，沖繩進入到我的視野中。我覺得，當我們在思考亞洲的問題時，我們很容易和日本、韓國等湊在一起聯想，卻常常忽略了這之間的一些島，或是比較小的地域與台灣的关系。

2004年我到沖繩時，也剛好碰到一場縣議員的選舉，那時候有一位歌手——喜納昌吉，他參選縣議員，標語是「將所有的武器變成樂器，將所有的基地變成花園」，這完全提供了一個我對於選舉不同的想像，雖然沖繩是一個縣，但卻能將縣的選舉與反基地議題、反戰議題連結在一起。反觀台灣的選舉，一直都是強調國家、民族之間的意識，這對我來說是很不一樣的參照。

這幾個月我在閱讀《沖繩現代史》時，面臨到很多的障礙，因為新崎老師提供了我們很多的歷史事件以及歷史觀點，可是我覺得只閱讀沖繩是不夠的，閱讀者必須要更積極地去參與沖繩的現在，不只是到當地去旅遊，也不是藉由沖繩反省台灣而已，而是必須要以沖繩為出發點去行動及思考。只是藉沖繩來反看台灣的話，我覺得是利用了沖繩當地的運動，以及沖繩當地的複雜性。

提問二：新崎老師剛剛提到有一個必須要正視的事實是，沖繩既屬於日本又不屬於日本，這樣的一個事實。這讓我聯想到，從沖繩的民眾鬥爭，以及在日本五〇年代安保改定的問題、六〇年代激烈的學生運動，我想多了解的是，從五〇年代開始，在沖繩的鬥爭與在日本本土來自社會各種不同力量的抵抗，這之間是否有連結？這是我的一個疑問。另一個問題是，在看到七〇年代初期，沖繩的復歸以及中日國交正常化，這當中也牽扯到美國與越戰的問題，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也做了很大的調整，我們或許可以說六〇年代末期到七〇年代，是冷戰非常激烈的一個階段，讓日中、美中的關係產生非常大的轉變，所以我想問的是在這當中，沖繩和中國的關係，是否也扮演了一些角色？

新崎：我先從第一個提問來試著回應，在一開始我有提到一些我在高中的經驗，五〇年代的前半段，日本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去意識到沖繩，在這之後沖繩的反美軍基地的鬥爭，1956年以「全島鬥爭」的方式爆發，在日本也帶來了很大的迴響。只是在那個時候，日本的基地面積明顯地比沖繩的基地面積來得大，在日本也有「反美、反基地鬥爭」，所以在得知沖繩的「全島鬥爭」時，日本的反應多是「啊！原來沖繩也有這樣的問題」這樣而已。

一九五〇年代，日本與美國的關係尚處於不安定的階段，為了讓這樣的不安定得到改善，日美在一九六〇年代修訂了安保條約，其內容影響至今，其中一條就是日本佯裝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基地移轉到沖繩去。現在也許可以常從媒體聽聞海軍隊、普天間基地等的事，其中的海軍隊，是在五〇年代後期到六〇年代初期來到沖繩的，在這之前都是在日本，因為要去幫忙朝鮮戰爭。1952年到1960年在我念高中那段時間，日本的基地少了3/4，而沖繩的基地卻多了兩倍，在這個時期，不管是沖繩或是日本，都是基地問題的受害者。在這之後，雖然沖繩的問題越來越獲得日本本土的重視，但卻一直都沒有得到解決的方式。在這之後就是復歸運動延伸成反戰運動等的轉變。以上是我針對第一個提問的回應。

一九六〇年代，在沖繩還沒復歸日本以前，沖繩、日本、中國、美國之間是很明顯的敵對關係。1969年11月美國的尼克森總統與日本的佐藤首相舉辦了「尼克森會談」，簽訂了1972年沖繩復歸日本，以及許多附加條件的共同宣言。中國大力地撻伐沖繩復歸日本共同宣言，指出日本軍國主義將會因沖繩復歸而復活。接著，就如同大家所知，1970年、1971年、1972年美中、日美的關係大幅改善，其原因是當時的國際政治情勢下，美國利用中國與蘇聯的對立關係，藉機拉攏中國站在自己這邊，改變與中國的關係。

另一個原因是，與美國面臨越戰不知該如何是好的關係。日本眼看著美國和中國走向和解的道路，便也急著想改善和中國的關係。佐藤首相決定讓沖繩復歸日本，下一任的田中角榮首相則是促成日中建交，這也削弱了中國批判沖繩復歸日本的聲浪。對日本來說，或者該說對日本本土來說，基地漸漸地從日本本土中消失，在沖繩復歸之後，基地更是大為減少，基地都集中到沖繩那兒去了，這也導致日後沖繩和日本政府的對立，而相對地，在日本本土的反基地、反美運動逐漸消聲；日中建交也因此削弱了中國反對日美同盟的力量。如此一來，安保條約、基地問題，到了一九七〇年代、一九八〇年代，成了沖繩必須獨自面對的問題，這個階段是對沖繩的鬥爭而言，最為黑暗、最為艱辛的一段。

而在這之後的一個轉折是，東西冷戰的結束。本來是日美同盟共同敵人的蘇聯解體，似乎也意味著不再需要基地，於是，撤除基地的運動又再次興起。為了平撫這樣的聲浪所端出的說辭是，亞洲尚處於不安定的狀態，北朝鮮下一步會怎麼做誰也不曉得，菲律賓等的國家也有可能發生伊斯蘭教的動亂，中國變成經濟大國的同時，軍事力量也必定會增強，所以依然是需要日美同盟的締結。於是，又再次地重新修訂日美安保條約，日美同盟從保護日本的角色轉變為保護太平洋地區安全的裝置，日本將全力擔任協助美國的角色，以這種形式給了日美同盟能繼續維持下去的理由。對於這樣的結果，沖繩當

地還是有認為不需要基地的想法。

1995年發生的美軍強暴少女的事件是一個重大的轉機，更加強了要求基地整理 / 撤離的勢力，而日本與美國對此情形感到困擾下，再搬出將基地縮小 / 移轉到普天間的對策，但將基地移轉並不能解決基地問題，至今在沖繩仍然有反對基地移轉普天間的運動在進行著。在 1995 年的另一個契機是，與韓國民眾運動的結盟，因為得知在韓國也有著一樣的基地問題，韓國因為有國家保安法這條法律，使得民眾運動難以推行，這更促使了沖繩與韓國的合作，到現在為止，沖韓的交流仍舊持續進行中。以上是我對第二個提問的回應與說明。

提問三：我對於新崎老師提出的國與國的和平關係非常地關切，可是日本小國跟沖繩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自治區是兩件不同的事情，關鍵是在於自理、自治沖繩地區的政府的構成為何？新崎老師提到的，沖繩既屬於日本又不屬於日本這個處境，的確是一個歷史構成的關鍵，對於日本的文化認同與國籍認同，是沖繩的一個難題，而沖繩的政府又是由親日本政府的勢力構成的話，便可以配合日本政府將日本不要的基地放到沖繩去。

我比較關心的是，新崎老師剛剛提到的選舉，新崎老師擔心的是哪一邊獲勝或獲敗呢？若這次的選舉又是由親日本政府的那方獲勝的話，將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呢？會改變教育政策嗎？或是改變一些基本的立法？像是制定國安法來壓制沖繩的民眾運動。還有，想請問一下，沖繩目前有代表性的團體有能力去推行自治教育等等類似這樣活動的團體嗎？簡而言之，作為一個沖繩的自治體，需要由國家來架構嗎？沖繩的地方的團體怎樣去對抗日本國由上而下的管理呢？

新崎：那麼，我就先從選舉的事開始講起。剛剛有提問說，如果是親日本政府派的人當選的話會如何？其實，不管是哪一邊，都沒有完全親日本的候選人，他們的差別是在於對日美安保條約的態度不同。其中一位候選人是肯定日美安保條約能夠維護東亞的安全，只是即便如此，沖繩還是不需要基地，所以希望日本政府將基地帶回日本，不要再留在沖繩，就連普天間的基地移設，也不需要。可是這位候選人原本的主張是接受普天間基地移設的方案，只是他另外提出了很多的附加條件。

但是隨著政權的遞移，沖繩縣內的輿論也吵得沸沸揚揚，若是這位候選人還喊著可以接受普天間基地移設的話，他肯定不會當選，所以他必須要轉換方針。假如這個候選人當選的話，基地就一定會留在沖繩了嗎？我能說，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民眾運動與輿論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所以就算是他當選了，也不可能一夕之間就能夠改變基地問題。然而，日本的右派以及日本本土想盡辦法將基地留在沖繩的目的，是因為釣魚台問題。

中國現在都宣稱擁有釣魚台的領土權，不准石垣島的島民去進行漁獲作業，先是派漁船來追趕，下一次是觀測船，再下次可能就是派出軍艦了，類似這樣的宣傳不停地在媒體上強調，日本本土相信這一套說法的人非常多，但是在沖繩，大部分的人並不這麼認為，因為沖繩一直都以為中國的態度不會這

般強硬，雖然說在這次的釣魚台事件，沖繩人有被中國的作法給嚇到，但這還是不影響沖繩人認為中國不會因此而攻打過來的看法。

我在這邊想要介紹一段小插曲，在東京有「沖繩縣人會」，這個組織專門聚集來自沖繩的朋友，這個組織的會長是比我還年長十歲的阿伯，這個人有赴美留學的經驗，老婆是美國人，以前是在沖繩工作，現在搬到東京了，目前擔任沖繩縣人會的會長。在沖繩縣人會的會報中，有寫著這麼一段關於釣魚台問題的散文，他說他看到了一篇報導，寫著沖繩沒有基地的話會被中國奪去，但似乎忘了沖繩早就已經被美國給奪去的事實了。

從這裡可以知道，這位會長在美軍統治期間，也算是菁英階級，我想他寫的這篇散文，可以看出大多數沖繩人所抱持的共通想法，在無法改變沖繩現狀的窘境下，還一直拿中國出來當理由，是不會讓沖繩變更好的。

那麼，回到介紹候選人的部分，剛剛介紹了一位比較起來傾向於偏日本政府的候選人，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另一位，目前擔任宜野灣市長的候選人。這位候選人的主張是，應該要廢除現有的日美安保條約，另外締結新的條約，也主張要廢除沖繩基地，反對日本政府派遣自衛隊到沖繩的小島，像是離台灣很近的與那國島。這位候選人是琉球大學畢業，擔任過勞工工會幹部，從政的經歷是先當過縣議員，現在是當市長，目前在參選縣知事，他的主張自始至終從未改變過。講白一點，我和他是好夥伴，如果這位候選人當選的話，想必能為沖繩帶來新氣象，期待他能改變日本以及美國對待沖繩的方式。對我而言，反而是中國會怎麼看待這樣的沖繩？才是我比較好奇的地方。超脫國家的範疇，以地方為主，比如說地方知事，這樣的帶領方式，說不定反而能發揮個人的外交能力，得到民眾支持，以這樣的方式，說不定可以漸漸地改善沖繩的現狀。「東亞共同體」當中的成員，都是以「國家」的形式去參與這個組織，像日本、韓國、中國等等，這樣的形式固然不是壞事，但也有其限度在，我認為真正的共同體的形式是跨越國境，靠民眾攜手聯合起來的組織。現在的沖繩，正面臨著這樣的選擇題，沖繩接下來的選擇將會對東亞和平做出貢獻，這一點是我深信著的。

提問四：聽完新崎老師的演講才發現原來沖繩經歷過那麼多不同國家的支配，比如說明清的時候它與中國的冊封關係，又受到日本薩摩的騷擾，到近代又受到美國的侵略。直到近代以來，沖繩的自主意識開始萌發，也開始興起民眾自主的鬥爭運動。這樣的歷史讓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台灣，台灣在歷史上也遭受許多國家的統治，近來也萌發本土的自主意識，開始追求自己的主權。將沖繩和台灣做比較的話，在面對自己主權的訴求，其背後面對的困境有何不同呢？第二個問題是，在整個東亞各國的關係都十分微妙、複雜的情況下，我想請問老師，沖繩在面對這樣微妙、複雜的大國關係中，應該要採取怎樣的姿態來面對這樣的大局？

新崎：台灣與沖繩的確有相似處，台灣是在甲午戰爭被割讓給日本，沖繩是在太平洋戰爭後被美軍占領，雖然時間點不同，但是都是在遭受不同的支配體制下，孕育出屬於自己的擺脫方式，追求獨立自

主權，這一點在沖繩可看見，在台灣更是蓬勃地發展。而沖繩和台灣該走怎樣的路，我認為是要由兩邊的當地居民來自己作主，我剛剛提到了很多關於沖繩的事，而台灣方面的獨立運動，也有自己特殊的情況要面對，該由台灣人民來作主。然而，雖然獨立的權利是一定有的，但在考慮獨立的時候，還要先注意到的一點是，要冷靜地去思考國際情勢，以及去回想歷史背景，再來考慮獨立問題。這一點，不管是沖繩或台灣，都應該要注意的。民眾當然有獨立的權利，但是將「獨立權」擺在第一位，卻破壞周遭情勢的和平，這樣不是好的作法。我的建議是，伸張自己的權利時，必須要慎重地考量到這一點，再來下決定。然後，我認為跨越國家框架，不去考慮自己所屬哪個國家的視點，是之後的時代趨勢，這是透過沖繩可以發現的事實。關於台灣方面的情況，我閱讀的資料不多，之後還必須多多努力去了解，雖然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那個餘力去從事。（笑）總之，沖繩和台灣，都是在大國間努力尋找自己的出路，選擇與大國不同的作法去創造屬於自己的和平，我相信這是有可能實現的。

提問五：我還沒有機會閱讀老師的《沖繩現代史》，但是去年2009年，日本的諾貝爾獎得主大江健三郎，有來台訪問，隨著他來台灣訪問，有翻譯他的兩本作品，其中一本是1969年寫的《沖繩札記》，他在書中反覆地去追問，到底怎樣才是日本人？能否成為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

因為在日本本土，基本上是賤視沖繩人民的，大江健三郎是由知識分子的角度去不斷反省這樣的情形，因為他覺得自己和日本本土的人是共犯關係。所以，身為文學家，他親自到沖繩去反省這個問題。他發現了沖繩在1945年集體自決的歷史，這是當時在日本本土不可能被介紹的事件，他在書中揭露出這段歷史之後，反而在日本成了右派控訴的對象，這段官司似乎還在持續進行中，目前好像是大江健三郎勝訴。我想問的是，四十年前日本賤視沖繩的一個狀態，在四十年後有沒有轉變？像大江健三郎這樣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在日本境內有沒有形成一股強大的聲音，讓日本人去反省對沖繩的態度呢？

新崎：大江健三郎的書，至今依舊是常常被人討論，在日本本島的進步知識界，想必是引起了廣大的迴響。只是，大江健三郎的書在沖繩，引起另一種看法，就是認為書中所描繪的沖繩，是大江健三郎在自己心中所製造出的沖繩。所以，從日本本土看沖繩，與沖繩看自己，這之間存在著微妙的差異。而從歷史角度來看，1956年時，日本關心沖繩的議題，是因為在日本本土也有基地問題，在那之後，日本有一段時間其實不太關心沖繩的事務；直到到了沖繩復歸日本的前後，才又興起新的一波關心，但這份關心也沒有持續很久；在1995年左右，日本本土才又再次地重新注意到沖繩的問題。

現在在日本本土，關於沖繩的輿論，實在是四分五裂，一直以來都站在沖繩這邊反對基地問題的，只有少數人；盡可能避開這種麻煩又困難的問題不去正視，認為不會干涉到自己的利益就好的人，占大多數。在報紙上也會出現，批評為什麼要因為沖繩的感情用事，破壞了日美的友好關係的文章。

從1995年之後，本來對沖繩都不太抱持關心的人，也都一口氣地跳出來討論沖繩問題，但是關於沖繩的輿論，是處於眾說紛紜的狀態。像這次選舉，我想，贊成讓維持現狀的候選人當選，應該是大多數

人的看法，只有少部分的人是站在沖繩運動這邊，並直接參與的，雖然說這些站在沖繩立場的人，都努力地努力讓沖繩的聲音給更多人聽到，但以目前的情形看來，一時之間要改變現狀是有點困難的。在這樣的情況下，釣魚台的問題充分地利用，在日本輿論中帶來很大的影響，可是在沖繩中並沒有造成太多的迴響。不過，我相信大江健三郎的書，對改善沖繩人被日本人賤視的情形，是有加分效果的。

提問六：我有一些感想與一個問題。感想的部份是，台灣與沖繩很相似的這一點，前幾天我有看一部紀錄片，叫做《在海上靜坐：沖繩 邊野古 反基地600日鬥爭》（《海にすわる：沖繩 辺野古 反基地600日の闘い》），內容主要是抗議普天間的基地移設問題，我看到紀錄片時第一個想到的是，沖繩漁民長得和台灣漁民很相像，這和我腦海中看過的日本人形象有落差，所以在剛看到時有嚇到。我的問題是跟紀錄片有關，我發現出現在紀錄片中的進行抗爭運動的人，主要是中老年人，大部分都是男性，或者是老年的女性，我在看的時候就想說，那日本的年輕人呢？雖然在後來影片中有拍到年輕人去現場支援，但是沖繩當地的年輕人似乎很少。對社會運動來說，新血的加入才可能讓運動能持續下去，所以我想請問的是沖繩年輕人扮演的角色為何？謝謝。

提問七：我的問題和前面的提問相關，就是《在海上靜坐：沖繩 邊野古 反基地600日鬥爭》裡頭出現的中老年人，常常會將「為了我們的下一代有更好的未來??」這樣的話掛在嘴邊，我想請問新崎老師的是，是不是沖繩的民眾運動中有一些世代交接的問題存在？

新崎：關於世代間的鴻溝，我認為確實是有問題的。有直接經歷過殘酷戰爭的人，或是曾經被美軍統治過的人，這群曾經直接體驗過的世代，與完全沒經歷過，相較而言生活較為富裕的世代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鴻溝。這在台灣也有類似的情形嗎？這不只是沖繩的情況，日本整體上都有出現這樣的狀況。另外就是，《在海上靜坐》這部紀錄片，為什麼比較常出現中老年人？那是因為年輕人必須要為生活打拚，所以能夠出現在紀錄片中的老年人，多半是靠國民年金生活的長者。在沖繩，常常可以得到站在反基地移設的老年人，也有老人著作散文讚揚「老人 POWER」。

孫：今天聽新崎老師的演講，覺得非常地受教育，而且有幾點問題相當觸動我。第一點是，沖繩的社會、民眾現在是站在歷史的交叉路口上，其處境是其他國家的人無法想像的，他們所面臨的局面比起我們要面對的嚴峻得多，這是第一點。而且在這種嚴峻的狀況下，非常遺憾的是我們這些外部的民眾，不管想如何協助、連結卻也難以跨越障礙。

比如說像剛才新崎先生談到的，大江健三郎的《沖繩札記》，他肯定這本書所帶來的正面效果，但是在沖繩人的眼中看到的，是大江自己創造的沖繩；換句話說，大江對於沖繩社會而言，雖然他喚起了日本社會的良知，但他仍然是個外部的存在。於是，我們可能面對的問題，就非常複雜。

剛剛有人提到我們不可只將沖繩作為媒介，應該要站在沖繩的立場上，我當然也感到共鳴，但是，事實上我們首先要做的，似乎不是這件事。首先我們應該要做的是，在充分地尊重沖繩民眾鬥爭的前提下，找到我們自己在本土的鬥爭方式中改變的可能性。比如說，剛剛新崎老師反覆強調的一個說法，就是沖繩人很少會強調獨立，雖然有獨立的權利，但是我們必須吸取南斯拉夫的教訓，如果只為爭取獨立而不把周遭環境放在眼裡的話，通常會引發悲劇，所以，沖繩該充分顧慮到區域上的和平，這是沖繩目前在反美軍基地，和日本政府對抗當中得到的一個經驗。所以在這個基礎上，新崎先生提出的「地域和平主義」，這樣的設想並非一個觀念，那是非常具體的行動規範。

比如說，他認為在東亞應該形成以民眾為支撐的，跨越國境的、運動的、和平主義的一個共同體。而在這當中，是含有許多課題的。比如說，好幾度談到的釣魚台問題，新崎老師傳達了沖繩社會的訊息是，製造出中國會威脅沖繩的這樣緊張輿論的，是日本本土。在沖繩社會以及民眾中，基本上並不支持這樣的看法。但是在沖繩社會中，民眾確實對中國表現出的強硬態度感到不滿，認為應該要尊重沖繩當地的社會以及民眾的意願。雖然剛剛新崎老師有提到我有過分美化沖繩運動的傾向，但實際上，我覺得我有充分的理由讚美沖繩的民眾運動，儘管新崎老師想要強調的側面與我想要強調的不太一樣，他強調的是沖繩運動內部有很多分歧、對立、消極的情形，不像外界所想像的那麼厲害。

但我想強調的是，整個歷史演變下的沖繩民眾運動，儘管有很多的矛盾糾葛，但這是所有民眾運動的常態，民眾運動永遠不是單一的整合體；可是沖繩的民眾運動，儘管有很多這樣的內耗，但新崎老師也強調了，民眾運動一直在前進。所以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不僅僅去讚美這個運動，還要從中尋找出，是怎樣的力量、邏輯去支撐複雜的、多種、多樣、多層次的民眾運動？我覺得沖繩的民眾運動提供了一個非常寶貴的思想是，沖繩的運動雖然有直接的目標設立在內部，但是卻一直都有大於沖繩的理念來指導這個運動。所以，在新崎老師的著述中，以及他剛剛的演講中，都有提到一個看法，就是如果沖繩人都不積極地反對基地，僅僅討論自己的主權問題，那麼沖繩可能成為美國侵略世界的同謀。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沖繩是受害者的同時，也可能是加害者。這樣的一個認識，我覺得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寶貴的一個視點。



